

炎黄春秋

第 **3** 期
2007年

政治运动对学术研究的影响和教训

“五四”今年过米寿

说不尽的大国兴衰

傅斯年为梁思成兄弟写信求助

目 录

春秋笔

- 1 政治运动对学术研究的影响和教训……………刘导生
10 废除《六法全书》的缘由及影响……………熊先觉

一家言

- 14 说不尽的大国兴衰……………资中筠
19 “五四”今年过米寿……………彭迪

沉思录

- 22 没有民主就没有共产党……………吴敏

人物志

- 30 感谢巴金 敬仰巴金……………丁磐石
37 “六多”将军范明……………李敏杰 赵仕枢
43 大饥荒中的县委书记王永成……………马钟嶽

往事录

- 46 傅斯年为梁思成兄弟写信求助……………耿法
50 刘半农在“三一八惨案”前后……………刘育辉
52 重庆武斗与文革墓群……………庞国义

亲历记

- 61 一个小学生眼中的“文化革命”……………秦维宪

怀人篇

- 64 父亲汪锋的“半个”长征……………王又凯
66 李庄的境界……………余焕椿

品书斋

- 72 《共和国三次哲学大论战》序言……………李锐
74 读《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邢同义 供稿

古镜台

- 80 中国古代清官的拒贿诗……………蒋益文

本期执行主编 李晨

顾 问:

杜润生 李 昌 于光远 李 锐

特邀编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俊义 冯 征 冯 健 冯其庸
曲润海 朱厚泽 李 普 李一鑫
李冰封 李维民 杨天石 吴 象
宋木文 苏双碧 张岂之 张文彬
张荣华 何 方 范敬宜 金冲及
钟沛璋 袁 鹰 凌 云 龚育之
萧蔚彬 曾彦修 彭 迪 韩 钢
雷 颐 魏久明

社 长 (法人代表): 杜导正

副 社 长: 方 实 徐 孔(常务)
杨继绳 吴 思

执行主编: 李 晨 徐庆全

社长助理兼编辑室主任: 赵友慈

社长助理兼办公室主任: 胡竞成

理 事 长: 杜导正

副 理 事 长: 莊其環 李 琼

理 事 : 白建钢

秘 书 长: 徐 孔

副 秘 书 长: 杜明明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管

本刊常年法律顾问:

张思之 (吴奕超闻律师事务所 010-68083211)

步凌云 (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 010-85869163)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K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170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 编: 100045

电 话: (010)68522852 (办公室)

(010)68534879 (编辑室)

(010)68523512 (编辑室)

(010)68532048 (发行部)

传 真: (010)68532569

印 刷: 唐山市润丰印务有限公司

国内总发行: 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订 购 处: 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 1274M

网络电子版全球总代理: 龙源期刊网

网 址: www.dragonsource.com

www.qikan.com

本刊电子信箱(E-mail)地址:

Yanhcq@sina.com

出 版 日 期: 每月4日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0296号

定 价: 5.80元

政治运动对学术研究的影响和教训

刘导生

我在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即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工作了二十年，前十年即1956年8月——1966年5月，是开创和建设的十年，学部的建设有了相当的发展；广大科研人员甘坐冷板凳，埋头做学问，学术研究也取得了相当的成果。但是由于左倾错误路线的泛滥，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连续不断，严重干扰和阻碍了学术研究的进行；尤其是哲学社会科学的各门学科，大都是为探究人类对现实社会认识改造的规律，几乎都与现实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中，往往混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的区别，被冠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科研人员，几乎动辄得咎，学术研究陷于死气沉沉的局面。后十年赶上“文化大革命”，除去斗来斗去，就是全部被赶下乡去当农民或集中几年清查“5·16”，不论年长年少的知识分子都不得安宁，根本说不上坐下来读书。这些年的科研工作，陷于极大的困境。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一、百家争鸣还是两家之争

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在学术研究的漫漫过程中，往往会出现多种不同认识，形成不同的见解和观点。例如，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分期，封建社会起建于西周还是秦汉或者其他朝代，就有郭沫若、范文澜等多种不同观点。对于各种不同的学术见解，早于1953年，毛泽东同志就提出要百家争鸣，自由讨论。1956年9月党的八大确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繁荣文艺和科学的基本政策。这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出现了良好的学术风气。例如，在全国开展批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唯心论”运动期间，文学研究所领导贯彻执行了“百家争鸣”的方针，展开讨论。在讨论中坚持发扬民主，一再让俞平伯发表自己的意见。凡是讲得有道理的地方，都充分予以肯定，决不否定一切。此后还鼓励俞平伯继续进行关于八十回校本《红楼梦》的工作。1956年晋升职称时，他也没有受批判的影响，仍被定为一级研究员。各研究所也都注意贯彻“双百”方针，形成了一个生动活泼的学术局面。

但是当时党的最高领导人在1957年又说百家基本上只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而且说知识分子中“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的，在没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这就使得学术研究非无即资，百家争鸣变成了两家之争，实际上只是无产阶级一家对资产阶级一家的批判和斗争。一些大型的政治思想批判活动，无人敢提出不同观点来进行争鸣，使得学术研究领域一片萧条。无论是批判《武训传》，批判梁漱溟封建复古主义，批判胡风文艺思想，批判《红楼梦》研究中的唯心主义，还是批判胡适唯心主义等等，莫不是如此。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对“修正主义风潮”的批判，更是直接冲击了许多学科的学术研究。例如“中国近代史学术讨论会”，批判了苏联的“修正主义史学理论”，实际上使我国近代史研究陷于

简单肤浅教条的泥坑。此后，哲学界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和冯定的《平凡的真理》、《共产主义人生观》；史学界批判翦伯赞的“历史主义”，以及农民战争史研究中的“让步政策”论；经济研究所批判孙冶方的商品生产要讲利润就是利润挂帅的修正主义经济思想，使得经济学界注重价值、尊重价值规律、重视成本核算和利润指标的学者都遭到批判，对我国经济建设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

一般地说，对封建主义思想、资产阶级世界观以及其他错误思潮进行讨论和批判，是必要的、有益的，但是这种讨论和批判，应当是充分说理的，应当是对不同的学术观点和思想认识进行平等地讨论、批评和反批评。许多学术问题往往不可能通过一次讨论和批判就可以得出正确的结论，应允许继续进行学术研究和探索。

但是当时的批判，往往把思想认识问题拔高到政治问题，有的甚至望文生义，歪曲原意，把不同的学术见解妄断为“反党”、“反社会主义”，令人噤若寒蝉。二是把学术研究中的不同观点和认识，简单化为不是姓无就是姓资，不是唯物论就是唯心主义，进行生硬的甚至粗暴的批判；而且是只许一边倒的批判，不许别人解释、反驳，致使许多批判流于空泛，缺乏说服力，甚至混淆或者颠倒是非，严重挫伤了研究人员探索求真的积极性。有些学者即使写出文章，也不敢争鸣，不敢或不能发表，只好压在箱子底下。而且一段时候批判的浪潮愈演愈烈，使人莫测高深，结果连范文澜也被迫进行检讨，郭沫若也说，“我的书完全可以烧掉”，由此，可见一斑。

学术研究只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社会科学才能创新，才能在探索客观规律上有新的发现和前进。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能轻率地把有不同言论的学者视为异端甚至敌人。对科学家及其著作，不能乱扣帽子，乱打棍子。在学术思想问题上，即使涉及现行政策问题，只要不违背宪法和法律，我们都要提倡民主的讨论方法，有批评自由，也允许人家有反批评的自由。提倡不同的观点进行讨论，通过自由辩论，加深互相了解，促进学术研究的健康发展。

在科学研究中，应当允许犯错误。无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在研究过程中，不许失败，不许犯错

误，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恰恰说明持这种态度的人，不懂得科学研究的规律，不了解科学研究的艰辛。我们要发扬学术民主，坚持百家争鸣，允许自由探讨，对科学研究成果要做具体分析，不能求全责备，不能简单否定、“一棍子打死”。

哲学社会科学的许多学科，与现实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确把握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限，对于开展学术研究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实践证明，一时分不清学术与政治界限的问题，应一律按学术问题对待，允许争鸣，是大有利于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的。记得有一次，我把熊十力先生的佛学著作书稿送郭沫若院长审阅，他当面对我说，人家以毕生之力写出来的书稿，总有一些资料可用吧。立即批示：“印五百本分送全国各大学各地方图书馆。”郭老深知作学问的甘苦，并没有因为唯心主义，加以否定，体现了一种爱护人才的思想 and 与人为善的态度，这给我很大的启示。

总之，几十年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已经有力地告诉我们：“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是发展和繁荣我国科学文化事业的正确方针。什么时候贯彻执行“双百”方针比较好，那个时期的科研人员，就思想比较解放，钻研思考的劲头比较大，研究讨论的风气比较活跃，学术成果比较丰富，科研事业就向前发展；反之，则人人自危，闭口缄言，万马齐喑，学术凋零。所以实行百家争鸣，发扬学术民主，正确把握学术与政治的界限，实在应当是发展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方针。

二、噤若寒蝉的科研人员

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犹如一场暴风骤雨，我们党错误地判断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把广大爱国知识分子、民主爱国人士和党内外干部有益的批评、建议，断定为是向党向社会主义制度的恶毒攻击，因此进行了无情的批判、打击，将他们定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学部各所的反右派运动，是在中国科学院党组的领导和部署下进行的，因为学部当时尚未建立党委，也没有政治机关。学部七个研究所一共划定了四十多名右派分子，其中知名的有狄超白、林里夫、徐懋庸等。这些都是完全错了的冤案，他们后来均得到平反昭雪。

在这场反右派运动中，有一件十分荒谬的事，



1955年6月7日,周恩来在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上与社会科学家们交谈

就是把社会学这门学科判定为资产阶级社会学进行批判,于是知名的社会学家陈达、潘光旦等都遭到批判,被定为右派;进而连过去学过社会学的青年学者,也几乎都被划为右派,将学术问题一概作为政治问题定性。此前,费孝通曾找潘梓年和我要求搞社会调查,希望得到学部的帮助。我们请示中宣部获得同意,决定批给三千元作为活动经费,支持这位社会学家的的工作。社会学被批判后,这在客观上对党造成了一种印象:出尔反尔,言而无信。每每想起此事,使我很感内疚。

对于被划为右派的很多人,后来了解发现,他们大都是很有才华、很有见解的人,只不过一些批评建议比较直率、尖锐而已。但是我不能违背中央部署和院党组的决定,只能在事后处理上“手下留情”尽量照顾。仇士华、蔡莲珍被划为右派后,原子能研究所不便收留这对青年夫妇,被介绍到考古研究所来,我支持考古所把他们留在所里继续从事研究工作,加以保护。此事口头报告了周扬同志,经他首肯。仇、蔡二人经过艰苦努力,日夜奋战,并自己到小摊儿上选购零件动手制作 C14 (即碳 14) 测量仪,终于获得成功。这种仪器,我们没有外汇,不能从国外购买,这一成功研制,对考古发掘出来的文物,可以精确测出历史年代,对考古学做出重要贡献。

六十年代初,我为一位已经摘除右派帽子的

青年知识分子沈元安排了工作。这件十分平常的事,后来惹出了大祸。沈元原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学生,因出于好意,翻译了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结果被定为“极右分子”,开除出校。后来在街道劳动改造,他表现得很努力,被摘掉了右派帽子。但是“摘帽右派”仍然没有工作岗位。他的姑母是医生,送来他写的文稿,托人来找我,我翻阅后了解到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青年,应当爱惜,就向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黎澍推荐,黎澍欣然允诺。沈元到近代史所后,勤奋钻研,安分守己,写出了一篇又一篇优秀论文,先后被《历史研究》、《人民日报》刊载,为学术界瞩目,但也为某些人所妒嫉,向中央宣传部控告。学部为此不得不专门派出一个调查组进行调查,结果证明对沈元的使用完全符合党的政策,他的文章没有任何政治错误,他在政治思想和工作上的表现也是好的。但告状的人不依不饶,一直告到党中央那里去。在“文革”中,这成了我“包庇”“重用”右派的一大罪状,被批斗不止。

反右派运动不仅使一大批很有才华的知识分子受到委屈,更有一个遗患无穷的后遗症,就是广大知识分子不敢说话了。因为在反右派运动中,有些人就是由于对党委和党的干部提出一些批评意见和建议,被上纲为向党猖狂进攻;由于对现实生活和社会现象中的一些弊端表示不满和焦虑,被

上纲为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由于对肃反中一些缺点提出意见，被上纲为丧失阶级立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由于对马列著作尤其是斯大林著作中的个别问题提出疑问，被上纲为反对马列主义；由于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一些丑恶表现表示反感，被上纲为反苏；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还有的甚至捕风捉影，说某些文章某句话是“影射”，是“更恶毒的攻击”；说与某某交谈中的某句话是别有用心；等等。总之是混淆是非，无限上纲，许多人即因这些言论甚或只是片言只语而无端地遭到无穷尽的批判，最后被划为右派分子，顿即沦落为敌对阶级分子。他们的悲惨遭遇，使得每一个知识分子无不看在眼里、记在心间，以此引以为训，闭口缄言。往往是开起会来，你看我，我看你；如果要发言表态，就背那些书上有的、报纸写的、领导说过的话语；即使与同事、朋友交谈，也都谨言慎语，担心日后来个什么运动被揭发。照抄报纸说套话，昧着良心说假话，成了政治生活中的普遍现象。

一些青年知识分子竭力把自己的思想、言论纳入“左”的轨道，重复那些大话、套话、空话，而把独立思考放弃了。至于学术研究，许多人更是不敢钻研探究，写出的论文、著作也不敢见人。偶尔见诸于报刊的论文或著作，只是为领导人的言论、主张，作注脚、解释而已。一个有上百名研究人员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一年的科研成果只发表了两三篇影响不大的文章，可见一斑。回顾这些，深为反右派运动的遗患而痛心。思想禁锢，万马齐喑，学术研究死气沉沉，社会科学满目凋零。这为我们做思想政治工作的人带来极大的困难，而又无力改变。回忆那些年，我经常处于无能为力和无可奈何的困惑状态。

反右派运动后，左倾错误几乎横行无阻。1958年5月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成了一个在全党发动大跃进的动员大会。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于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接踵而起，大炼钢铁热火朝天，“三年超英、五年赶美”、“大干快上”、“敢想敢干”、“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铺天盖地，行行业业，全国上下的干部好像被卷入了这股狂热的潮流。当时学部还对各研究所的科研计划采取了竞赛的方式，看谁家的指标是多少万字，造成了盲目追求数量不讲质量的不良倾向。

在“全民学哲学”、“工农兵学哲学用哲学”等浪潮中，强调为工农兵服务，《文学研究》、《哲学研究》这些学术刊物几乎变成了通俗读物，丧失了它专业理论刊物的特色。

更有甚者，当时在农村和工厂企业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出现了一个在思想领域“拔白旗、插红旗”的运动，这种“拔白旗、插红旗”运动，1958年影响到学部各研究所，许多老专家遭到了错误的批判。

三、“经济所出了两个右派”

1959年，在江西庐山，发生了一场把彭德怀等人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斗争；并由此而把继续纠正左倾错误的严重任务，一改而变成发动全党全国猛烈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我们学部竟然成了一个反右倾的重点单位，原因是中央最高领导人在庐山会议上批斗彭德怀的讲话中说了：“经济所出了两个右派，反对人民公社办食堂。”事情是这样的：

1958年间，全国掀起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左倾错误严重泛滥，使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遇到极大的困难。彭德怀到湖南老家作了实地调查后，在庐山会议上给领导人写了一封信，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过程中的工作错误提出了中肯的批评意见，其中包括公社的公共食堂问题。不料把彭德怀的信说成是对党的基本路线的攻击，是资产阶级动摇性，是右倾机会主义，还说党内有一个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进行有目的、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的分裂活动。于是党中央作出在全党全国开展反右倾运动的决定。

还在彭德怀回乡调查之前，学部学术秘书、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董谦和同所的王绍飞作为“科学实践团工作队”挂职下放，到河北昌黎进行调查研究。他们发现在公社化运动中建立起来的公共食堂，浪费粮食严重，农民在冬季不能利用做饭烧火的余热取暖、烤小孩尿布等等，管理又很混乱，弊端甚多，因而认为只宜在群众自愿的基础上办农忙食堂或小型食堂。这个调查报告，中宣部在《宣教动态》上摘要刊登后，中央最高领导人看了很不高兴，在庐山上说有个右派出来了：一个科学

院调查组,到河北昌黎县,讲得食堂一塌糊涂没有一点好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于是在批判彭德怀时,说:“经济所出了两个右派,反对人民公社办食堂。”

这个批评,我们在听录音报告中得知后感到十分突然。在党内生活极不正常的当年,这当然是必须遵命奉行的最高指示。科学院党组决定要学部立即召开大会批斗董、王二人。我认为一个党员在调查研究中对某一个工作问题表示看法、提出建议,这是党员的权利,完全符合党章的规定,何况这些看法和建议是符合实际的,因此不同意组织批判。但是既是中央最高领导人定的性,又是上级组织的决定,只好组织服从,违心地主持批判。帽子大得很,“反对三面红旗”;但批判发言的内容无力,更没有逼董、王“低头认罪”之类。所幸董谦事后反映“导生同志是高高举起,又轻轻放下”。这使我本人尚感聊可自慰。

事实上,公共食堂的问题,全国到处都有反对之声,董、王之调查,也不过是在问题之肇端即已敏锐地察觉到而已。后来胡乔木、田家英到湖南、浙江调查,认为董、王调查报告所反映的食堂问题,在湘、浙也是如此,这才得到中央最高领导人的认可,指示胡乔木给董、王二人平反。以后在1961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上,明确取消了要办公食堂的规定。刘少奇还在会上表扬了董、王的调查报告,指出要鼓励这种科学态度的调查,并说政策问题是可以研究的。在1978年3月社会科学界知名专家学者座谈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

乔木说这篇调查报告是“建国二十多年来,在理论研究工作中做出贡献的一篇代表作”,再次加以肯定。

1959年那场反右倾运动,按照中央的部署,学部各研究所也开展了揭露和重点批判了本单位的人,以司局级以上党员干部为重点。结果有十五人受到批判,有两人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者。这种批判和处理当然是十分错误的,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就得到了纠正和平反。

反右倾运动这场人为的政治斗争,又把反右派运动已经造成严重后果的左倾错误再向其深渊推进了一大步,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和组织上都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四、张闻天被贬到经济所

人们都还记得,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张闻天因为对大跃进以来实际工作中的左倾错误提出了批评,被最高领导人错误地批判为右倾机会主义,并且被无端地认为是“彭德怀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调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的岗位,由中央分配到我们学部的经济研究所任“特别研究员”。这当然是一项非常特殊的人事安排。对庐山会议,我们只听到传达毛的讲话的最后的决议,并不了解会议真情和彭、张的具体“错误”,但是,仅凭对党史的大体了解,都知道他曾是我们在遵义会议上选出的总书记(后来又说是“总负责”),一直到延安他都是党中央



1956年1月14日至20日,中共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讨论加强对知识分子和整个科学文化工作的领导问题



1957年4月30日，中国科学院邀请100多位科学家举行座谈会，讨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的领导人。这次虽犯了“政治错误”，我们学部党委和经济研究所所长孙冶方等人商量，仍应当十分尊重他的人格，给予进行科研工作的一切方便条件，他可以什么也不做，也千万不要使他有什么压力。

但是具有卓越的政治品德修养的张闻天，并没有以“赋闲”的态度来对待这项徒有虚名、毫无实职的安排，而是立即开展了经济理论问题的研究。他参加了经济研究所的一个写作班子，也住到香山去，同大家一道研讨已经开始的《社会主义经济论》这部著作的提纲和书稿。所领导的意思是请他参加一些有兴趣的专题讨论即可，但他全神贯注，不知疲倦地同大家一道参加全部研讨活动。他白天看材料，参加讨论会，晚上研读《资本论》。他“学而不倦”，关于如何学习《资本论》的逻辑、结构、方法并用来指导写好《社会主义经济论》，他作了好几次精辟的发言。虽然他患有高血压病，又刚刚做过前列腺肥大切除手术，但他没有半点松懈或含糊，严谨的治学精神和谦虚谨慎的待人接物，使写书班子的每一个人都很感动。我听了孙冶方的汇报和介绍，敬佩之心油然而生。

张闻天此后以更大的精力，思考和研究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一系列现实问题，诸如在所有制问题上搞“穷过渡”，追求“一大二公”，急于实行单一的全民所有制；在分配制度上，刮“共产风”搞“一平二调”，破“资产阶级法权”，急于

向“按需分配”过渡；在经济建设中，搞高指标，不讲经济规律，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不讲价值规律，等等。1961年后，他在青岛研究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剖析和阐述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现实问题，写出了政治经济学笔记六万余字。1962年，他到江苏、上海、浙江、湖南的二十个县市调查了两个多月，回到北京写出了《关于集市贸易等一些问题的意见》，分析了市场和物资方面的现状和趋势，建议集市贸易进行物资交流活动的成分、范围和商品，可以扩大，渠道应当畅通，管理要善于引导，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要起到领导和调节的作用，在价格政策上要灵活、主动，及时调整。张闻天还在一篇学习笔记中，对社会主义革命必须经过三个阶段这个马克思早已论述过的理论作了研究，指出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必须要通过取得政权、经济建设和实现全民所有制这样两个阶段来完成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进而在第三个阶段完成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第二个过渡。他这一“两个过渡时期”的理论，对于1958年毛泽东所提出的早日实现共产主义过渡和后来提出的长期历史阶段的“过渡时期”，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回答；这也可以说是后来我们党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之滥觞。

张闻天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问题都有深刻的思考。他没有能够出席1962年9月举行的八届十中全会，但当他听到关于毛泽东说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传达后，就对以阶级斗争扩大化为主要特征的左倾思潮日益泛滥

而焦虑不已。他在1964年2月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工、农、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矛盾——基本上不是对抗性矛盾，是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解决这些矛盾的方法，主要是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是阶级斗争，把它一律叫做阶级斗争，是扩大化。”此前在1961年他在两篇笔记中都谈到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问题，实在是对日益发展的左倾错误一语中的的深刻批判。

还有必要指出的是：在后来的十年浩劫中，张闻天虽然受到了残酷的揪斗和迫害，后来又被“监护”、“疏散”到广东肇庆去了，但他一刻也没有停止过他的理论思维。他在肇庆写出了十万余言的文章和笔记，内部出版了《肇庆文集》，其中1973年写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和1974年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内的公私关系》等文章，对恶性泛滥的左倾思潮从理论上作出透彻的剖析。好几篇文章和笔记对于经济建设如何坚持客观规律尤其是价值规律，联系我国实际工作的教训，作了创造性的阐述。他的著作是探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最早的科学论著。

张闻天不愧为我们党杰出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理论家、思想家，他独立思考，刻苦钻研，不为传统观念所束缚，不屈服于任何权力，坚持真理，务实求真的高贵品质，也是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楷模。他遭到的极不公正的批判和错误处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已经得到平反昭雪。他在经济研究所的十几年，应当说是我们的光荣和骄傲；使我们感到遗憾的是，对这位伟人在遭受磨难时，未能更多地给予应有的尊敬和照顾。

实事求是地说，学部领导当年对上千位高中、初级科研人员，从主观愿望来说，都是十分珍爱并竭力保护的，因为他们都是经过反复挑选来到各研究所的，是很有才华和学问的宝贵人才。在生活待遇、居住条件等方面，我们竭力争取，尽可能为之改善；在科研的图书资料和调查考察方面，我们也向国家申请拨得专项经费。学部的发展，我国社会科学事业的兴旺，全靠他们的努力。事实也是如此：绝大部分研究人员都能自觉地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开展研究工作，思想感情发生重大变化，有些老专家逐渐由一个爱国主义者发展成共产主义者。但是，左倾错误之下的政治运动，使我们无法逃脱社会上刮起一阵又一阵批判的冲

击，如批“白专道路”、“一本书主义”和批判成名成家等等，对于把我国传统思想文化和外国优秀文化一概批判为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思潮等，我们更无力阻挡。结果使得刻苦攻读、独立钻研、精心撰著的人被吓得如临深渊而不敢动弹，有的甚至被扣上“只专不红”、“白专道路”的帽子受到批判，实在令我们徒唤奈何。

六十年代初，中央调整知识分子政策，先后发出了《科研十四条》、《高教六十条》、《文艺八条》。我们借这股东风，在学部各研究所加以传达贯彻，鼓励大家解除顾虑，大胆做学问。只可惜好景不长，1962年9月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又大讲阶级斗争，重新刮起左倾之风，知识分子又陷入惶恐不安的境地。

五、康生诬我“贵族老爷态度”

1964年10月，我带领学部各研究所的两百多名科研人员，在山东海阳参加“四清”，历时一年有余。我在总结报告中有一条是帮助农村干部学习毛主席著作，不料竟被康生批为“贵族老爷态度”，令人匪夷所思。

说起“四清”，五十岁以下的人大概都不大懂得了。事情是这样的：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后，中央最高领导人对我农村的政治形势，作出了极其错误的估量，在1963年5月杭州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说，当前我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我们要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把他们的反革命气势压下去。讲话还强调：如果不抓阶级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于是会议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通称“前十条”），就是在全国农村基层干部中开展“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接着在9月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上，又讨论制定《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通称“后十条”），贯彻“前十条”的指导思想，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基层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方面的一些问题，

都上纲为阶级斗争或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1964年8月,中央批转了王光美在河北抚宁桃园蹲点的经验,强调要访贫问苦、扎根串连,让基层干部靠边站,进行一个一个审查、批判和处理。中央要求全国广泛传达和学习这个经验。中央还要求北京的干部都要下去搞“四清”,正是在这样一种指导思想和桃园经验灌输下,学部二百多人由我带队去山东海阳;还有一支队伍去甘肃张掖;1965年又有两支队伍分别去山西永济和安徽寿县,要把一千多名知识分子都拉到农村去接受实际阶级斗争的锻炼和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虽然建国以后我进入城市,对农村的情况只在五十年代前期下乡调查时偶有了解,但在山东老区十几年的农村生活,使我对基层干部和农民还是有基本了解并有深厚感情的。如今说阶级斗争如何如何的严重,甚至三分之一以上基层政权已经不在我们手里,我是半信半疑的;对于桃园经验,我更觉得倒像是当年到敌占区似的,太玄了。

1964年10月,我带队到了山东海阳这个抗日根据地老解放区的朱吴公社,同黄县公社以上干部汇合,分别组成四清工作队下到各生产队。因为大家的头脑里都装了“阶级斗争”和“桃园经验”,进村后就把基层干部撇在一边,去搞访贫问苦、扎根串连那一套,专门搜集干部“懒馋占贪”的材料。然而经过初步了解,发现实际情况远非如此。但是山东省委主要领导比北京的调子更高,说基层干部是天下乌鸦一般黑,农村政权有八成不在我们手里,似乎绝大部分基层干部都已烂掉,沦为敌人了;海阳另外由两个中央单位负责的“四清”公社,又挖出了多少多少个敌对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而不断受到通报表扬。这对我们的压力是相当大的。但是老区1947年土改“搬石头”(即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干部)的教训记忆犹新,左倾错误的危害令人难忘,如今竟然又要把成千上万的干部当作敌人来清查、斗争,我在思想上不以为然,在行动上是不下不了手的。

经过进一步深入了解一些村子的基本情况和典型案件,我越来越明确地认识到:绝大多数的基层干部都是任劳任怨办实事的,同农民群众血肉相连;有少数人在前几年困难时候多占一些柴草,多分几斤玉米,上面来了干部陪着吃顿饭,出去开

会多报销几角补助,如此而已,根本说不上贪污盗窃;交代了,检讨了,改正了,也就算了,何必大动干戈?有的“勇敢分子”向工作队举报时夸大其词,多半有泄私愤的情绪。但是有的工作队听信了这种举报,开会追查、检举、批斗;致使有些原本还是解放战争推小车抬担架过大江的支前模范,怀疑我们党的政策变了,要卸磨杀驴了。基层干部经受不了这种委屈,某一大队长甚至寻短自尽,使得大多数群众也心存疑虑和恐慌。为了防止这种不良后果出现和蔓延,我们立即给各村工作队发出只可“兵临城下,进行政治攻势”的信,停止对村干部进行大会批斗,要求对他们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自此全公社村干部的思想才得以稳定下来。县工作团部转了我们这一封信,对全县起了稳定的作用。

此后,我一再提醒大家要谨慎从事,要防止过火行为。但我也未能把问题说透,因为“革命”、“斗争”的调子实在太高了。坦白地说我也害怕“右倾”这顶帽子会随时扣上头来的。尽管问题发生在个别工作组的领导干部,我作为工作团的主要负责人,也是有责任的。

1965年春节,为了不扰民,也为了让大家与家人团聚,改善一下生活,我们都回到北京来过节。这时我们听到了中央召开的全国工作会议的传达,学习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通称“二十三条”),心里踏实了不少。因为“二十三条”中明白说了“我们绝大多数干部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规定“要从实际情况出发,实事求是”,要摆事实,讲道理,防止简单粗暴的做法,严禁打人和其他形式的体罚,防止逼供信等等。我在工作队员中强调了这些与“后十条”、“桃园经验”显然不同的精神,要大家回到村里大张旗鼓地宣传“二十三条”。其实“二十三条”还有把四清运动定性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走社会主义道路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重点是要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些极“左”的结论,我只把它当作一种争论来看,虽有内心的忧虑,但未在工作队员中点明。令人庆幸的是,大多数工作队员后来都能按照我强调的去做。积极贯彻执行“二十三条”,劝说积极分子把隔离审查的干部放回了家,对揭发交代出来的问题进行细致核实,取消了那些没有确凿

证据的材料；对落实下来的问题，让干部做出退赔计划，鼓励干部抓好生产，做好工作，将功补过。我们后期的工作显得比较顺利、省力，这是与前期没那么紧跟左倾思想“赶浪潮”有关的。

对于大量基层干部的缺点毛病，我与工作队的一些人作过分析研究。我们发现，那些年里，上级只是布置一个又一个任务，基层干部缺少工作方法，有的干部只顾完成任务而作风简单生硬，甚至强迫命令，造成干群关系有些紧张。其原因在于对基层干部缺乏教育，思想觉悟不高。我在蹲点的村子里试验组织基层干部学习毛主席著作，从“老三篇”入手，作些辅导讲解，帮助他们自觉树立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念，颇有成效。想到“四清”本来就是一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让下去的党团员知识分子辅导、帮助农村基层干部学习毛主席著作，应当说是符合本旨的，而且也是一次根本性的思想建设。所以我在返回北京后写总结报告时，把这一条作为重要经验来强调。

出人意料的是，权位极重的康生，看到我的总结报告后，竟然批评是“贵族老爷态度”。言下之意你们不要自以为有点知识，有点文化，就去辅导基层干部和农民学毛选，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只配滚一身泥巴，低下头来拜农民为老师，改造自己这个臭老九的身份。我看了这个批语大为惊讶，第二天就和学部党委书记关山复一同去找康生，问他作何解释。他竟然轻描淡写地说：“我只是灯下随笔，你们不要紧张。”

好一个“贵族老爷态度”！翻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难道能说不是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刘少奇、彭湃这样的知识分子向工人农民宣传、讲解马克思主义？！难道能说他们都是贵族老爷态度么？！其实康生的这一“灯下随笔”，是居心叵测的。他是要把知识分子打成臭老九，“属于资产阶级范畴”，要愚弄人民，要制造工人农民与知识分子的对立，要对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已是箭在弦上了。果然，一年后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这位摇身一变成为中央文革顾问的大左派也如愿以偿，利用个人迷信，蒙骗幼稚无知的红卫兵，万箭齐发，掀起了一阵又一阵整肃知识分子的恶浪。有“贵族老爷态度”这顶大帽子，我自然在劫难逃。

一批又一批科研人员到农村去参加四清，对



刘导生

于科研人员加深对中国农村社会的了解，增强劳动人民的感情，不能说没有好处；但是硬要说经受了什么锻炼，提高了阶级斗争觉悟，接受了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等等，显然是牵强附会；尤其在左倾错误“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之下，这种四清在科研人员的思想观念上产生了许多混乱；至于对科研工作的耽误，更是不言而喻的。

1957年以后，我国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剥削阶级已经基本消灭的情况下，发动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把在政治上思想上划为剥削阶级的知识分子作为“彻底革命”的主要对象，知识分子自然在劫难逃。显然，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上，都是严重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结果在神州大地造成的巨大灾祸，也就是必然的了！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原常务副主任，粉碎“四人帮”后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

（责任编辑 杜晋）

废除《六法全书》 的缘由及影响

熊先觉

《六法全书》被废除已逾半个多世纪,《六法全书》究为何物?为何废除?如何废除?后果如何?本文试探讨这些问题,作为引玉之砖。

《六法全书》本为法律汇编的名称,来自“六法”一词。而“六法”又从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后的“五法典”发展而来。当年,法国陆续颁布了民法典、商法典、民事诉讼法典、刑法典、刑事诉讼法典,总称为“五法典”。后又颁布了宪法,仍沿用“五法典”之名。日本明治初年,箕作麟祥(1846-1897)将法国法典译为日文,宪法被列为首篇而成“六法”。自此,“六法”之称在日本流行开来。民国时期从日本引进“六法”之名,将其法律汇编称为《六法全书》,最初包括宪法、民法、商法、民事诉讼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等六种法律。后来将商法拆散,分别纳入民法、行政法中,以行政法取代商法而为“六法”。再有以宪法、刑法、民法、商法、刑民诉讼法、法院组织法称为“六法”。通常将各种单行条例分别纳入“六法”中,如称为“宪法及关系法规”、“民法及关系法规”等等。在众多版本中,以陶百川编《六法全书》最为通行,其后有林纪东编《新编六法全书》较为别致,除“六法”外,增设一类“国际法”而成为“七法”,但仍沿用“六法”之称。而今还有主张增设社会法、经济法等类。总之,“六法”明谓六种法律,实则囊括了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的一切法律。“六法”中的民法典,远溯自罗马法。中国的法律制度,原称中华法系,诸法合体,也源远流长。众所周知,自清末沈家本、伍廷芳受命修律,实为沈独自负责,他聘请日本法律专家来华协助,从日本转手引进德、法大陆法系国家的现代资本主义法律,使古老的中

国法律制度发生了根本变化,面目为之一新。旋即清王朝覆灭,其新法未能实施,有的尚待颁布或未能完成编纂。国体和政体更迭后,由北京民国政府(即北洋军阀政府)继续编纂,完成了清末未竟事业,复经南京民国政府(即国民党政府)修修补补而集《六法全书》之大成。其中的“宪法”主要指1946年11月召开“伪国大”所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附加给《六法全书》的《戡乱动员令》、《紧急治罪法》等单行法规,的确是货真价实的反动法律法令;但就“六法”而言,实难称其为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法律。在现代中国历史上曾有过两次国共合作时期,《六法全书》曾为解放区司法机关所适用长达十二年之久,实践证明其定纷止争、维护解放区的社会秩序,有益无害。《六法全书》应属合伙制定,并非为国民党的专利。其内容主要是现代法律制度,如其中的民法典,主要抄袭德国民法典并对中国国情进行了调研,可以说是一部中西合璧的属于当时中国法律前沿的民法典,至今仍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称其为人类先进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亦当之无愧。

政权更迭,新政权对旧政权法律的态度,既可废除也可援用。如果废除,一般废除其相抵触的部分。民国政府就曾明令准予援用清末法律。即便新政权要废除旧政权的法律,通常是在新政权成立之后而罕有在此之前废除的。中华民国的《六法全书》被称为“反动的国民党《六法全书》”,之所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就被废除,那是因为蒋介石祈求和谈提出要保留其“法统”的缘故。即1949年元旦蒋介石发表《新年文告》,提出谈判求和的“五项条件”,其中第

三项是：“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由于蒋介石提出了“法统”问题，三天之后（1月4日）毛泽东便发表《评战犯求和》一文，针锋相对地逐条给予批驳而驳斥了“伪法统”；紧接着（10天之后的1月14日）毛泽东又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正式提出同国民党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其中第二条“废除伪宪法”，第三条“废除伪法统”。宪法是统治阶级权力的法律依据，通常认为只有根据宪法性法律的传统所产生的国家权力，才是所谓“合法”的“正统”的。其实，所谓“统治阶级权力”，不过是借“统治阶级”之名，行“统治集团权力”之实而已。蒋介石提出“法统不致中断”，其目的就在于以法统为护符，妄图继续维持其摇摇欲坠的反动政权。当然，这是他的一厢情愿。所以毛泽东才强调必须“废除伪宪法”，必须“废除伪法统”，此乃政治策略。

王明对毛泽东提出的“废除伪法统”，如获至宝，反应神速。当时王明担任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主任，借此大做特做其文章，赶忙亲自起草

“废除六法全书”文件，抢先于建国前的1949年2月22日以《中共中央关于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和确定解放区司法原则的指示》（以下简称“废除六法全书”文件）由毛泽东签发了。大家知道，王明（陈绍禹）其人，以左倾教条主义扬名，曾给中国革命事业造成过严重危害。党的“七大”，为了团结王明，照顾他当中央委员，其后又安排他做中央法律委员会主任。王明深谙马列词句，撰写思想理论批判，驾轻就熟，一挥而就。从文稿的审批情况看，当时党中央对废除《六法全书》的观点，并非完全一致。王明原稿称：“应当把它（指国民党《六法全书》）看作全部不合乎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法律”，毛泽东删掉了“全部”二字，将其改为“基本上”。周恩来明确批示：“对于旧法律条文，在新民主主义的法律精神下，还可以批判地采用和修改一些，而不是基本采用，这对今后司法工作仍然需要。此点请王明同志加以增补。”尽管“不是基本采用”的观点颇为遗憾，但总比完全彻底否定它要好些。即便如此，王明敷衍塞责，毛泽东戎马倥偬，运筹决胜，且又不谙悉法律而签发了文件。经查阅原



全国第一届司法会议于1950年7月26日在北京开幕，图为会后的合影

稿，朱德未圈阅，任弼时、董必武、林伯渠已圈阅。其观点如何，不得而知。可能是由于文件系王明起草，又经过了主席首肯，当然只划个圈圈而完成了审批手续。接着，华北人民政府为贯彻该指示于4月1日给所属各级人民政府发出了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及其一切反动法律的训令，华北老区司法干部反映强烈：“司法司法，所司何法？”有“旧法可用论”、“镰刀斧头论”、“零件可用论”，等等。对此，董必武曾提出“砖瓦木石论”，意即拆掉旧房的砖瓦木石，还可以盖新房。贾潜等老司法干部因赞成此论而将其简称为“砖瓦论”，后因此获“罪”，被划为右派。

王明炮制的“废除六法全书”文件，武断宣告《六法全书》是“反动法律”，“国民党全部法律”是“保护地主和买办官僚资产阶级”、“镇压和束缚广大人民群众的武器”，“决不能是蒋管区和解放区均能适用的法律”，“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不能采用国民党的反动的旧法律”。必须经常“蔑视和批判国民党《六法全书》及其他一切反动法律法令”，还必须经常“蔑视和批判欧美日本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反人民法律法令”；并号召“彻底粉碎那些学过旧法律而食古不化的人的错误的和有害的思想”。所谓“食古不化的人”是指那些坚持人类先进法律文化的法律与法学界人士；所谓“错误的和有害的思想”，正是人类的先进法律文化的精髓，诸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民主”、“自由”、“法治”、“司法独立”、“司法公正”、“罪刑法定”、“无罪推定”、“保障人权”、“契约自由”，等等。这个文件不仅彻底否定了《六法全书》，而且还彻底否定了人类创造的一切先进法律文化。

“废除六法全书”文件的错误，首先是它有悖于“七大”确定的政治路线，有悖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和“联合政府”的理论主张，也不符合解放区司法机关业已适用多年并仍在继续适用的实际情况，跟革命大方向背道而驰。它要求“蔑视和批判”《六法全书》及资本主义的法律文化而掩盖了批判封建主义，特别是反封建专制主义的斗争。新民主主义历史阶段的任务应当是继续反封建主义，彻底扫除封建专制主义的流毒。但是，王明炮制的这个文件却抛弃了新民主主义，奉行了一条反资不反封建的错误路线，放过了

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最危险的敌人——政治思想和文化领域里的封建专制主义，而把斗争锋芒指向资产阶级及其法律文化。它所狠批的“旧法观点”，正是人类的先进法律文化的结晶；狠批的“旧司法作风”，是指“坐堂问案”、“不告不理”、“回避”、“合议”、“上诉不加刑”等等司法程序公正的诉讼原则和制度。它根本不批也不提反封建主义而把封建主义掩护下来了。更为荒唐的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来掩护封建专制主义。王明的这次错误并不亚于他过去所犯的左倾错误。

“废除六法全书”文件，从根本上歪曲和阉割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法的基本原理。马克思、恩格斯对法的论述有多处，除了一般谈及法的阶级性外，还深刻地阐述了法的社会性和共性。并且讲法的阶级性在前，而讲法的社会性和共性在后。即在《共产党宣言》中虽然讲过：资产阶级的法“不过是被奉为法律的资产阶级的意志”的话，但恩格斯随后在《论住宅问题》中就再没有这样讲。他只是说：“在社会发展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生产、分配和交换产品的行为用一个共同规则概括起来，设法使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后来便成了法律。”在恩格斯看来，法是社会生活中的一种共同规则，是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反映；法的作用，最早表现为规范生产、分配和交换的行为。在阶级社会里，虽然这种规范生产、分配和交换行为的法律不免带有某些有利于统治阶级利益的性质，但它毕竟是执行社会公共事务职能的法律，而这种社会公共事务是有利于全体社会成员的，这就充分显现了法律的社会性和共性。资产阶级法律是人类文化进程中的一次飞跃，它提倡平等与自由、民主与法治，着力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它是彻底反封建的产物，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代表了社会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和先进文化，具有重大进步意义，是人类社会的优秀法律文化成果。资产阶级的法律原则和制度构筑其法律体系，彻底废除了封建等级制度和封建特权，使义务本位的封建法律变成了权利本位的资本主义法律，使治民的法律变成了治权的法律，使广大民众摆脱了封建枷锁，获得了法律上的平等、自由和人权保

障。

“废除六法全书”文件号召大批特批所谓“旧法观点和旧司法作风”，把法律和法学界人才推向灾难的深渊。如在1952年“司法改革”运动之前，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共有干部28000余名，其中有留用的所谓“旧司法人员”6000名，占总数的22%，他们大部分担任审判工作，在不少大中城市及在省以上人民法院的审判员中，其比重相当的大，而在极个别法院还占了多数。在这次运动中他们全部被清洗了，主要是因为他们学过“六法”，认为他们有“旧法观点和旧司法作风”，不能做人民司法工作。又如同年进行的大学“院系调整”，认为法学教授们划不清“新旧法律界限”，就剥夺了他们讲授法学的权利，迫使其转业改行或在家赋闲。其中有许多是法学造诣精湛的知名学者，如朝阳大学教务长、民法学家曾志时教授改教汉语，东吴大学教务长、国际法专家倪征燠教授不得已现学俄语。再如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法律界和法学界是重

灾区，大批司法干部、法学教师、甚至还有部分学生主要因有“旧法观点”而被打成“右派”。其中有不少是对革命事业做出过重要贡献的老干部、老教授和青年教师。如最高人民法院委员会委员、刑庭庭长贾潜，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王斐然，北京政法学院院长钱端升，中国人民大学刑法学青年教师孔钊以及曾参加接管北平法院的青年干部傅楫，等等。他们中有不少是老党员或在白区做地下工作的青年学生。再如厦门大学民法学教授李景禧被划为右派，受清洗回原籍，在“文革”中又把他定为现行反革命、特务，平反后是第一位以法学教授身份而当选为六、七、八届全国人大代表，颇孚众望，是称职的人大代表。有不少人士被错划为“右

派”后，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如留美回国后被分配到司法部工作的青年干部李大光被打成“右派”后，造成全家惨死，其中有幼儿2人。这都是封建专制制度的流毒使然。马克思说：“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司法部和最高人民法院两机关被错划的右派占全体干部的9.5%以上，大大超过了规定的指标。他们被充军北大荒、流放，过着非人的生活。经过历次运动，我国的法律群体被毁灭，有限的法律人才资源被摧残殆尽。

人类社会应当构建和谐的社会，而构建和谐的社会又应当是法治的社会。没有民主就没有法治，没有民主和法治就没有社会主义，也就谈不到和谐的社会。要构建法治大厦就必需拥有雄厚的法律资源，其中包括思想理论、人才和物质等软件和硬件。实践充分证明：搞人治，人存政举，人亡政息；只有搞法治，萧规曹随，才能长治久安。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责任编辑 李晨)

按需出版 继续征稿

我公司“按需出版”广告自2004年7月刊出后，得到大家的热烈反响，至今已为国内外的中老年作者出版了数十种个人传世作品，并获得信誉、服务及质量的良好评价。现继续征稿。

三大优点：解决由于印数少而不能出版的问题（50本起印），即需即印，总是新书，零库存。避免资金一次过多投入造成浪费。

适用范围：个人著作（小说散文诗歌自传等等）；家庭、家族需要保存、传世的专辑、画册；印数：100册以下最合适。

资金投入：自费。以20万字288面为例，印制50本一般在4600元左右（黑白单色）。详细报价可电话或信函咨询，亦可参阅本刊2004年第9、10期所登广告。

稿件内容文责自负，但不符合我国出版法规的不能出版。没有书号，不能销售，仅作为留世或赠送。

印制质量：上乘。

我公司也可代为作者联系出版社，出版可供市场发行的著作。

所有出版的图书均事前签订合同。

北京地区上门服务，送书到家。本广告长年有效。

北京文苑文化发展公司

2007年1月

说不尽的大国兴衰

资中筠

大国消长如月之盈亏，是人间正道。而凡能继续立足的，本国人在国内基本上得到善待是必要条件。

最近中央电视台二套经济频道连续放映 12 集记录片《大国崛起》(以下简称“记录片”)，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因而一再重播，可谓“热播”。两年前，几位主创人员向陈乐民(编者注：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前所长)和我就这一创意征求意见时，我们在表达钦佩的同时，不无保留和担心。首先对“崛起”一词有异议，更主要是担心是否会重复“船坚炮利”、“开疆拓土”的传统诠释思路，或者单纯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从而对当前把“崛起”挂在嘴边的国人产生误导。如今这部片子终于问世，总体而言，历史的主线在其中得到了相对客观的、综合的表述，脉络清晰，对“软实力”的重要性也给予了一定的关照。遗憾和缺陷当然是有的，估计大半不是由于创作者的不知和不能，而是形格势禁，只能有所不为。

大国兴衰是一个说不完的题目。人类从蛮荒进入文明，有文字记载的不过几千年，而进入“现代化”的历程就是这些大国相继兴起的 500 年。这几个国家各领风骚或长或短，其所以有资格作为“大国”在历史上占据一席之地，不在于其人口众多、幅员辽阔(事实上所谓“大国”，不少是小国)，而在其有所创新，成就大事业，对推动世界文明进步做出贡献。每个国家兴起的过程各有其特色，但也有共性，要之，都不是事先设计好，而是顺应发展需要自然形成的。

从文明史的角度看

以荷兰为例：荷兰应算蕞尔小国，且地势低于海拔，得天并不算厚，其有利条件就是有海港，可

以，也只能以贸易求生存。它的始发优势在于自由、平等、开放，特别是务实精神，最少虚荣的包袱。它是当时欧洲思想最自由，对各种宗教信仰最宽容的国家，因而吸引了各方人才。它在不经意中孕育出高度发达的商业文化，有诸多对后世影响至深的创新。例如别出心裁地发起全民集资办企业，是为股份制之滥觞；为代替分红发行证券，出现证券交易所，早于纽约 100 年；又因势利导建立信贷业，为银行的雏形，早于英国 100 年；它先有村民和社区自治，后有统一的王国，因而有最成熟的市民社会，最少森严的等级。证据之一是，作为其艺术特长的油画，不画神、不画王公贵族，而多画平民百姓日常生活。这一点即使在文艺复兴后的欧洲也属少见。我们看到那时的欧洲油画多半是拟人化的神，或是宫廷贵族肖像，而荷兰画以自然风景见长，人物则健壮的农人、农妇、胖乎乎的厨娘都是主角。当然作为航海国家，造船业也有独到之处，其独特的造型也是从实际需要出发——为了多装快跑。总之荷兰之强盛似乎是无心插柳，水到渠成，并非是先有一位雄心勃勃的君主，做出英明的规划和决策，然后成其霸业。

英国的历史就更加丰富。人皆知其曾为“日不落帝国”，实际上这一巅峰期只存在了不到 100 年，而奠定现代英国基础的《大宪章》，远在 13 世纪就已制定，贯穿其中的原则精神引领英国 800 年，直到今天。毋庸赘言，它同时也是对世界文明的杰出贡献。那位跨越 16—17 世纪，领导英国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而奠定英帝国霸业基础的伊丽莎白一世，正是由于恪守《大宪章》“王在议会中”，“王在法下”的原则，没有滥用自己的权力

和威望，使英国得以在稳定、宽松的环境中繁荣昌盛。再传至查理一世，也正是由于反其道而行，企图越过宪章，扩大君权，实行专制，结果招来动荡和革命，把自己送上断头台。革命领袖克伦威尔以暴易暴，掌权后更加独裁，结果也被推翻。直到“光荣革命”之后，英国又回到《大宪章》的轨道，确立了几百年国内的长治久安。这段历史说明君权民授和法治精神已深入英国人心，形式上有一个国王，实质上决不能容忍任何专制。于是在这片国土上适时地产生了培根、洛克、牛顿、瓦特、亚当·斯密、凯恩斯……一连串光照世界文明史，推动历史前进的人物和创新。

17世纪以来，法国和德国思想家辈出，宗教革命、启蒙、理性、逻辑学、辩证法，法国大革命，响彻世界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人权宣言”……这些耀眼的珍珠缀成的链条在世界文明史上熠熠闪光。然而，路易十四的法国虽说与伊丽莎白一世的英国差不多同时臻于鼎盛，但是绝对的君主专制，没有留下一种类似《大宪章》那样限制君权的机制，还需要一场大规模的暴力革命，几经反复，才确立了法兰西共和制度，以《拿破仑法典》为保证。不过法国在文化艺术方面的辉煌成就在路易十四时期就已达至高峰。法语在历史上的持久影响力无与伦比，几百年中整个欧洲包括俄罗斯都以法语流利为文化修养的标志，直到上个世纪50年代，法语一直是国际场合主要语言，以后才逐渐为英语（美语）所代替。记录片最后一集给巴黎“先贤祠”以特写镜头，是画龙点睛之笔。先贤祠的正门上铭刻着：“献给伟人，祖国感谢他们。”这里安葬了72位法国历史人物，其中只有11名政治家，其余大多是思想家、作家、艺术家和科学家——形象地表现了法国以文化傲世的



资中筠

特点。

对于德国作为后来者，记录片点出它的教育兴国，是抓住了核心。德国的高等教育有诸多创新，曾为世界的榜样，对美国20世纪初的教育改革都有影响。而其基础教育的质量和普及程度造就了素质极高的国民。除了众所周知的知识精英在哲学思想、文学音乐方面的贡献外，普通公民的敬业自律、劳动者的技术和一丝不苟的作风，也为世界之首，因此“德国制造”本身曾一度成为工业品的世界品牌。

事实上欧洲文明国家不论大小，都有尊重思想文化的特点，代表国家骄傲的多是文化人而不是王公大臣：西班牙的塞万提斯、丹麦的

安徒生、挪威的易卜生、格里格……更不用说意大利、奥地利的人文荟萃了。记录片最后一集有一段旁白可圈可点：

一个懂得尊重思想的民族，才会诞生伟大的思想。一个拥有伟大思想的国家，才能拥有不断前行的力量。自由、平等、博爱，这是人类社会的美好理想。也许这是永远无法完全实现的愿望，但是人们可以在无尽的岁月中无限地接近它。英国首相丘吉尔有这样一句名言：我宁愿失去一个印度，也不肯失去一个莎士比亚……

近代欧洲发轫于13世纪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以但丁的《神曲》为标志，之后一段时期群星灿烂。这套记录片没有给意大利一席之地是不小的缺失。从文明史的角度，如果有一集把欧洲作为整体而不是国别来叙述，应该从意大利开始，可能弥此不足。

社会福利的创新

这一历史时期“现代化”的进程实际也是资本主义制度兴起和成熟的过程。《共产党宣言》中

对资产阶级兴起中的革命作用和资本的威力有非常精彩的描述。资本主义以空前的效率促进科技进步,创建丰裕社会,同时必然造成贫富悬殊和阶级对立。《宣言》指出,这种社会矛盾终将导致无产阶级革命。而且马克思还曾预言这一革命将在英国发生。但是历史没有实现这一预言。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这些欧美国家都及时进行了改良,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现在的新名词叫“社会创新”。

英国是社会创新的先驱,早在伊丽莎白女王治下,1601年颁布了统称《伊丽莎白法规》的济贫法,是为政府用法律调剂贫富之始(事实上英国第一部济贫法出台是在1388年,不过范围甚小,此处暂不论)。到工业革命之后,两极分化进一步加剧,特别表现在城市条件恶化,英国最严重,同时又是城市改革的先驱。1845年恩格斯发表的名著《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揭示伦敦工人的恶劣生活条件,到1892年恩格斯为此书德文第二版所写的“序言”中就承认:从那时以来,城市触目惊心的恶劣条件已得到改善,原著中所描写的情况很多方面都已成为过去。这一变化发生的半个世纪正是英国处于“日不落帝国”的全盛时期。在恩格斯的名著首发近百年后,就在反法西斯战争最艰苦的1942-1943年间,英国又出现了全面社会保障的“贝弗利奇计划”。这一计划尚未经国会通过就在国内发行50万份,大受欢迎,宣传部门印成小册子发给前线士兵,以鼓舞士气,让他们知道是在为怎样的生活而战。战争结束后,各政党都以这一计划为竞选的号召。1945年工党当选执政,第一批措施就是根据这一计划,通过一系列有关法律,付诸实施,延续至今。也就是说,英国不论在帝国盛时,还是在危急存亡之秋,改善本国人民生活条件的努力一直延续不断。

其他国家或先或后都建立了缓和矛盾、照顾弱势群体的各种制度,并根据各国国情百花齐放,逐步完善。事实上,人民福利也是各大国互相竞争的一个领域。俾士麦时期的德国,以国家为主导的各项社会保险和福利政策在欧洲处于领先地位;法国强调民间互济,政府为辅。英国在半个世纪中在改善福利过程中一直以德国为竞争对象。美国发现自己在“人道主义”方面落后于欧洲,以德、英为榜样急起直追,到罗斯福“新政”时确立了美

国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才停止向欧洲学习。如果从中找出共性来,那就是,“大国”之为“大国”,其国民的基本权利和生存条件也须得到保障,并一般优于同时期的他国。当然,这种社会创新并非都出自统治集团的自觉,劳动者有组织的斗争、大众媒体的批判和监督、各种改良和革命理论——费边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形成推动改革的综合力量。思想界的百花齐放从人文、哲学走向更实际的社会科学也是时代的需要。没有这方面的改革,没有全民的最低福利保障,作为现代化的“大国”是难以为继的。

至于高水平的福利又带来新问题,也难以为继,这是另一课题,不在本文探讨之列。

何必讳言民主自由?

见到本片的主创人员在接受媒体采访中竭力表白主要不是民主的问题。《南方周末》的采访稿特意把“主要不是民主”作为小标题。这令我有点滑稽感。民主何罪?民主何害?这些国家强盛之路难道与民主无关,反倒是专制独裁的产物?诚然,民主决非充足条件,不是灵丹妙药,但是从英国《大宪章》到光荣革命到美国制宪会议到法国大革命,难道不是确立民主的过程?欧洲从中世纪走向现代,是从神权走向人权,从专制走向民主(君主立宪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阶段),从等级特权走向平等法治的历史。这一切不仅是少数精英的觉悟,而且成为全体公民的共识,也就是全民从蒙昧走向启蒙的过程。这是一段渐进的、漫长的历史,同时也是对人类文明的宝贵贡献。各国的发展道路千差万别,民族特色十分鲜明,但又有其不可逾越的普遍规律,以及作为现代人的普适价值。当然不是只要有了议会民主和选举制度就万事大吉。德国希特勒被选上台常被那些贬抑民主选举制者作为反面例证。诚然,希特勒是通过选举执政的,但是一旦上台,他和他的纳粹党就把法治民主撇在一边,奉行极端的集权独裁,以残酷手段压制各种理性的呼声,煽动极端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之作为灾难的象征,难道不是对内残酷的集权专制?德意志民族的悲剧总不能算在民主头上吧?本片中有一个镜头重复两次,即著名的西德总理勃兰特在奥斯维辛犹太人墓前历史性

的一跪，旁白是：“跪下去的是勃兰特，站起来的是德意志。”一个能够这样彻底反省的民族，正说明它还有从宗教革命以来与欧洲文明发展轨迹相吻合的传统，表现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自信，因而也是有前途的。

再以俄罗斯彼得一世为例，这是在俄罗斯历史上彪炳千秋的大帝。他目光如炬，为了俄罗斯的现代化，义无反顾地向西欧学习，不惜微服游学，亲自以学徒身份从工匠做起，这样的胸襟和虚怀可谓亘古一人，对俄罗斯的强盛功不可没。但是他唯独没有学来的是宪政、法治和民主的精髓。他求胜心切，企图借助绝对君权，用专制高压手段，以一己之力把俄罗斯强行推入现代社会，既不设法从其他王公大臣中取得部分支持，也没有触动以农奴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他的先进思想并没有成为俄国人的共识。表面上似乎效率很高，结果欲速则不达，连自己的儿子都未能说服。在其身后，许多措施人亡政息，俄罗斯又走了一大段弯路。从沙俄到苏联到现在的俄罗斯，版图几经变化，仍不失为横跨欧亚大陆的真正“大国”，但是其现代化的道路崎岖多难，少渐变而多突变。彼得大帝未能着手改变的专制基因，成为俄国前进道路上沉重的包袱，历经多次历史变革，乃至天翻地覆的暴力革命，仍难触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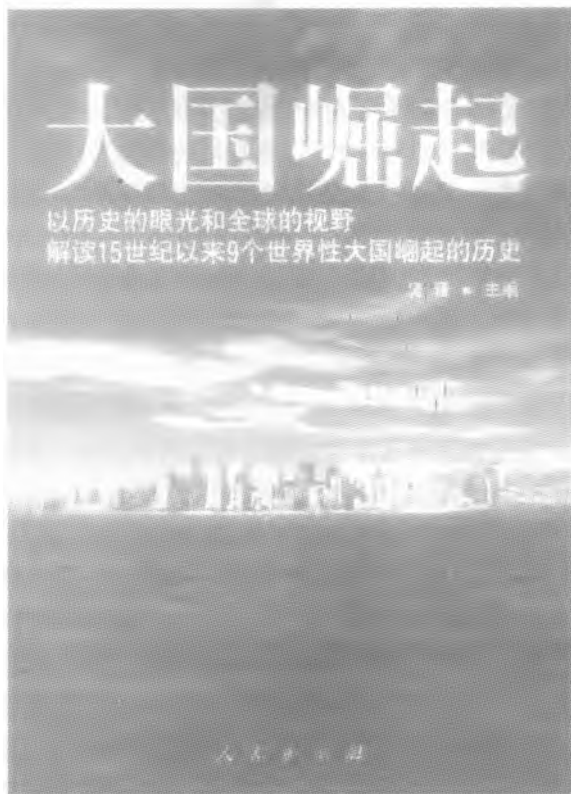
窃以为，纪录片以荷兰和英国3集最为精彩，其它各集也各有所长。相对而言，俄罗斯下集有关苏联部分有诸多败笔，甚至具有误导性。首先把美国罗斯福“新政”与苏联计划经济相提并论，大谬而不然，二者本质上不同，这里不再赘言。片中提到20世纪20-30年代的资本主义大危机，使人们向往苏联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一个极短时期内确有此现象，但是紧接着就是斯大林的“大清洗”，使以自由平等为理想的进步人士希望幻灭。对此，我国通常的称谓是“肃反扩大化”，那是委婉语。实际上决不是“扩大”问题，而是方向问题、制度的本质问题。所“肃”者极少是真“反革命”，而是革命元老、知识精英、民族精华，而且此后高压和清洗成为经常性的政治生活的一部分，不断地摧残民族元气。诚然，最后战胜了法西斯侵略，是苏联人民的光荣业绩，这是以千百万红军的英勇牺牲和百姓的苦难为代价的。如果当初苏共大批精英以及包括图哈切夫元帅在内的大批优秀将

领都未遭清洗，如果至少领导层还有正常议事的民主生活，苏联人民是否一定会遭此浩劫，反侵略战争开始时是否依然那么被动？这段极具警世意义的历史在记录片中完全不见。除了这一重要的缺失外，还给人印象，似乎严密的计划经济、以残酷手段镇压和剥夺农民、以牺牲农业为代价发展重工业，都是不得已的，要大炮只能不要黄油，甚至这些都是后来战胜法西斯侵略的条件。当然“误导”绝不会是编者的主观意图，只是重点的取舍，客观上就会造成某种印象。

其实我能够理解主创者的苦衷，从一开始就兢兢然、惴惴然，一再“自律”。例如关于英国的两集中有关洛克的内容、美国独立的口号“没有代表就不纳税”、美国《宪法》最重要的10项权利法案的产生过程……诸如此类精彩片断都割爱了。为了争取播出，其情可悯，其境可叹，不应加以苛求。

“兴”与“衰”的标准

这些大国都有殖民扩张的历史，以种种巧取豪夺占有他国财富充实自己的国库。它们在国际上奉行强权政治，它们善待本国人，却虐待他国



人,其依据是“种族优劣论”。所以一方面在国内高举自由、平等、人权大旗,一方面可以心安理得地剥夺他国人的权利。不仅统治者如此,许多真诚信奉人道主义的进步人士也认为“劣等民族(或种族)”不配享受“文明”国人所享受的权利。到纳粹德国对犹太人施行种族灭绝政策,种族主义登峰造极,却也因此随着纳粹主义的灭亡而臭名昭著。二战结束后,种族平等、民族平等的观念确立为国际准则,反帝、反殖,争取民族独立的潮流势不可挡,到20世纪60年代殖民地纷纷独立。从此,不论个人潜意识里还有多少残余,公开宣扬种族主义在文明世界已无法立足。今日的世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但是在新的平台上以另一种游戏规则进行。

大国消长如月之盈亏,是人间正道。从这些大国的历史来看,以竭尽本国人力、物力,剥夺本国人民基本权利为代价,穷兵黩武进行侵略扩张,尽管“船坚炮利”,只可得逞于一时,最终必一败涂地;而凡能继续立足的,本国人在国内基本上得到善待是必要条件。如荷兰和英国,迫于历史潮流,退出殖民地,版图大大缩水,从“霸业”角度看是“衰落”,但降为“二等”国,退居本土,照样繁荣发达,仍不失为乐土。现在欧洲国家创立了“欧盟”这样一种国家关系的新形式,是否能够成功,又成为一种推动历史的制度创新,还言之过早,但至少是历史发展到某种阶段的新的尝试。美国现在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正自以为“替天行道”,牛气冲天。能否在适当的时候以适当的方式收缩,退居正常国家,尚待今后美国人的智慧。总之,从以人为本出发,以广大人民的福祉为标尺,“大国”排行榜的名次只能表现暂时的兴衰。例如北欧诸小国,廉政、福利都居世界前茅,小小芬兰教育高度发达,且国家全包,这不也是一种排行法?

是兴奋剂还是清醒剂?

此片一出,在国内外都引起某种躁动,普遍认为,这是中国为自己“崛起”、为下一个“大国”作准备。《纽约时报》有一篇专稿,题为《腼腆的巨人不再故作谦虚》有一定的代表性。文章说现在中国不再否认企图很快成为这样的“大国”了,要放弃邓小平制定的“韬光养晦”的策略了——

“韬光养晦”的英译再翻回中文就是“藏起野心,掩饰利爪”(!)。通篇文章内容无甚新意,无非是列举中国在国际经济中的一些举措,暗示或明示“中国威胁论”。外人愿意如何评论,是他们的事;国人的心态和反应才是重要的。我没有做过调查,无法做出科学的评估。只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隐约感到在一些国人中有一股虚骄之气,与国外不论出于何种动机的夸大偏颇之论相呼应,似乎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下一个世界中心的大国已经在望。在这种背景下,当前这部片子可能起两种作用,一是作为兴奋剂加强了这种躁动的心态;一是作为清醒剂,启发国人深思文明发展的规律,从而客观地认识到我国前面道路崎岖而修远。我希望是后者。

我更希望的是,本片的观众先不忙着联系自己。多年前,在本人主持《美国研究》时就曾一再强调,以客观、全面、深入弄清楚美国为宗旨,切莫轻言与中国“比较研究”,因为这种比较只能是望文生义,牵强附会。而且一联系自己,就容易主观,根据自己的需要对研究对象的国情进行取舍。例如前面提到有些关键内容因“敏感”而回避。其实自己想不想要是一回事,不能因此不承认人家有此传家宝。且慢联系自己,不是永远不要反思,而是避免急功近利。中国人需要了解外国,特别是世界发展的历史,过去如此,在全球化的今天尤其如此,这点再强调也不为过。尽管有关世界历史的书籍,包括国别史,林林总总,但是耐心仔细阅读者日少。通用的教科书往往观点陈旧,取材偏颇,且常有不少误导,亟待改进。这部记录片,借助大众视觉传媒来表现15世纪以来先后在上世界上称雄的9个国家兴盛的历史。跨越500年,覆盖两半球,可谓波澜壮阔,是壮举,也是创举。本文前面虽有一些求全之责,总体上还是认为值得大力肯定。它提供了新的视角,至少比传统的教科书有许多突破,单是普及知识就起到书籍所不能起的作用。如果进而启发出一批历史爱好者,以此为契机,就自己感兴趣的领域作进一步学习探讨,那就功劳更大。再要强加于它过于沉重、似是而非的使命,就是多余的了。

(作者为资深学者,原为中国社科院美国所研究员、所长及《美国研究》主编)

(转载自《南风窗》2007年1月总第326期)

“五四”今年过米寿

——读温家宝总理《同文学艺术家谈心》有感

彭迪

新年伊始，一阵强劲的春风化解了冰冻多年的神州大地。温家宝总理年前对文学艺术家发表的交心交底的谈话触动了人们的心弦，激起了强烈的反响。许多知名人士发表了同样激情的谈话，也推心置腹向我们的总理交底交心。这种上下一心互信互爱的政治空气在中国近代史上是罕见的，如果不是空前的话。我国传统的做法是，领导发表文告，全国各地纷纷表态支持，气势虽然磅礴，但人们看得出来，这种千篇一律的表面文章，大都是出于政治需要，甚至是由上级指示组织的。这次对温家宝谈话的反应完全不一样。关心国家大事的人们自发地发表评论感想。他们的一些真心话甚至是冒着触犯当局禁忌的政治风险说出来的。我国有影响的月刊《炎黄春秋》给这次历史性的上下思想交流提供了一个深得人心的平台，真是难能可贵。

温总理在谈心中表达的为民为国的崇高理想，治国安民、道德重振的精辟见解，尤其是坚持真理敢讲真话的勇气，已经有不少同志作出高度评价。这个谈话意义深远，需要继续领会和展开探讨。

他这篇谈心的第一句话，“我没有稿子”，就像闪电似的把我吸引住了。我一定要看下去，这不会是一篇书本上的教条训词或反复灌输的官腔大话。更使我惊喜的是，他紧接着说：“一篇没有稿子的报告，人们不会求全责备，说错了，大家批评就是了。”

好些年来，我没有听到领导人说这种欢迎批评的话了。现在我们领导人的讲话，常常是篇篇“重要”，句句正确，只要求大家学习遵循，保持一致，似乎天下有什么绝对正确，能够垄断真理的主

义、政党或个人，既不期待人民探讨质疑，更不忍不同意见。温家宝不像是这样的领导人。虽然他身居要职，德才兼备，但并不自以为是。他主动申明他只是向大家提点“不成熟的意见”。对在座的老作家们，他称：“他们是我的前辈，应该说我是读着他们的作品长大的。”对于饱受政治摧残，至今还受到打压排斥，不许他们说话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温家宝总理这种语重心长勉慰之情令人感动不已。

温家宝这次讲话的重点是号召全体中国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以天下兴亡大业为己任，勇敢地站出来，无私无畏，坚持真理讲真话。他不是停留在一般号召，而是着重阐述“知识”（包括知识分子）在振兴中华的宏伟而艰巨的大业中所起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在今日之中国，这种作用还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更为重要的是，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他虽然措辞委婉，但没有回避探讨造成这种反常局面的主客观原因，提到某些政治上敏感的问题，特别是解放思想和民主改革。

温家宝的谈话，有的放矢，切中要害。响应他的号召，我也想讲点我的真话，如果文不对题，就算是题外之音吧！我认为思想，特别是深层次的思想是区别人类和其他生物的最重要的标志。通过这种天赋的智商，人类征服了地球并且已经开始向宇宙进军。同样地，先进的民族也是运用这种本能占据了自然和人文科学的高地，建成了强大的国家。美国就是这样的典型之一。它的诀窍就在于对人民的思想以及表达思想的言论，很少限制，充分发挥他们的思想威力和创新。许多杰出的思想家和科学家都出自美国或是从外国跑到美国去安家落户的移民，在这个条条框框较少的国土，发

挥他(她)们的聪明才智。落后的国家,不了解这个道理,甚至私心重重,唯恐人民自由思想的威力危及统治者的利益,千方百计限制和剥夺老百姓的思想和言论自由,其结果是作茧自缚,自我窒息。

不幸,我们中国从秦始皇开始,两千多年来实行的就是这种专政制度。虽然专政的强度有起有伏,专政的名义和方式也不尽相同,但压制言论自由,排斥外来思想的基本政策不变,直至晚清政府才开始发现闭关锁国有导致亡国之虑,必须励精图变。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康梁变法本应成为近代中国思想启蒙运动的开始,可惜不为笃信皇权专政的最高当权者容忍而失败。半醒半睡的清廷只醉心从外国引进坚船利炮而无心接纳欧美强国尊重人的个人价值和自由权利,逐步建立人民做主的政治制度,发挥人民的智慧才华的成功的建国经验。

晚清的这段历史教训至今还有参考价值。坚船利炮的洋务运动比较容易,改革政治制度比较困难,因为它涉及当权者的既得利益。特别在中国,厉行专政制度的传统观念,积重难返。这种残余影响甚至在我国改革开放以后,也没有肃清。我们党领导,突破了一些传统的教条,做了很多开创性工作,成绩卓著,尤其是培育发展市场经济,容许人民有更大的自由发展经济,生活大有改善,国力也有很大加强。但是这种改革开放的重点还是放在引进外国的科学技术,略似晚清兴办工业,坚船利炮的洋务运动,比起旨在削弱君权的康梁变法维新运动来,我以为还有逊色。由于片面孤立地强调发展经济是“硬道理”而忽视甚至压制思想和言论自由的结果,我国现在的经济发展虽然无疑是远远超过秦始皇时代,但政治和思想领域恐怕还不如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代活跃。

世界已进入高度活跃的以信息和知识取胜的时代。国际竞争的重点已逐渐从“硬实力”更多地转向“软实力”发展。除了经济和国防实力强大以外,国家政治民主,信息畅通无阻,思想言论活跃,科学文化繁荣,道德素质优良等等都是构成近代文明国家的要素,而且从长远看必将超过那些单凭硬实力取胜的国家。从朝鲜、越南到伊拉克,美国企图单纯以压倒性的硬实力压倒对方的企图,屡战屡败。如果没有强大过人的软实力作后盾,它

将败得更惨。

爱因斯坦突破传统时空概念的思维和崭新的科学理念,打开了世人的眼界。这位伟大的探索宇宙真理的科学家也是一个热爱正义与和平的人道主义者。无意识地,他的研究成果为原子弹的诞生铺平了道路。他为此而感到懊悔。从他的一生,人们看到硬实力和软实力是如何相辅相成,而软实力也可以说是硬实力的基础。

由此可见,从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政治改革开始,带动我国的软实力的发展,是何等重要。对我的这些浅见,我们党中央的领导想必心中有数。稀罕的是温家宝总理肝胆相照,系统深入地向公众提出这些问题同大家探讨,并指明解决问题的道路是回到我们建党初期强调的“五四”精神——“民主,科学”。他强调说:这就是追求真理。

我发现,这是温家宝总理的一贯立场。但并不是所有的人对这个问题如此重视而且有这种迫切感。近几年纪念“五四”运动,领导召开大会,发表讲话,大报刊登文章,场面虽大但主要是宣扬爱国主义,很少探讨五四运动更加深远的意义——民主和科学精神。

拿去年“五四”运动的纪念日说吧!唯一的纪念活动是温家宝总理在五四青年节看望北师大学生。他没有准备做什么报告,同学生不拘形式自由交谈,在学校图书馆回答一位学生的提问时,即席发表了一些多年来包括学生在内的广大知识分子想说而没说的话,令人费解的是,各主要大报,不知是不约而同还是有意安排,将温家宝这段最重要最精彩的答问都登在第二版很不醒目的地位。我问了一些朋友,他们都漏看了这段简短的重要讲话。为了引起公众的重视和反思,我今日再将温总理那次谈话的原文介绍如下:

“五四”运动提出民主与科学的口号。我们继承“五四”光荣传统,追求民主与科学的目标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没有民主与科学,就没有社会主义,也就没有现代化。我们今天讲民主,就是要让人民当家作主,保障人民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就是要创造一种环境,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就是要让每一个人都能在平等公正自由的环境中全面成长;就是要把发展民主和完善法制结合起来,依法治国,建设社

会主义法制国家。

这段话的中心思想是“人民当家作主”。他还提出了一系列措施,以保证人民能真正行使国家主人的权利,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在中国,要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是一件天大的难事。因为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从来没有过这方面的知识和经验,从有文字记载时开始,中国只有皇权党权甚至个人专权压制民权的历史,不知人民当家作主为何物,“五四”运动标



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示威游行的队伍向天安门进发

志着古老的中国走向现代文明世界的开端,可惜封建思想和专制势力根深蒂固,阻力太大,失此良机。这也不奇怪。包括许多文章史料和家喻户晓的古典小说,大都渲染帝王将相左右乾坤的作用。反抗专制统治的人民运动,不是被镇压失败,就是成功后又回到专制统治,成为一种恶性循环。胜者为王,自命为天子,所作所为,自认为是替天行道,而且代代相传,一坐天下就是几百年。当权者以此为乐,人民习以为常,而且信息闭塞,不知道许多国家别有洞天,可以考察借鉴。

共产主义运动本是人民解放当家作主的又一次机会。但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如苏联等,片面强调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地位,给党的领导提供了滥用权势、压制民主的条件,直至动用专制手段对付人民,实际上把人民排除在领导之外。我国共产党一向提倡“为人民服务”,但也过分强调党的绝对领导地位,高度集权,不免导致独断专行,甚至发生反右和文革那样违反人民意愿的事,犯了许多错误。现在我党领导提出“以民为本”,用意虽好,但我以为还没有超出“为民做主”的范畴。“由民做主”和“为民做主”,一字之差,天壤之别。我们的国家大事,从制定方针政策到重要人事任免,都由党领导“包办”,从中央到基层,掌权的大官,都是共产党员。

虽然我们有许许多多优秀的共产党员,但在权力机构中,不少党组织成了名副其实的官僚权势和利益集团。在这种高度集中而缺乏监督的政治体制下,一般百姓和广大党员都没有多少当家作主的权利。许多人多次挨整挨批,如惊弓之鸟,不敢再对党领导提意见,讲真话。

我深知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的难度,不能急于求成。为改变观点,改变制度,需要创造条件,逐步推广。但我认为应该知难而上,不能因噎废食,却步不前。我不主张照搬外国的具体做法,但我认为也不应拒绝和蔑视外国比较成功的经验,一概斥之为邪教异端,更不应该过分强调中国人民觉悟程度太低,不会搞民主,一搞就要乱。每当看到一些不发达国家,例如南非、东帝汶等国的人民,在酷热的太阳下,光着脚丫,排着弯弯曲曲的长队,像十里长蛇,井井有条去投票选举他们支持的政党和领导人时,我不由得感慨万千。我国解放已经半个多世纪,我们的人民早应当家作主,享受宪法规定的各项自由和民主权利,过正常的民主生活了。

温家宝的谈话真诚地指出解决我国这个头等重要问题的必要。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亮点。但愿它能光芒四射,照亮我们前进的方向。

(责任编辑 杜晋)

没有民主就没有共产党

——对中国共产党建党 85 周年历史的反思

吴 敏

民主是共产党成立的基本条件和执政合法性的重要来源

世界上的第一个共产党成立于上上世纪 40 年代末。为什么它能在这个时候“从天而降”呢？首先，这个时候，资产阶级民主关于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的思想已经在欧美成为一种主潮流（在实践中当然没有完全兑现），使得揭示无产阶级历史使命和劳动解放客观规律的马克思主义之创立和传播，以及无产阶级组织自己的革命政党，具备了现实的可能性。其次，这个时候，西欧国家的无产阶级已经由“自在”阶级发展成了“自为”阶级，在政治上基本成熟，能够明确地提出参与乃至主导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要求。再次，这个时候，原来实行“集中制”原则并具有秘密结社性质的工人政党“正义者同盟”，愿意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要求将自己改组成为实行“民主制”组织原则的“共产主义者同盟”。这三个方面的实际情况，分别标志着资产阶级民主、无产阶级民主和工人阶级政党自身的民主意识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如果不是民主思想、民主运动、民主组织原则发展业已奠定的这些必要条件和基础，世界上的第一个共产党是不可能在上上世纪 40 年代末成立的。

中国共产党在 1921 年的成立，同样与民主思想的传播和民主运动的发展紧密相连。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李大钊称之为“庶民的胜利”。李大钊的这个思想，意味着中国人自孙中山 1905 年提出“建立民国”以来，对民主思想和民主革命的认识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1919 年爆发

的五四运动以及作为其重要铺垫的新文化运动，更是非常响亮地发出了对“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强烈呼唤。正是民主思想传播和民主运动发展的滚滚洪流，才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创造了条件，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创造了条件。如果没有这些条件，中国共产党不可能在 1921 年横空出世。

中国共产党成立 85 年来，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两个最重大的成就，一个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还不是彻底胜利），一个是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功（还不是最终成功）。之所以能取得这两个最重大的成就，都同中国共产党坚持实行的民主思想、民主路线和民主政策有直接关系。中国共产党从 1949 年至今所拥有的执政合法性，就是以党所坚持的民主思想、民主路线和民主政策为根本基础的。简而言之，没有共产党坚持实行的民主，就没有共产党的今天。

有一首广为流行的歌曲叫《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其实，这里所说的共产党，主要是指中国共产党坚持实行的民主思想和民主路线。如果对这首歌的题目作个具体解释，应该是：“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坚持实行的民主思想和民主路线，就不可能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不可能建立新中国。”为什么这样说呢？众所周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依赖于毛泽东思想以及根据毛泽东思想制定的党的正确路线的指导。这里所说的毛泽东思想，当然包括毛泽东哲学思想、毛泽东军事思想、毛泽东文艺思想等内容，但最重要的应该是毛泽东民主思想；这里所说的党的正确路线，当然包括党的思想路线、组织路线、军事路线等内容，但最重要的应该是以实现人民民主为

根本目的的党的政治路线。解放区的天之所以是“明朗的天”，主要是因为这里正在升起着灿烂辉煌的民主的太阳；共产党之所以能得到广大老百姓的真心拥护，主要是因为它“实行了民主好处多”。毛泽东在1945年9月29日所作的《答路透社记者十二项问题》中，就非常明确地解释了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建立的“自由民主的中国”的具体内涵。他说：“‘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他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毛泽东选集》，第505页，哈尔滨东北书店1948年版）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高高举起了民主的旗帜，作出了建立“自由民主的中国”的庄严保证和允诺，才得到了各民主党派特别是全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才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新中国。这个客观的历史事实，是任何政治家、理论家、宣传家的任何辩解都不可能否认和改变得了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在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后召开的“遵义会议”，它把党和国家从当时“左”的指导思想的严重桎梏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悲怆灾难中解救了出来，开辟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这次会议之所以如此重要，就是因为它提出了两条“最重大”的“新政策”，“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实行改革”。（《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6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将近30年间所取得的所有重大成就，都同这两条“最重大”的“新政策”紧密相关。如果没有这两条新政策，党和人民就不可能

得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得到的一切。而在这两条新政策中，“政治上发展民主”较之“经济上实行改革”又具有明显的前提性和格外的重要性。邓小平讲得很清楚：“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4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这意味着，不从政治上发展民主，就不可能解放思想。但如果思想不解放，仍然蜷缩在计划经济观念的藩篱之内，哪里谈得上什么经济改革？显然，从一定意义上说，如果没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政治上发展民主”的新政策，我国就不可能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及其巨大成就，我们党就不可能得到最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就不可能有现在这样的执政合法性。

民主、自由决定着共产党的存在价值和前途命运

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中国化的已有成果来分析，说“没有民主就没有共产党”亦有充分的科学根据，应该确立这样的认识和观念。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及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拟定的党纲，是马克思主义“袖珍式的百科全书”和“歌中之歌”，是将近160年来一切共产党人都高举着的伟大旗帜。在这部光辉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既为共产党规定了近期要实现的根本目的，也为共产党指出了最终要达到的宏伟目标。他们非常明确地说：“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在发展进程中，当阶级差



斯 格 马



中共一大会址现景

别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手里的时候,公众的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联合为阶级,如果说它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末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和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从而消灭了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4、272、27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从这些经典、精辟的科学论断可以看出,共产党之所以是共产党,决定于它领导无产阶级以及广大劳动群众所要实现的最近目的和最终目标。其最近目的,是要将无产阶级组织成为阶级,夺取政权,争得民主,使无产阶级以及广大劳动群众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其最终目标,是要运用国家权力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的存在条件,将社会改造成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共产党要实现的最近目的和最终目标是紧密联系、有机统一的,“共产党人为

工人阶级的最近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4页)。显然,是否为“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的最近目的而奋斗,是否在实现这个目的之后进一步为建立“自由人联合体”而奋斗,是否牢牢坚持这个最近目的和最终目标二者之间的有机统一,对于共产党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决定性的意义。如果忽视、忘却甚至丢弃了民主这个最近目的和自由这个最终目标,所谓共产党就不成其为共产党了,够不上共产党的资格了。假使有的人、有的组织在摒弃了民主和自由的目标之后仍然要打上什么“共产党”的旗号,那他们只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的招摇撞骗而已。比如,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共产党(实际上只是党内的掌权者,不包括大多数的一般党员,因为一般党员在党内只是履行义务、执行中央政策的工具而已,基本上没有什么发言权和参与决策权)在其垮台之前,实际上已经完全抛弃了民主和自由的目标,蜕变成了严重脱离人民群众并同其根本对立的特权阶层和既得利益集团。他们虽然还自称是所谓“共产党”,但他们哪里还有一点共产党的味道呢?哪里还算得上是什么共产党呢?这种假冒伪劣的共产党最终被苏联人民抛弃,丧失了执政地位,这是由历史辩证法所决定的必然结果。

中国共产党人总体上说铭记着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谆谆告诫,对于自己要实现的目的和所肩负的使命有着清醒的认识。邓小平早在40年前就明确指出:“工人阶级必须依靠本阶级的群众力量和全体劳动人民的群众力量,才能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解放自己,同时解放全体劳动人民。”“党的全部任务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对于人民群众的领导作用,就是正确地给人民群众指出斗争的方向,帮助人民群众自己动手,争取和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胡耀邦在1981年代表党中央进一步特别强调说:“在革命胜利以后,人民就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党对国家生活的领导,最本质的内容,就是组织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生活。”这表

工人阶级的最近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4页)。显然,是否为“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的最近目的而奋斗,是否在实现这个目的之后进一步为建立“自由人联合体”而奋斗,是否牢牢坚持这个最近目的和最终目标二者之间的有机统一,对于共产党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决定性的意义。如果忽视、忘却甚至丢弃了民主这个最近目的和自由这个最终目标,所谓共产党就不成其为共产党了,够不上共产党的资格了。假使有的人、有的组织在摒弃了民主和自由的目标之后仍然要打上什么“共产党”的旗号,那他们只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的招摇撞骗而已。比如,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共产党(实际上只是党内的掌权者,不包括大多数的一般党员,因为一般党员在党内只是履行义务、执行中央政策的工具而已,基本上没有什么发言权和参与决策权)在其垮台之前,实际上已经完全抛弃了民主和自由的目标,蜕变成了严重脱离人民群众并同其根本对立的特权阶层和既得利益集团。他们虽然还自称是所谓“共产党”,但他们哪里还有一点共产党的味道呢?哪里还算得上是什么共产党呢?这种假冒伪劣的共产党最终被苏联人民抛弃,丧失了执政地位,这是由历史辩证法所决定的必然结果。

明,在革命胜利之前,中国共产党所作出的一切努力和牺牲,根本目的是为了领导和帮助人民夺取政权,“争得民主”;在革命胜利之后,党的领导以及所做一切工作的根本目的,又是为了保障人民作为国家主人的地位和权利,实现民主。只有在人民当家作主并充分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基础上,才能建设好社会主义的新生活,为最终建立“自由人联合体”逐步奠定物质和文化基础。在现阶段,如果不重视甚至丢弃了组织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这个最本质的内容,不以实现人民民主为根本目的,所谓党的领导就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和必要性,就不是共产党的领导了。套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共产党“自觉地认定”自己只不过是组织和支持人民群众争得民主、实现民主的“一种工具”而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果名为共产党,实际上发挥的却不是组织和支持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工具作用,而是自认为“有超乎人民群众之上的权力”,“向人民群众实行恩赐、包办、强迫命令”,“在人民群众头上称王称霸”,那么,这个党显然就“异化”了,不成其为共产党了,或者说共产党就名存实亡了,所谓社会主义也很难称得上是社会主义了。

马克思、恩格斯非常重视共产党党内的民主和自由,恩格斯晚年还为此进行了多次坚定而严峻的斗争。恩格斯尖锐地指出:“党——需要社会科学,而这种科学没有发展的自由是不能存在的”。“在德国党和德国社会主义科学之间哪怕是有一点不协调,都是莫大的不幸和耻辱,更不用说分离了。”“在党内绝对自由地交换意见是必要的。”他还认为“在党内当然必须拥有一个不直接从属于执行委员会甚至党代会的刊物,也就是说这种刊物在纲领和既定策略的范围内可以自由地反对党所采取的某些步骤,并在不违反党的道德的范围内自由批评纲领和策略。”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报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其中一个颇有创造性的观点,就是认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为什么说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呢?

其一,党员是构成党组织的细胞,党员的活力决定着党的整个肌体的生命力。党内民主以保障党员权利为基础,党员权利的充分行使有利于激发党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有利于促使党

员经常保持旺盛的朝气、活力和进取心,有利于保障党员很好地履行自己的应尽义务,发挥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党内民主保障了党员的权利,实际上就是保障了党的生命力。

其二,党组织的各级领导集体承担着党的工作的日常性决策职能,是党组织的中枢神经系统。他们的自身素质怎么样,能否按照党章的规定定期改选和换届,能否将德才兼备的优秀党员及时推举到党组织的各级领导集体之中,直接决定着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和生命力。而这些方面的状况,又直接决定于党内的民主状况。党内民主状况好,党组织各级领导集体能及时新陈代谢,党的生命力就旺盛;否则,党的生命力就要受到影响。

其三,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能否体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意志,是决定党的生命力的最重要的因素。要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真正反映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意志,惟一有效的办法,就是通过广大党员与人民群众经常保持密切的血肉联系,并充分发展党内民主,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自下而上、集思广益地来制定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其四,党组织不是生活在真空中,社会上的各种消极腐败因素不可避免地要渗透到党内来,侵蚀党的肌体,弱化党的生命力。要防止和抵御这种现象的发生,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发展党内民主。党内民主蕴涵着强劲的免疫力,能及时、有效地防止和抵御各种消极腐败因素对党的肌体的侵蚀,能最大程度地清除党的肌体上被腐蚀、被毒化的细胞组织,确保党的生命力长盛不衰。

显而易见,党内民主决定党的生命,党内民主就是党的生命。党内民主状况好,党的生命力就旺盛;党内民主状况不好,党的生命力就衰弱;如果党内民主遭到了根本性的摧残和破坏,完全没有了党内民主,党的生命力自然也就没有了,党组织就会成为一具僵死、腐烂的躯壳。在这种情况下,哪里还谈得上什么共产党?哪里还有什么共产党?

克服和铲除党自身非民主、“非共产党”的成分及病毒

历史发展的实际走向和进程,决定于恩格斯所说的“平行四边形”形成的合力,不可能尽如人

意。以马克思、恩格斯为共产党确立的民主和自由目标来衡量,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党的建设和党的领导方面虽然有了很大改进,成效显著,但其现在的自身状况和执政方式仍然存在着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其最主要、最根本的表现,就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中国化的不少重要成果尚未完全转化为实践,尚未完全实现认识的“第二次飞跃”。

邓小平在 1941 年就很尖锐地警示:“党的优势”“要表现在群众拥护上。把优势建筑在权力上是靠不住的。”“党权高于一切”的“以党治国”“是最大的蠢笨”,是“国民党的遗毒,是麻痹党、腐化党、破坏党、使党脱离群众的最有效的办法”。但直至现在,相当一些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仍然把权力看得像贾宝玉脖子上的“通灵宝玉”一样至为重要,长期迷失在“最大的蠢笨”和“国民党的遗毒”中走不出来。他们崇拜权力,贪恋权力,追逐权力,僭越权力,滥用权力,名义上是要“加强党的领导”,实际上是在损害党的威信和形象的过程中谋取着自己的私利,有些人甚至堕入了腐败的深渊。

邓小平在 1956 年就说,共产党“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的“工具”。但是,迄今为止,相当一些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还没有真正确立这个认识,他们往往觉得自己拥有高于一般群众的地位和权力,尊重群众、服务群众的观点很淡漠,甚至几乎没有。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相当一些掌权者在实际行动上不仅没有把自己作为人民群众的工具,真心诚意地为人民群众服务,反而把人民群众当成了自己的工具,让人民群众来为自己的某种意图和利益服务。党内目前之所以仍然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官僚主义现象,其源盖出于此。

胡耀邦在 1981 年就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共产党的领导最本质的内容是组织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1997 年,党的十五大报告又强调说:“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掌握管理国家的权力,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但是,直到现在,不少党员特别是一些党组织主要领导人竟然认为中国老百姓的素质差、水平低,不具备当家作主的条件和能力,不宜实行民主,需要由他们来“代表”(实质

上是代替)老百姓当家作主,否则就会“天下大乱”,“危害社会稳定”。因此,在他们的影响力、作用力所能达到的范围之内,宪法赋予公民的选举权、罢免权、意愿表达权、政治参与权,赋予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选举权、立法权、决定权、监督权,在相当程度上还是停留于纸面上和口头上,很难真正转变为具体的实际行动。许多直接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事务,基本上都是由党组织主要领导人以“党的领导”的名义拍板决定的,法律规定的严格程序往往只是一个过场、一种仪式,没有多少实际意义。

邓小平在 1986 年就说,政治体制改革“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但是,自 1989 年后半年以来,党政分开的改革探索实际上中止了,甚至成了被否定的对象,连邓小平关于党政分开的思想也几乎没有人敢提了。这样一来,不仅使得传统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现象进一步加剧,而且,一些新的“党政合一”方式和做法竟被冠以“改革”之名予以推广。现在,在有些地方,党委和政府两个“一把手”“一肩挑”的做法,就被作为正确的“政治体制改革模式”而大张旗鼓地贯彻施行。

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明确地将党内民主提到了“党的生命”的高度,并强调说“要以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为基础,以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和党的委员会制度为重点,从改革体制机制入手,建立健全充分反映党员和党组织意愿的党内民主制度”。十六大之后,党中央在发展党内民主方面又相继作出了一些重要决策。但是,近几年来,在相当一些领域和地方,党内民主的发展仍然相当艰难,实际状况远不能令人满意。比如,现在,“党八股”式的空话、套话仍然充塞于党报党刊和广播电视,各种媒体在娱乐性内容空前繁荣的表象下掩盖着思想性内容的单调、贫乏和沉寂,党内一些正常的不同认识往往被指责为“异己”、“敌对”的“杂音和噪音”而遭到封杀;广大党员反映意见的渠道仍然不通畅,“上访大军”有增无减(多数上访者当然不是党员,但如果党员反映意见的渠道畅通,很多社会性的问题就能比较及时地得到解决,党外群众的上访也会大为减少),动用行政手段乃至国家暴力“截访”和打击迫害上访者的恶性事件屡有发生;普通党员包括党代会普通代

表实际参与党内事务、参与党内决策的机会和方式仍然很少，党代会代表基本上还是由有关领导和部门内定的，党代会的重要决议和选举结果基本上还是自上而下预先确定好了的；在相当一些党组织里，党委常委会以书记为权力中心，书记的权力很大，所谓集体领导和全委会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形式，这使得一些党委书记的“家长制”、“一言堂”作风比较突出，与此相伴随的人身依附、拉帮结派等现象也严重存在。而按照党章和准则的规定，“集体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之一”，党委常委会由全委会选举产生，在全委会闭会期间行使全委会的职权，其工作应向全委会负责，书记的“主要责任”仅仅是“组织党委的活动和处理日常工作”。

上述现象表明，我们党现在的自身状况和执政方式，同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及其中国化成果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同宪法、法律和党章、准则的规范也有很大差距。说得通俗和直白一些，就是在党的组织肌体和执政方式中，还存在着相当一些不符合共产党规格和标准的非民主、“非共产党”成分及病毒。之所以如此，追根溯源，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是苏共模式和斯大林主义的深重影响。中国共产党是在苏共前身俄共（布）的直接帮助下成立的，在成立之后的较长时期里又一直是苏共控制的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基本上照搬了苏共的一整套组织原则和组织建制。新中国成立以后，因为苏共是世界上第一个执政的共产党，具有无可置疑的示范效应，所以，中国共产党又在很大程度上参照了他们的执政方式。但是，苏共的党建和执政模式基本上是按照斯大林主义建立起来的，斯大林主义在相当程度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背离了共产党应有的基本规范。而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多种原因，我们党从来没有对斯大林主义及其负面影响进行过认真、彻底的批判和清理，致使



苏共模式的浓重阴影至今仍然顽固地纠缠着我们。

另一方面，是中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残余影响。邓小平在 1980 年的一次重要讲话中明确指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种种弊端，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又说：“我们进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这样一来，源远流长、基础深厚的中国封建专制主义思想政治影响，势不可避免地要侵蚀党的肌体，扭曲党的行为。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中国化成果向实践转化的过程中，封建专制主义残余影响屡屡要千方百计地以各种名义进行阻挠、干扰和破坏。尽管它往往要扯起一些冠冕堂皇的口号、旗帜来装潢和包裹自己，但人们只要认真地观察和思考，就能发现其“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遗憾的是，由于作为封建专制主义伴生物的奴隶主义、犬儒主义已经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了深层的社会心理结构之中，由于封建专制主义残余影响大都要依附于某种权势来借尸还魂，所以，真正去做这种观察和思考并

有勇气对其进行揭露和抵制者往往寥若晨星。这样一来，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中国化成果付诸实践的过程中，封建专制主义残余影响的阻挠、干扰和破坏总是很容易得逞，致使党的组织肌体和执政方式中那些非民主、“非共产党”的成分及病毒很难从根本上被清理和铲除。

世界历史发展至今，虽然实现民主的具体道路和方式因民族文化的差异而有一定区别，但民主的基本内蕴和共性要求已经成为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全球价值，民主发展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历史大趋势。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一百来年的历史，实际上就是逐步融入世界民主潮流的历史。可以说，滔滔黄河无论经历多少曲折和艰难，终将通向浩瀚的大海；中国民主发展无论遇到多少阻力和困难，终将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民主中国。黄河入海是势所使然，民主中国崛起于世界的东方亦是势所使然。中国共产党要肩负和完成将中国社会最终改造成为“自由人联合体”的伟大历史使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只是实现这个历史使命的一个基础），必须积极领导和推动民主政治建设，坚决铲除自己组织肌体和执政方式中的非民主、“非共产党”成分及病毒。如果让这些东西继续在党的组织肌体和执政方式中存在和扩展，那无疑是非常危险的，它势必会从党的内部来腐蚀党、摧残党、毁灭党，使中国共产党不成其为共产党，最终导致苏联共产党那样的悲惨结局。党的十六大报告尖锐地指出：“不坚决惩治腐败，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会受到严重损害，党的执政地位就有丧失的危险，党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毁灭。”严格、准确地说，党内的腐败现象不仅是指索贿受贿、贪赃枉法等职务犯罪，还应该包括党的组织肌体和执政行为中非民主、“非共产党”的成分及病毒。此二者相互勾结、狼狈为奸，后者较之前者更具有伪装性、欺骗性和讹诈性，对党的事业、党的命运的危害绝不在前者之下，必须高度警惕，坚决予以克服和铲除。

中国共产党成立 85 年来，为了实现《共产党宣言》所确定的民主和自由宏伟目标，已经进行了长期艰苦卓绝的英勇奋斗，作出了难以估量的巨大牺牲，受到了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和爱戴。这样一个伟大的党，怎么能容忍非民主、“非共产

党”的成分及病毒恣意侵蚀党的肌体并最终葬送党的事业呢？那些凌驾于人民头上的特权者，那些以权谋私的腐败者，那些假“人民公仆”之名行个人专制之实的僭妄者，那些不尊重公民权利、不关心群众疾苦的官僚主义者，哪里有资格算得上是“共产党”？他们的颐指气使、主观臆断和专横跋扈，又哪里有资格算得上是“党的领导”？从李大钊、张太雷、邓中夏到董存瑞、江竹筠，成千上万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创立的新中国，岂能让一些蠹虫盗用“共产党”的名义为他们自己及其小团伙谋取特权和私利？不，不，7000 万中共党员和 13 亿中国人民绝对不答应！人民民主的伟大事业正在呼唤着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正在呼唤着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既然能够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克服各种艰难险阻，勇往直前，不断地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也必定能够通过根本性的政治体制改革，坚决地铲除自身存在的非民主、“非共产党”成分和病毒以及其他一切腐败现象，像浴火重生的凤凰一样变得更加英姿飒爽，飞得更加长久高远。

其实，在上世纪 80 年代，在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理论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人曾经对党的组织肌体和执政方式中非民主、“非共产党”的成分及病毒发起过一场全面而猛烈的冲击。其主要矛头，直指传统政治体制“权力过分集中”的“总病根”。这个“总病根”的主要表现，“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第一书记，什么事情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惟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1987 年召开的党的十三大，对铲除这个“总病根”的政治体制改革作了全面的战略部署，并计划用十来年时间初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1989 年政治风波之后，按照党的十三大部署所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搁浅了，进行不下去了。从此以后直至现在，政治体制改革的探索，都绕开了“权力过分集中”这个“总病根”，这使得党的组织肌体和执政方式中非

民主、“非共产党”的成分及病毒不仅没有被克服和铲除,反而更加严重了。近十几年来,之所以出现了腐败现象加重、贫富差距扩大、公民权利屡遭践踏等严重问题,主要原因就是“权力过分集中”的“总病根”在作祟。民主缺乏,权力不受制约,出现这些问题势不可免。

怎样铲除党的组织肌体和执政方式中非民主、“非共产党”的成分及病毒呢?怎样铲除“权力过分集中”这个“总病根”呢?惟一正确的抉

择,就是以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理论为指导,根据新的情况制定新的战略,重续业已中断了十几年的根本性的政治体制改革,真正、全面地“坚持改革不动摇”。这是人民的愿望、历史的必然,是共产党为之献身的人民民主伟大事业的热切呼唤。我们丢失的机遇已经够多的了,现在这个难得的大好机遇实在是应该再错过了。

(作者系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山西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 李 晨)

书 名	作者或主编	定 价	邮 费
梁漱溟全集(精装八卷本)	梁漱溟	498.00	20.00
蒋介石日记揭密(上、下)	张秀章	88.00	8.00
风雨彭门	滕叙究	35.00	7.00
命运与使命——中国知识分子问题世纪回眸	冯建辉	29.80	6.00
中国农民“反行为”调查	高王凌	15.00	5.00
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张素华	38.00	7.00
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	袁 鹰	26.00	6.00
胡耀邦传	张黎群等	50.00	7.00
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	邢同义	24.80	5.00
冷石斋沉思录	吴 江	16.00	5.00
苏共亡党十年祭	黄苇町	22.00	5.00
斗室中的天下	资中筠	30.00	6.00
季羨林谈读书治学	季羨林	19.00	5.00
季羨林谈人生	季羨林	19.00	5.00
红墙大事——共和国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上下)	张树德	69.80	8.00
走进怀仁堂(上下)	董保存	55.00	7.00
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	熊向晖	39.80	7.00
刘少奇蒙难始末	图 们 祝东力	17.00	5.00
周扬与冯雪峰	徐庆全	28.00	6.00
抗战时期的蒋介石	江 涛	40.00	7.00
抗战时期的国民党军队	宋 波	40.00	7.00
侵华日军主要将帅的最后结局	朱晓艳 班惠英	40.00	7.00
大突破——新中国私营经济风云录	马立诚	36.00	7.00
唐山大地震	钱 钢	28.00	6.00
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	朱元石整理	26.00	6.00
红墙见证录(上下)	尹家民	69.80	8.00
高岗、饶漱石事件始末	马畏安	32.00	7.00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季羨林	22.00	5.00
共和国大审判——			
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亲历记	沈国凡	26.00	6.00
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汪东兴	23.00	5.00
从“童怀周”到审江青	汪文凤	18.00	5.00
刷盘子还是读书?——反思中日强国之路	钟 庆	28.00	6.00
渔光曲——安娥作词歌曲集	钟立民	18.00	5.00
家书抵万金	抢救民间家书项目组委会	23.80	5.00

代购代邮

历史是一面镜子。读史可解惑,可益智。本社对读者函询较多的有关图书,开展代购、代邮服务。

《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作者走访当时夹边沟、明水和十工等农场劳教右派中的健在者,查阅有关历史档案,历时一年半写成的心血之作。对于关心那段历史的人,是不可不读的一本书。

《风雨彭门——彭德怀家风·家事》一书记述了彭德怀元帅波澜壮阔的一生、坎坷多舛的命运和他的高尚品格坚贞气节,是一部以全新的视角研究和描写彭德怀人生的传记文学作品。材料来自彭德怀一手抚养成人的七个侄儿侄女、熟悉彭总的老将军、老干部,有极高的可信度。

《命运与使命》继《走出个人崇拜》后,这是一部系统研究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力作,一个敏感却又不能回避的历史和现实研究课题。作者以求真务实的精神,探求了近百年中国知识分子在实现社会变革、追求现代化历程中的艰难与曲折,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观点。

《蒋介石日记揭密》一直以来,蒋介石日记被列为与公众无缘的密档。该书辑录了蒋介石自1915年——1949年逐年的日记1000余则,内容主要涉及军事、政治、党务、外交以及游治、家事等活动,是人们平素难以见到的珍贵资料。该书的出版,可以使我们尽量置身于那个时代,从更多的角度去认识历史,了解蒋介石的真实面目。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 编:100045 收款人:炎黄春秋杂志社

(注:代购三本书以上,可按总书价的10%付邮费)

感谢巴金 敬仰巴金

丁磐石

最先的指引人

世纪伟人巴金逝世，文坛巨星殒落，我亦痛悼，这是因为他一再指引我在险阻坎坷的人生道路上应如何行进。我感谢他，敬仰他。

与巴老相同，我也出生于四川成都的一个封建大家庭，时间是上世纪二十年代末。我的子侄要我谈我们祖辈的大家庭时，我常说：“你们看看巴金的《家》，就可以大致知道我们封建大家庭的情况。”巴老的祖籍是浙江嘉兴。他的高祖父李介庵在清嘉庆年间入川为官后落户于成都，我家祖籍是江苏丹阳，我的曾祖父在清同治时到川做官后也定居于成都，且与巴老家多有交往而沾亲带故。

巴老在1957年《家》再版时所撰的《和读者谈家》的文中说过：川西盆地的成都正是官僚地主聚集的城市，“在这种家庭中长一辈是清代官员，下一辈靠父亲或祖父的财产过着奢侈、闲懒的生活……长一辈的人希望清朝复辟，下一辈不是‘关起门来做皇帝’，就是吃喝嫖赌，无所不为；年轻的一代却立誓要用自己的双手来建造新的生活。”我出身的封建大家庭的情况与巴老的家可谓大同小异。不过，到二三十年代后，我的家庭却逐渐资产阶级化了。我的伯父叔父多投资于银行、组建公司，经商了。但在家庭生活中仍恪守封建礼教，凡事都是家长说了算，讲究“三从四德”，还多包办婚姻，家人亲戚之间也多闲言碎语，是是非非，尔诈我虞。我父亲一直是个科级公务员，靠工薪生活。抗日战争发生，物价不断飞涨，我父亲养家发生困难，就常受到很势利的家人亲友的奚落。我少时生活在这样的大家庭

里，感到压抑、郁闷。

我上初中了，许多同学都在看巴老的《家》，谈论《家》，我看这名著后大开茅塞，我觉得自己也应当学习智慧，要多读新书，力求进步，将来一定要走出封建大家庭，走出四川，到外边的广阔天地去。

1944年冬，我高中毕业了，翌年春，我在成都考入由北平迁来的燕京大学。我一进燕大，就呼吸到许多民主自由的新鲜空气，还参加了爱国学生运动。抗日战争胜利了，1946年夏，在我四伯父的支持、资助下，我随燕大复员到北平继续学业。以后两年多，我生活在美丽的燕园，既多得名师的教导，又受到学生运动的更多的火热锻炼，我的知识大增，思想更有飞跃的进步，我入了党，走上了革命的光明大道。

就因为如此，我感谢巴老给我的指引。我渴望见到他。四十年代初，我也得知他两度回到成都，但少年的我，引见乏人。我从幼时起，在我们大家庭中，就和我的堂姐丁秀涓因为在学习上能相互砥砺切磋，所以感情最深。抗战胜利后，涓姐考入了重庆大学，在学运中与巴老的亲侄子、也在重大学习的李致结识，他们志同道合，彼此相恋，解放初结了婚，我家与巴老家更亲上加亲了。但巴老居上海，李致夫妇在四川工作，我在北京，天各一方，且均常遭受政治折磨，我仍然无法见到巴老。直到“文革”结束，我们都得到解放，1979年，巴老到京参加全国人代大会，我才能去拜访巴老，受到他的亲切接见。以后我两次出差上海，都去过他的家，得以面聆他的教诲。

1979年，我第一次在京见到巴老时，他已年过古稀，白发苍苍，但却精神奕奕。他告诉我，他打算写一长篇小说，反映这些年来知识分子所经



巴金

受的巨大苦难。看来多半是时势的急迫需要，他就学习当年的鲁迅，改用便捷、犀利的“匕首”、“短剑”迅速投入了拨乱反正的火热战斗。这就是他在以后的几年里所写出的一篇又一篇的《随想录》散文。一共一百五十篇，四十余万字，共分五集。它有力地控诉林彪、“四人帮”的罪行，深入地揭露、剖析出“左”的封建专制主义的巨大祸害，阐明我们所应吸取的惨痛历史经验教训。文化界称道此书是一部力透纸背、情透纸背、热透纸背的巨著，是一部代表当代文学界最高成就的散文杰作。

反专制主义的先驱

十年“文革”，给我们的国家、人民带来史无前例的浩劫，许多老革命家、领导干部、知识分子都被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被打翻在地。巴老是名满中外的大作家，竟也在劫难逃，而身受折磨迫害。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在抗战时期，他是“身经百炸”，而这次是“身经百斗”。1966年8月，他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副团长出席并主持在北京召开的亚非

作家代表大会。大会闭幕，他送走了外国作家代表团，一回到上海，就立刻被造反派揪斗，由“座上客”沦为“阶下囚”。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批斗会，家被抄，藏书被查封，作品成为禁止发行出售的“邪书”。他的家属也大受株连，他心爱的妻子萧珊更受尽红卫兵等的凌辱，不久就得了癌症，因缺乏治疗而不幸亡故。

万恶的“四人帮”被粉碎了，“文革”收场。不知有多少人痛定思痛，在反思我们祖国为什么遭此大难。“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个人崇拜、个人迷信空前盛行，人人都佩戴像章，手拿红宝书山呼万岁。凡此种种离奇古怪的现象，不得不使人深思，追本溯源。好些有识之士都悟出这是我国两千多年来所奉行的封建专制主义余毒作祟所致，他们大声疾呼应该批判、清除封建专制思想，巴老也是一位站在这场反对封建专制主义斗争前列的先驱勇士。

巴老出身于旧社会的封建大家庭。他在《随想录》中说过：“有人断定《家》已‘过时’，可是我今天还看见各式各样的高老太爷在我们周围徘徊。”身受封建思想之苦的巴老对封建势力是有敏锐的洞察力的。早在1979年初，他在《随想录》第一集中就写道：“十多年来流行的那一整套，例如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剪忠字花，敲锣打鼓半夜游街，等等。这些东西是从哪里一下子跳出来的？我当时实在想不通。但是后来明白了，它们都是从旧货店里给找出来的，我们有的是封建社会的破烂货，非常丰富。”巴老又用自己在“文革”中的亲身经历说，他在每次被批斗之后，都有人找他谈话或要他写思想汇报，“总之他们要我认罪，承认批斗我就是挽救。”这时巴老就想起自己六七岁时候他的父亲在四川广元县当县官，他常去参观审案。被告人不肯讲就挨打，打完了还要给县官大老爷叩头谢恩。巴老指出：“那些在批斗会上演戏的人，他们扮演的不过是‘差役’一类的脚色……他们的戏箱里就是只有封建社会的衣服和道具。”

也正如巴老所说，中国封建文化有两千多年的深厚积累，搞封建专制主义的人都把它当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从西汉武帝时起，中国的专制统治者就一直是软硬兼施，表面上讲德治仁义，骨子里却使用暴力的统治。所以历史上称

之为“亦儒亦法”、“儒法交融”，或者“儒表法里”、“阳儒阴法”。儒法合流，这是中国封建统治史的主线，但“四人帮”的写作班子“罗思鼎”等却大写文章篡改历史，胡说什么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着儒法两条政治路线的尖锐斗争，法家是“进步”的、“革命”的，儒家则反之，是保守的，落后的。据此他们大搞“批孔”、“批儒”，吹捧抬高法家，一味叫嚷要学习秦始皇厉行法家学说。这就表明他们要效法秦始皇，严刑峻法，焚书坑儒，“偶语者弃市”，“腹诽者诛”。他们要赤裸裸地对人民采用更加残暴的专政。在这个问题上，巴老也有清醒的认识、尖锐的批评。他说：“‘四人帮’打起‘左’的大旗，大吹批孔，其实他们道道地地的在贩卖旧货。”“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很大的收获，‘四人帮’之流贩卖的那批‘左’的货色全部展览出来，它们的确是封建专制的破烂货，除了商标，哪里有一点革命的气味！……他们为了推行他们所谓的‘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不知杀了多少人，流了多少血。”

巴老还沉痛地指出：“我常常这样想，我们不能单怪林彪，单怪‘四人帮’，我们也得责备自己！我们自己‘吃’那一套封建货色，林彪和‘四人帮’贩卖它们才会生意兴隆。”“封建毒素并不是林彪和‘四人帮’带来的，也不曾让他们完全带走。我们绝不能带着封建流毒进入现代化的社会。”今天我们还必须大反封建。

对“长官意志”的剖析

巴老对封建专制主义有很深入的批判还表现在他对“长官意志”问题上的有力剖析。唐代韩愈在其所著的《原道》一文中说过：“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财货，以事其上者也。”两千多年来，在实行封建专制的中国，封建皇帝就是靠其臣下，即官僚来役使平民百姓从事农业、手工业及商业以事其上，即供养皇帝和官吏，而平民百姓却不得违抗，否则就会受到严惩甚至诛戮。“民少官多，十羊九牧”，在专制的旧中国官尊民卑，官贵民贱，官管民称为“牧”，其意就是官吏把老百姓看作是羔羊那样来“放牧”的，老百姓得完全听从当官的驱使。遗憾的是这种封建

残余在解放后还有不小的影响。巴老在《随想录》中把它称作是“长官意志”问题而加以揭露、批判。他指出，在很多场合、很多情况下，都是当官的，即长官说话才算数。比如“文革”时期，在“四人帮”及其爪牙的心目中，文艺也好，作家也好，都应当是他们的驯服工具。他们随便胡说什么，都有人吹捧，而且要人照办。巴老说，在我国，“小孩相信大人，大人相信长官”，对长官的信从，由来已久。“既然我们相信长官，长官把我们带到哪里，我们就只好跟到哪里。长官是江青，就跟着江青跑，长官是林彪，就‘誓死保卫’，甚至跳忠字舞，剪忠字花”。有人问：“难道这是一场大梦吗？”当然不是，这是活生生的现实。

在这样的风气熏染下，确使“一些人习惯了把‘长官意志’当作自己的意志，认为这样，既保险，又省事。”这样就出现了种种怪现象。一是长官讲话，做报告，本来是正常的事，但是却有些作家喜欢伸起头辨风向，伸出鼻子闻闻空气有什么气味，以便根据风向和气味写文章。巴老以自己为例说：有人也劝过他，说要他“下笔时小心谨慎，头伸得长些，耳朵放得尖些，多听听行情，多看看风向，说这样可以少惹是非，平平安安活到八十、九十。”二是“让人人都给逼上了这样一条路，不得用自己的脑筋思考。不能不靠贩卖别人下的结论和从别人处搬来的警句过日子。”许多人都成了人云亦云、鹦鹉学舌，或者是没有脑子的“留声机”、“录音磁带”、“机器人”，这确是很可悲的。

人们还常常看到，有好多长官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或荣升，总是好夸大自己的政绩而常文过饰非，撒谎骗人。把长官意志作为自己的意志，就必然会一味歌功颂德，阿谀逢迎，说假话，散布谎言。随着“文革”时专制主义的日益加强，上欺下骗更蔚为风气。为此巴老痛心疾首地慨叹：“在那荒唐而又可怕的十年中间，说谎的艺术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谎言变成了真理，说真话犯了大罪。”

但是无情的铁的事实总会把谎言戳穿。巴老就指出：“文革”中出现的种种事实，使他“早就不相信‘四人帮’那一套鬼话。我看见中国人民越来越穷，而‘四人帮’一伙却大吹‘向着共产主义前进’。报纸上的宣传和我在生活中的见闻

全然不同。”所以他最后的结论是谎言就是谎言，“哪怕是给铺上千万朵鲜花，谎言也不会变成真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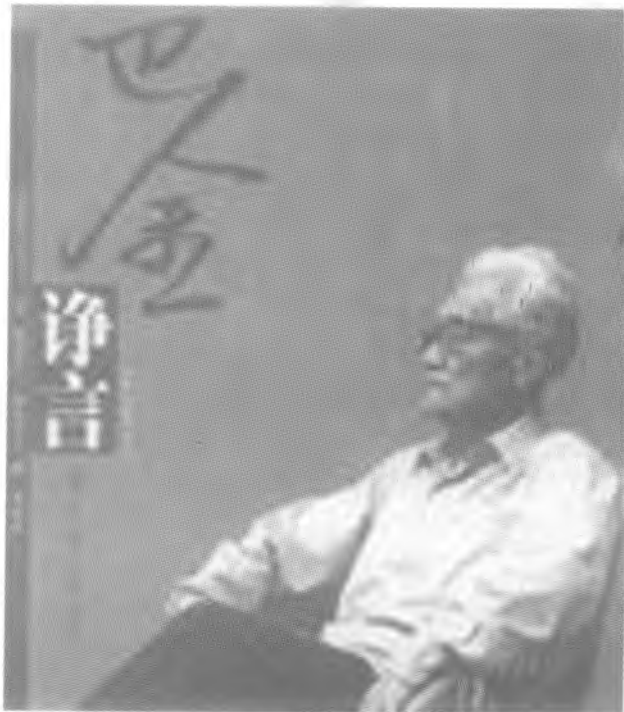
“知识”是“罪恶”吗？

巴老在批判封建专制主义时，也着重谈了知识和知识分子的问题。“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在旧中国，统治阶级实行专制主义时，必然会推行蒙昧主义，而用焚书坑儒、文字狱之类的手段来压制知识分子之事史不绝书。令人想不到的是，这类情况在社会主义新中国还时有出现。“知识即罪恶”，“知识越多越反动”，“九儒十丐”，知识分子竟被贬为“臭老九”。为什么这样对待知识分子？巴老指出：“思想复杂的人喜欢胡思乱想，思想会长眼睛，想多了，会看见人们有意掩饰的东西，会揭穿面具下的真容。”所以有些人“就是害怕知识分子这一点‘知识’，担心他们不听话，惟恐他们兴妖作怪，总是挖空心思对付他们。”

巴老描述这情况时就指明，那些人采用的重要的办法就是学习《西游记》，给知识分子戴上“紧箍帽”。唐僧就向不听话的孙悟空说过：“当时只为你难管，故以此法制之。”巴老说：“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起，我就给戴上‘紧箍帽’……我所认识的那些知识分子都是这样。从此我就一直战战兢兢地过日子，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人念起‘紧箍咒’来叫我们痛得满地打滚，我们确实相信念咒语的人不会白白放过我们。”

果然不出所料。这也就是巴老所说的：“不管我如何虔诚地修行，但始终摆脱不了头上的‘紧箍帽’。”特别是“文革”的暴风雨袭来了，大革文化的命，大反“封、资、修”，打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林彪、“四人帮”害怕知识分子容易看出他们的破绽，他们就更加仇视知识分子，更疯狂地摧残、迫害知识分子。“今天听说这位作家自杀，明天听说那位作家受辱，今天听说这个朋友挨打，明天听说那个朋友失踪……”对巴老这样正直而又很有影响的大作家，他们自然更恨之入骨。张春桥就咬牙切齿地宣称：“不枪毙巴金就是落实政策！”

巴老在《随想录》的《探索集》中还转述了



巴金著作的封面

一个外籍华人、一位知名的女作家的很感人的谈话。她说：“中国知识分子是很了不起的，他们是忠诚的爱国者。西方的知识分子如果受到‘四人帮’时代的那些待遇，那些迫害，他们早就跑完了，可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不管你给他们准备什么条件，他们能工作时就工作。”情况难道不是这样？但是“文革”的恶浪却夺去了好多这样爱国知识分子的生命，如巴老的知友老舍、冯雪峰等等。他们中不少人被迫害致死，竟尸骨无存。在以后平反、举行悼念仪式时，放在骨灰盒里的只是他们生前用的眼镜或金笔。想到这些，巴老不禁重述老舍的名著《茶馆》里的常四爷所说的：“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们呢？”巴老认为，这也可说是老舍的遗言，值得我们深省。

严于解剖自己

巴老曾是多受鲁迅教诲的作家。他说鲁迅和卢梭都是照亮他前进道路的人。鲁迅“一生探索真理，追求进步，他勇于解剖社会，更勇于解剖自己，他不怕承认错误，更不怕改正错误。”巴老也以鲁迅为学习榜样，在《随想录》中他既解剖社会，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同时也在不断解剖自己，承认自己也有错误。他说：“我的文集里虽然没

有‘遵命文学’一类文字，可是我也写过照别人的意思执笔的文章，例如批评过被张春桥诬为‘大毒草’的剧作《不夜城》。”巴老还告诉我们，1957年，他到北京参加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这次大会批判冯雪峰、丁玲和艾青，是要给这几个人戴上右派帽子的，巴老和作家靳以就在会上作了联合发言。在《随想录》的《纪念雪峰》一文中，他表示为此十分内疚、痛悔。他说：“这二十二年来，我每想起雪峰的事，就想到自己的话，它好像针一样刺痛我的心，我是在责备自己。我走惯了‘人云亦云’的路，忽然听见大喝一声，回头一看，那么多的冤魂在后面‘徘徊’，我怎么向自己交代呢？”

“别人‘高举’我就‘紧跟’，别人抬出‘神明’我就低首膜拜”。巴老在《随想录》的《探索集》中还说自己曾是个“歌德派”，“紧跟”过上边的“叫某国落后”、“叫钢铁听话”等豪言壮语。他说：“我当初的确认为‘歌德’可以鼓舞人们前进，多讲些成绩可以振奋人心，却没有想到好听的话越说越多，一旦过了头，就不可收拾。”“实践的结果证明空话没有用”，这就犹如开支票，支票要能兑现，“当然越多越好，越‘歌’越好，倘使支票到期不兑现，那就叫空头支票，这种支票还是少开为好。”

巴老在《随想录》的《真话集》中还谈到了



巴金夫妇

专制主义所造成的奴隶主义问题。他引用民国初年名翻译家林纾(琴南)所译的英国小说中的一句话：“奴在身者，其人可怜，奴在心者，其人可鄙。”他说：“我也万万没有想到小说中的一句话竟然成了十年浩劫中我自己的写照。”他说自己在“文革”中挨批斗时，按时写《思想汇报》，引用“最高指示”痛骂自己，就反映自己是“奴在心者”，“而且是死心塌地的精神奴隶”。张春桥、姚文元之流的“青云直上”，就“是踏着奴仆的身体上去的，我就是奴仆中的一个”。

巴老为何这样自嘲，这样严于自责？1982年，他在《随想录》的日译本的序中说，日本读者也知道我们经历了十年的浩劫，但十年浩劫是怎么一回事，他们也可能讲不清楚。“我以为不是身历其境，不曾身受其害，不肯深挖自己灵魂，不愿暴露自己的丑态，就不能理解这所谓的十年浩劫。”所以他还要续写《随想录》，深挖自己的灵魂，虽然越往深挖，就越痛，也越困难，但“必须挖得更深，才能理解更多，看得更清楚”。

细读巴老的《随想录》，我们会深深感到巴老理解最深，看得最清楚的，就是“哀莫大于心死”，最重要的就是需要解决“奴在心者”的问题。他在《随想录》的《探索集》中就指出：“张春桥、姚文元就要给押上法庭受审判了，他们会得到应有的惩罚，但他们散布的极左思潮和奇谈怪论是不会在特别法庭受到批判的。要澄清混乱思想，首先就要肃清我们自己身上的奴性。”这样，大家才有独立人格，才肯独立思考，这样的人“就不会让人踏在自己身上走过去”。

真话与真理

上世纪四十年代初，巴老回家乡成都探亲，他给李致写的四句题词的后两句是“说话要说真话，做人要做好人”。他们叔侄情深，特别是在“文革”后期和“文革”后，李致更常去上海、杭州看望巴老，他们多作长夜谈。李致多得巴老教诲，对巴老的了解也很多很深。巴

老一再对李致说：“人各有志，最要紧的是做人。”在《随想录》中，巴老也反复说过这样的话：“人类总是在探索中前进的”，“怎样做人，怎样做一个好人，我几十年来探索的就是这个问题。”在巴老心目中，要做一个好人，具体地说，就是不要再迷信、盲从，再唯唯诺诺，再人云亦云，再阿谀迎合，说假话，散布谎言，而要有独立精神，肯多动脑筋，独立思考，敢说自己心里的真话，勇于探索真理。我们就应该做这样的好人。

在这里，巴老更十分强调，应该学习鲁迅，“为了真理，敢爱，敢恨，敢说，敢做，敢追求”。而敢说则是重要的关键。巴老着重指出：“说真话才能认真地活下去。”

有人说：“真话不一定就是真理。”对此，巴老的解答是：“我所谓的真话不是指真理，也不是正确的话。自己想什么就讲什么，自己怎么想就怎么说——这就是说真话。你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意见，讲出来让大家理解你，倘使意见相同，那就在一起作进一步研究，倘使意见不同就进行认真讨论，探求一个是非。”这样就会求得真理，所以巴老更进一步指出：“要把新中国建设成社会主义乐园，恐怕也得靠复杂的集体智慧，靠九亿中国人民。”这也就是说，只要大家都能有充分的言论自由，都能讲真话，发表自己的意见，就能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切磋琢磨，求得推进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种种真知灼见，也就可获得真理，使我们国家有更好更大的发展。

身体力行

在此，我们也应该看到，无私才能无畏，我们要敢于讲真话，敢于探求真理，就必须无私，富有爱国爱民的公心。而在这个问题上，巴老也是一个典范。他说真话，大力揭露控诉“左”的封建专制主义的危害，就是为了避免“文革”那样的劫难重演，使国家人民、我们的子孙后代不再受折腾，不再受痛苦。他说他写作，就是“把笔当作火，当作剑，歌颂真的、美的、善的，打击假的、丑的，恶的，希望用作品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有所贡献”。“我只要一息尚存，我那一点微火就不



巴金骨灰洒入大海

会熄灭。是什么火呢？就是对祖国对人民的爱。”

“写作和生活是一致的，作家和人是一致的，人品和文品是分不开的。”巴老也学习鲁迅既重文品，更重人品，他爱祖国爱人民火热的火不仅反映在作品中、言谈里，也表现在实际生活上。他是一个说得到就做得得到，身体力行、言行高度一致的人。他说：“一个人为自己服务的时间越多，他为人民服务的时间就越少。”他十分欣赏李商隐的诗句“春蚕到死丝方尽”，力求自己像春蚕一样，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丝也未尽，要尽量多为人民写作。李致在他的《我心中的巴金》一文中也告诉我说：“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而不是索取。”法国大作家雨果的这一名言就是巴老的生活信念、守则，粉碎“四人帮”后不久，巴老即患帕金森氏症，几次摔跤骨折，举笔重千斤，但他仍在坚持写作。他是不拿工资，全靠自己稿酬生活的作家，他向来对自己的物质生活要求不高，有了稿酬就常拿去帮助有困难的读者和亲友。仅1982年，他一次就捐了十五万元给现代文学馆，这在当时是一笔很大的数目。对“希望工

程”和救灾，他也常请家属或工作人员隐名捐款。四川人民出版社出了他四本《巴金近作》和《巴金选集》(十卷本)，他拒不收稿酬。出版社为他翻洗照片，他亲自到邮局汇还用费四十一元一角。他的大量藏书也已多次分别捐赠给国家图书馆。

巴老也说过：“生的很美的人并不需要浓妆艳抹，而我的文章就像一个奇丑的人，不打扮，看起来倒顺眼些。”他就是一位不愿粉饰自己，炫耀自己，朴实无华的人。1981年，四川人民出版社拟用他的稿费设立巴金编辑奖，他很不赞成，只同意用来帮助青年作者。1994年，四川省作协拟设立巴金文学奖，巴老去信说：“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文艺工作者，写了六十多年，并无多大成就……设立‘巴金文学基金’，设立‘巴金文学奖’又使我十分惶恐，我一向不赞成用我的名字建立基金会，设立文学奖。”

希望理解

巴老曾对李致说过：“能够多活，我当然高兴。但我离开世界之后，希望更多的人理解我。”巴老对人真诚，总是把心交给读者，广大读者是理解巴老的。但由于种种原因，在大半个世纪中，巴老受到过一些误解，甚至是指责。这主要的就是指责巴老曾是“无政府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我也很同意李致的意见。是的，巴老早年信仰过无政府主义。那时许多知识分子也是如此，如毛泽东就是其一。应当说，无政府主义反对权威，反对专制，强调个性自由，它虽属空想社会主义，但在反对旧社会的专制统治中，起过积极的作用。巴老早年是无政府主义者，同时也是爱国主义者。他积极参加“五四”新思想启蒙运动，继而又坚决拥护抗日战争和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的专制独裁，因此鲁迅在三十年代就称赞“巴金是一个有热情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

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一些评论家又指责巴老的作品只是揭露了旧社会的腐朽，但青年人离开封建家庭以后应该干什么，作者就没有给读者指明出路。我觉得这种指责也是值得商榷的。反帝反封建是我们在百

年来，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前所要完成的首要革命任务。巴老的作品深入揭露封建专制社会的黑暗，呼吁青年走出腐朽没落的封建大家庭，到广阔光明的新天地去。这就必然促使青年投向共产党领导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反对蒋介石反动政府专制独裁统治的人民革命洪流。这怎么不是给青年指明了出路？在这方面，不仅我自己是一个例证，而且有人还作过调查，当年很多奔赴延安、献身革命的知识青年，都是受了巴金小说《家》的影响。这种情况，毛泽东于1945年去重庆和谈时也亲自同巴老谈过。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建国以后，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遇到不少的坎坷、挫折。邓小平说：“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这就表明还需要很好地进行探索。巴老这些年来也在探索，他着重探索的就是在社会主义时期应该怎样做，做怎样的好人。再概言之，就是要清除自己身上的封建专制主义的余毒，好好净化自己的灵魂，为国家人民利益着想，敢说敢做，求真务实，不断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真理。做这样的好人，就会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站得直，走得稳，就会对祖国人民作出优异的贡献。

这又是巴老对我们的再次指引，而且是在根本问题上进行的很好的指引。因此我更理解巴老，“高山仰止”，我也更感谢巴老，更敬仰巴老！

现在，巴老走了，我特别赶写此拙文，聊作我的心花，敬献在巴老的灵前。

(责任编辑 李晨)

敬告读者

《炎黄春秋》合订本库存数量已不多，欲购请速汇款。历年合订本价格如下：

2006年精装	85元；	简装	80元
2005年精装	75元；	简装	70元
2004年精装	75元；	简装	70元

注：以上均免收邮费

汇款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收款人：炎黄春秋杂志社

邮政编码：100045 电话：010-68532048

“六多”将军范明

李敏杰 赵仕枢

老梅愈老愈精神，一树红花发早春。

不畏风寒不畏雪，暗香竦影伴松筠。

这是著名书画家宫葆诚赠给范明将军的一幅梅花国画旁款的铭诗。就在梅花吐红的季节，我们在古城西安南郊一干休所，拜访了一生传奇、坎坷的范明将军。

尽管老将军年过九旬，眉发皆白，但他耳聪目明，步履矫健，精神矍铄。看到老将军如此精神风貌，让我们想起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李维汉1980年在范明冤案大白天下之后接见他时，感慨地夸他“多才多艺、多灾多难、多福多寿”的赞语来。

毛泽东为他取名范明，为国民党三十八军起义尽心尽责

范明原名郝克勇，1914年12月4日出生在陕西省临潼县栎阳镇郝邢村一个耕读世家。父亲郝鹏程是西北军的创始人之一，曾在杨虎城麾下任特种兵营长。郝克勇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加上天资聪颖，10岁便能通背《四书》、《五经》和唐诗宋词数百首，还可以撰写叙事明理的短文，并将传统中医书《千金方》背得滚瓜烂熟，能为乡亲们开方子治病，由此在家乡成了有名的神童。

郝克勇的大哥郝克俊在大革命时期，由当时任中山大学政治部主任的邓小平介绍，同王炳南、张策一起加入共产党，毕业后被党派到杨虎城部任一连指导员。1928年杨虎城送郝克俊到上海政法大学上学，并成为该校共产党的负责人。1929年郝克俊把郝克勇接到上海考入建国中学上学。1932年上海“一·二八”淞沪事变爆

发，郝克勇与同学沿街募捐，把市民捐献的慰劳品送到了十九路军驻地，并随大哥参加了十九路军的抗日义勇军。同年5月，他参加了共青团。1933年考入上海复旦大学，主修中文和哲学。1935年冬又考入国民党财政部开办的盐务税警官佐学校。这所学校的教官全是冯玉祥送到美国西点陆军大学的毕业生和张学良东北讲武堂的毕业生，其中还有一批共产党员。毕业后，郝克勇被分配到贵州天柱县当盐务税警分队长，因扣留了湖南省主席何键的走私盐船，得罪了何键，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后，何键乘机把郝克勇打成“小杨虎城”，迫使他于1937年3月返回西安，后考入东北大学政经系三年级继续学习，并加入了民先队，组织了抗日救亡团体“夏艺学会”，由他担任会长。1937年秋，郝克勇率领“夏艺学会”大多数学员，转到了安吴青训班，见到了冯文彬、胡乔木，沟通了与共青团组织的关系。

1938年初，郝克勇由共青团转入共产党。2月，赵寿山在陕西三原成立十七师教导大队（赵5月任三十八军军长后，改为三十八军教导大队），党组织因郝克勇与杨虎城和赵寿山的特殊关系，派他到教导大队任政治教官。

1939年春，中共陕西省委成立了三十八军地下工作委员会，由蒙定军、胡振家和郝克勇3人组成。郝克勇充分利用《新华日报》、《大公报》和《大众哲学》，以及三十八军出版的《新军人》等进步刊物，对部队进行政治教育，同时还利用电台收抄新华社来的消息、社论，以及毛主席的《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等，写出了《党的建设和三大法宝》、《中国走向何处去》、《莲出于污泥而不染》、《共产党员须知》等文章和教材，对党员和进步军人进行经常

性的思想教育和政治培训。郝克勇始终坚持毛主席给抗大提出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开设了抗日政治工作、游击战术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课程。与此同时，他还在教导队建立了党的组织，秘密开展党的兵运工作。

1940年12月上旬，蒋介石侍从室通过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给孙蔚如发了一份绝密电报，指名三十八军蒙定军、郝克勇等37名军官为共产党的嫌疑分子，着令押送洛阳审讯处理。赵寿山得知后，当即让郝克勇装病即日请假离开教导大队隐蔽起来。1941年5月形势缓和后，赵寿山又委任郝克勇为第三期教导队队长。

这年秋天，赵寿山与共产党密往之事被蒋介石嗅出点气味后，即派其嫡系汤恩伯的6个军，将三十八军控制起来。为了使三十八军摆脱日益恶化的处境，1942年7月，毛泽东亲自给赵寿山发电报，点名要郝克勇到延安向中央汇报工作。

9月，工委派人将郝克勇护送到陕西，中共陕西省委交通卫平历经千难万险，于12月将他护送到延安。抵达延安后，郝克勇先向西北局的李维汉、贾拓夫等汇报了工作，紧接着毛泽东又多次召见他。在听取郝克勇的汇报时，非常仔细地询问了工委开展工作的情况，同时对工委提出的统战工作、对敌斗争策略以及应变方案，作了反复的研究和讨论，对三十八军工委作了全面的肯定和指示。当郝克勇向毛泽东反映赵寿山希望能加入共产党时，毛泽东同意批准了赵寿山的请求。

就在最后一次交谈中，毛泽东突然问起郝克勇舅家的情况：“你舅舅家姓啥子？”“姓范”郝克勇答道。毛泽东接着问：“是范仲淹的‘范’，还是樊梨花的‘樊’？”“是范仲淹的范。”

毛泽东说：“好，那就把你的名字改成范明吧！做秘密工作的同志回到延安，都应该改名换姓。”从此，郝克勇以“范明”应世。解放后，他曾申请改用原名，毛泽东在一次接见他时认真地说：范明这个名字现在名扬中外，还是不改为好。

在此之前，范明受周恩来、李维汉同志的领导，打这以后，他只与毛泽东单线联系。我们在采访范明时，还亲睹了他开展白区布点统战工作时毛泽东给他的100余份电函。

1943年，冰消雪融的时节，范明辗转千里从

延安返回了三十八军，向工委和赵寿山将军传达了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根据中央指示，赵将军同意送蒙定军到陆军大学“镀金”，工委书记由范明担任。此时，这支部队的官兵尽管穿的是国民党的衣，吃的是国民党的饭，但实际上却是在党领导下的一支进步和爱国的军队。

在党中央、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从1938年2月至1944年4月，工委在国民党三十八军共举办了5期教导队，培养了约2000名干部，其中发展党员500余人。这批干部、党员，对改造旧三十八军和1944年的第十七师“七·一七”故县起义及1946年第三十五师的“五·一五”巩县起义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此后，范明即调往国民党第三集团军，以给赵寿山当营长的名义开展工作，随后与赵寿山同时离开三十八军，经西安到达延安，完成了对三十八军的统战工作。到延安后，范明被任命为西北局统战处处长。1945年9月日本投降后，西北局派范明负责进行西北5省以及河南和川北白区地下党的布点任务。范明经过周密细致的工作，共派遣了百余人，建立了108个武装据点。其中胡宗南的随身副官张德厂就是他一手安插进去的一个关键性人物。这种秘密的但又无时不在、无处不有的地下隐蔽工作，搞得国民党反动派焦头烂额，狼狈不堪。

进军西藏征服唐蕃古道，护送十世班禅顺利返藏

解放大西北的战争展开后，范明被任命为第一野战军政治部秘书长兼联络部长，经常撰写各种重要公文，彭德怀亲切地称他为“军中翰林”，有时还开玩笑地叫他“范大人”。

大西北是多民族聚居区，彭德怀指示范明搞好调查研究，对马家军在军事打击的同时，做好政治争取和民族宗教工作。范明在部队进军战斗的间隙，很快写出了《战时政治工作》、《心战》和《回族工作手册》等材料，加强了对部队的统战工作和民族政策教育。

还在兰州解放前夕，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关于解放西北方针的指示》电报中明确指出：请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在青海的班禅及甘、青境

内的藏族人，为解决西藏问题做好准备。于是，彭德怀便将争取班禅这一艰巨任务交给了范明。

辛亥革命后，英帝国主义乘国民党中央政府初告成立，政局动荡不稳之机，挑拨西藏当局同中央政府的关系，唆使西藏统治

集团驱逐清朝驻藏大臣，逼迫川军退出藏境。此时，正值十三世达赖和九世班禅在位。达赖住在前藏拉萨的布达拉宫，班禅住在后藏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后因达赖派兵驻扎后藏，致使两位活佛交恶，班禅于1923年11月15日出逃到青海，1937年12月1日在青海玉树含恨圆寂，终年54岁。十世班禅1938年2月3日出生于青海循化县温都乡，1941年被认定为九世班禅转世灵童。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于1949年6月3日颁发了承认青海灵童并“免于金瓶掣签”的命令，同年8月10日，在西宁塔尔寺举行了“坐床”典礼，后为避免战火，迁住海西香日德隐居。

范明受领任务后，前往西宁，配合中共青海省委、省军政委员会到塔尔寺，做班禅的工作。经过各方面的努力，使班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之际，向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及彭德怀副总司令发出了致敬电。1949年11月23日，毛泽东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复电班禅，赞扬西藏人民是爱祖国而反对外国侵略的，“希望先生（班禅）和全西藏爱国人士一致努力，为西藏的解放和汉藏人民的团结奋斗。”

1950年8月25日，班禅在范明帮助下，在解放军的护送下，与行辕人员一同离开香日德，返回塔尔寺。

这年的10月初，彭德怀限范明在一个月时间内去迪化市（今乌鲁木齐市）任党委书记兼市长。就在范明准备进疆时，突然接西北军区政治部主任甘泗淇的通知，告诉他准备跟随彭总去抗美援朝。不几天，西北军区副司令员张宗逊又通



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翻越青藏高原

知他，要他仍然负责进军西藏的任务。对“一月数变”，范明至今仍然记忆犹新，他笑着对我们说：“不管咋变，作为一名党员、一个军人，都要听组织的、听领导的。最后彭总抗美援朝去了，我仍然组织部队进军西藏，我和彭总就此分手了。”

1951年1月，范明被任命为西北西藏工委书记和西北军区进藏部队司令员兼政委，2月27日，西北军政委员会又根据中央的决定，任命范明兼任西北军政委员会驻班禅行辕代表。从此，他便与班禅结下了不解之缘。

这年4月，在周密安排下，时年13岁的班禅在范明等陪同下抵达北京，受到朱德、周恩来、李济深、李维汉，以及民族学院师生、北京市的居士、喇嘛和在京的藏族人士代表极为庄重热烈的欢迎。周恩来在与班禅互赠哈达后，紧紧握住范明的手说：“你为中国的统一立了一次大功，我代表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感谢你。”

“五一”国际劳动节，范明又与李维汉一起陪同班禅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在班禅向毛泽东敬献了哈达后，毛泽东很高兴地对班禅说：“在西藏，你比我说话管用，所以西藏的解放主要还得靠你！”同时，他对范明的精明能干赞赏了一番，并要求他用3年时间学会藏语。

从5月2日开始，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与西藏地方全权代表，经过十多天的会谈磋商，终于恢复了十世班禅的固有地位和职权，并于5月23日达成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



十世班禅送给范明的签名照片

接着，范明又陪同班禅一行到天津、上海、杭州等地参观了一个多月，使班禅亲身感受到了人民翻身作主人的新中国蓬勃向上的新风貌。

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达成后，为了贯彻执行协议，促进西藏内部的团结，实现班禅荣返西藏，根据中央对班禅入藏工作人员先去、班禅后去的指示，于1951年7月组织了班禅行辕200余人，命名为“班禅行辕入藏工作委员会”，随范明率领的西北军区入藏部队（途中又改称十八军独立支队）入藏。

8月28日，范明率部及班禅行辕入藏委员会一行4000人，8000头牦牛、马匹，1000多峰骆驼，沿着当年文成公主进藏的唐蕃古道，踏上了进军西藏的征程，一路上经历了高原反应、严寒酷暑、山洪阻拦、缺粮少食、土匪袭击和强烈地震等艰难险阻。

历经4个月的千辛万苦，进藏部队穿越柴达木盆地，攀上终年积雪的昆仑山和唐古拉山，踏过黄河和长江的源头，行程3000多华里，于12月1日胜利抵达西藏拉萨，20日与张国华率领的第十八军在布达拉宫前的广场上举行了胜利会师大会。

“历史上部队进藏曾有过4次，一次是薛仁贵，三次是马步芳，但他们都在半道就全军覆没

或返回了。从北路进军西藏取得胜利的第一支军队，就是我们！”范明对能够亲历半个世纪前的那段历史，始终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

根据中央和西南局的指示，西南西藏工委和西北西藏工委合并，组成统一的中国共产党西藏地区工作委员会，张国华任书记，范明任副书记，还于1952年2月10日成立了西藏军区，范明被任命为第一副政治委员。1955年范明被授予少将军衔。

1952年6月，班禅一行近2000人离青返藏。抵达拉萨东郊胜利塘时，范明和西藏的党政军领导同志到驻地迎接和看望班禅，祝贺他荣返故里。

班禅进入拉萨时，一些反动分子暗中采用军事和政治手段对我党的政策和班禅进行攻击，散布谣言说班禅是毛泽东的三儿子，是假班禅。班禅住在大昭寺的第二天，其“人民会议”中的一些坏分子又暗中与藏军勾结，企图袭击大昭寺。范明迅速组织力量进驻大昭寺对面上，日夜守卫着班禅的安全。

班禅在拉萨共停留了43天，经过范明等人艰苦细致的说服工作，和堪布会议厅官员进行商讨安排，于6月9日，由仪仗队打着鲜艳的五星红旗及宗教旗帜为前导，在我党我军领导人、噶厦僧俗官员和拉萨民众倾城出动的欢送下，班禅大师离开拉萨，于6月23日回到了日喀则，在扎什伦布寺历代班禅举行坐床大典的大殿内，隆重地举行了参禅仪式。

班禅荣返故里后，西藏人民群众爱国热情高涨，对范明等为班禅返藏做出过巨大贡献的汉族人士非常感激，一律呼之为“阿乡拉”（舅舅），以表示对毛主席、共产党的爱戴之情。舅舅这个称谓，是从文成公主时代传下来的，表达着汉藏民族之间的亲情。

在那极“左”的年代，范明和班禅都先后受到了不白之冤。直到26年之后的1984年4月，复出后的范明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在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时，才见到了日夜思念的班禅大师。班禅一见范明激动得连话都说不出来，紧紧地抱着范明大哭了一场，而后设宴款待了老朋友，后来又特意送他一张签名的标准相片。

因与彭德怀的特殊关系受尽折磨，又靠彭德怀精神鼓舞熬过寒冬

1991年6月，西藏和平解放40周年大庆时，当年赴藏党政军的主要领导张国华、张经武、谭冠三等同志都已作古，唯独77岁高龄的范明，千里迢迢赶回他的第二故乡拉萨。在庆祝盛会上，中央代表团团长李铁映拉着范明的手向大会介绍说：“这是我们的革命老前辈、解放西藏的唯一活宝——范明将军。”

范明老将军能够活下来，是与他对党 and 人民的无限信赖与坚韧不拔的毅力分不开的。

事情还得从50多年前说起。1956年初夏，张国华和范明一起被选为党的八大代表，从西藏绕道印度、新加坡和香港赶到北京参加会议。在首都逗留期间，范明忙里偷闲，看望了彭德怀、李维汉和张德生等老领导。范明向他们汇报了西藏的党政军建设工作，张德生给他介绍了苏联一本歌颂共产党人开展民族工作的小说《阿里泰到山里去》。彭德怀插话说：“‘范大人’多才多艺，也应写一部体现毛主席的民族政策在西藏胜利的小说。国际上不少人关注着西藏，要把和平解放西藏作为东方民族工作的典范来写，书名我看就暂定为《新西游记》，限你3年完成任务。不把进藏部队的英雄业绩写出来，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是一个罪过。”

遵照彭德怀的意见，范明利用进京开会的机会，多次到故宫博物院等处查阅和搜集有关历史文献，开始整理进藏部队的事迹和自己的进藏日记。但是，由于他政务繁忙，迟迟没能动笔。直到1956年，他在百忙中坚持每天清晨4时起床，整理和撰写两个小时的材料，截至这年的11月底，终于写出了3万多字的《新西游记》的创作提纲，还写下了第一回的两万多字。

1958年4月，“左”的风暴翻过雀儿山、二郎山刮进了西藏，范明被打成了右派。在对他的100多天的大会批、小会斗中，为他抄写《新西游记》写作提纲的人又揭发了他写有“毒草”的这件事，于是把他的家抄了个底朝天，把他的写作“提纲”定为反党纲领，把他和同时进藏、当时担任西藏组织部长的白云峰，以及他1937年参加

革命的妻子、时任西藏共青团委书记的梁枫等同志，一同打成“反党集团”。范明被撤销了党政军的一切职务，并被开除党籍、军籍，由行政7级降到18级。梁枫也被打成右派，由行政12级降到17级。夫妻两人被押到东北长白山劳动改造，后因病又被转到陕西大荔劳改农场。接着，又在西北军区进藏的干部中清理了范明反党集团的“毛毛根”，结果使600多名干部无一幸免。

1962年，党的7000人大会之后，范明受到的不白之冤经过多次向周总理和党中央申诉，得到了平反，全家搬回西安。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又飞来横祸：所谓的“彭德怀反党集团”案又牵扯到了范明。这年的9月19日，范明被戴上了手铐，银铛入狱。不久，同白云峰一起被转到秦城监狱。范明的两个儿子和二哥为此也受牵连，两个儿子分别被判了8年和6年有期徒刑，二哥郝伯雄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母亲也被迫离家出走致死。

被关进铁窗的范明，开始又气又急。但此时，彭德怀对他的一些教诲便在耳边响起：“从某种意义上讲，血的考验、火的考验和胜利的考验还容易承受些；但蹲监狱的考验、委屈的考验和失败的考验，却往往使人难以承受。有的共产党人坐国民党的牢房还能想得通，但是坐共产党的牢房却想不通，受委屈不病而死，倒下了。”“我们国家正在进行史无前例的大革命，所以在革命中难免误伤一些好同志，委屈一部分人，这都是很正常的，就跟锄地一样，谁能保证每锄下去锄的都是草，而不伤到苗呢？”

每当想起彭德怀这些富于哲理的教诲，范明就增强了活下去的勇气。他决心要活到最后，笑到最后。他坚持以马列全集、毛泽东选集和毛泽东赠送他的中医书为伴，把牢房作为提高自己政治理论和医学水平的熔炉与课堂，使自己每天只有3个窝窝头的囚禁生活过得苦中有乐，分外充实。

1980年，中央组织部对范明的问题进行复查，范明终于得到了平反，被任命为陕西省政协常务副主席。

范明出狱后积极协助浦安修为彭德怀撰写传记搜集和整理资料。拍摄电影《彭大将军》，范明是总顾问，他不但为影片的拍摄提供了许多珍



胡锦涛接见范明(右一)

贵的历史文献，并且同浦安修一起在西北5省(区)筹款1200万元，保证了影片拍摄的圆满完成。

范明虽然每天门庭若市，社会活动繁忙，但他仍然锲而不舍地挤时间，重写了曾被焚毁了3次的历史剧《司马迁》，并在此基础上创作了《史圣司马迁》传记和广播剧。《史圣司马迁》由陕西省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后，受到了社会各界和国外广泛的好评。他撰写的《护送班禅大师荣返西藏》、《把五星红旗高高地插在喜马拉雅山上》等革命回忆录，成为今天人们研究解放西藏的重要史料。

二十二年囚禁面壁破卷，晚年成了古都西安杏林一杰

1980年，身为陕西省政协常务副主席的范明，与全国政协委员乔明甫一起，在全国政协六届三次会议上，提出了关于振兴中医药的提案。同年7月，又与陕西省、西安市中医药界著名人士和热爱中医药事业的各界人士，发起成立了“西京中医药科技开发研究会”，范明被推选为理事长。

为早日实现振兴中医药的夙愿，范明在为研究会诸事奔波的同时，坚持每周抽出一天时间，到研究会创办的老中医门诊部挂牌义诊。此举在

古城西安不胫而走，并波及全国各地，登门求医预约看病者络绎不绝，先后有数万人得到过他的诊治。

范明这位传奇将军，为何在中医学方面有如此高深的造诣呢？

1938年之后，范明到赵寿山将军率领的第三十八军开展党的地下工作，由于环境极为艰苦，教导队缺医少药，学员们患病的很多。于是，范明便利用自己小时候学的医术为一些学员治病，结果往往是手到病除。消息传开后，从此，不但教导队的学员，连三十八军的其他官兵也

经常找他看病，有时附近老百姓也闻讯来求医。

1944年，范明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在哲学课学习中，范明因一个观点与同学们发生了激烈争论，毛泽东知道后召见范明，听了他的观点后说：“你的看法很有见地，不无独到之处，但论据还不够充分。我记得李鼎铭先生也和我谈论过这个问题，他举了很多中医内经中的阴阳、气运等学说，颇有新意，你不妨去拜他为师，学学中医理论，可能对你有所收益。”范明把自己少年学医的经历告诉毛泽东，毛泽东说：“你有这个基础就好，我给你写个条子，你拿去找李先生拜师学艺。”范明便当即拜访了李鼎铭先生，李鼎铭虽未收范明为徒，但两人进行了彻夜长谈，他告诉范明：“《黄帝内经》和《伤寒论》不但是中医的指南和经典，而且可说是中国古文化的集成，要好好一读。”还借了《黄帝内经素问》、《伤寒论》、《金匱要略》给范明阅读，并嘱咐道：“尔后再看八大名医之学，庶可触类旁通矣。”从而使范明在中医学理论上有了很大的飞跃。

建国后，范明曾用中医药为其父亲医治癌症，效果甚佳，他经常为中央机关的领导和家属看病，治愈了李维汉耳疾，还在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和男女不育症等疑难病方面取得了一些突破。此消息不知怎么又传到了毛泽东主席那里，引起了他老人家的重视。

1953年9月，范明与甘肃省(下转51页)

大饥荒中的县委书记王永成

马钟嶽

一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有一段被称为“三年困难”的时期，是指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大饥荒”。三年大饥荒时期人们吃不饱饭，饿死了不少人，特别是农村更严重。

近年来，不同出版物陆续披露的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的人数不尽相同，推算的口径也不尽一样：较早的推算说，“三年大饥荒，中国非正常死亡人口大约为1700万”；之后有人推算，“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可能达到3471万”；有一本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纪实》的书中说，“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四千万人左右”；有媒体称，“中国人口减少四千万，这可能是上世纪全球范围的最大饥荒”；最近一本史学著作的计算表明，“1959—1961年，中国非正常死亡人口为3250万”。

在那场大饥荒当中，全国平均每个县有一两名农民兄弟被夺去了生命。但是，王永成担任县委书记的昌乐县却没有饿死人。

二

那是在整风、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以后的1959年，有人发现农村出了问题。当时山东省昌潍地委做出决定，把青州、寿光、昌乐三县定为“落后县”，派出三个工作组分别去“改造落后”，时任地委宣传部长的王永成被派到昌乐。

王永成是从村支部书记、区委书记和县委书记的岗位上磨练出来的，具有农村工作的丰富经验。他到昌乐后首先到人民公社化搞起来的大食堂去考察，这时的食堂里已没有多少可吃的东西；

他到农民家里去访问，农民家里也没有粮食。王永成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个天大的事情，民以食为天，解决农民的吃饭问题便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保住农民的生命便是“重中之重”。王永成不顾个人的利害得失，舍掉包括个人“进步升迁”等具体利益，不顾一切地要确保全县十万户家庭的安全和四十万百姓的生命。

王永成立即向地委告急，他不顾当时接连而至的政治运动，没有顾及正在进行的“反右倾”斗争，也没有效法派往xx县“改造落后”所搞的“扒两张皮”（逼富裕中农卖粮——认为富裕中农有粮食）等做法，而是呼吁上级尽快调来救命粮，解决百姓的燃眉之急。

与此同时，王永成在县里提出“千方百计”救灾渡荒的要求：对那些绝粮的村子，号召群众千方百计自救渡荒；对那些没有自救条件的群众，凡是有亲友可投的都允许他们去投奔亲友以争得一线生路；实在没有亲友可投的，那就采取“破产渡荒”的断然措施：变卖家具物品，换回粮食，以保住生命为原则。

接着，王永成带领群众“生产自救”。在农村，解决农民吃粮的根本途径是生产，依靠种粮养活自己。但是，粮食生产周期长，解决近期吃粮有困难。调来的少许粮食仅能解决部分绝粮村的急需，来年夏荒是个大难题。于是，他们决定号召群众种红薯。红薯是高产作物，产量高、生长快，较早就能有收成。种红薯需要育秧苗，那年来了寒潮，下的雪很大，为了避免冻坏红薯秧苗，他带头并要求所有干部统统到育养薯苗的“火炕”去防寒。那年的红薯真作美，为全县农民救灾渡荒发挥了作用。

那一年越冬小麦长得很不好，预料来年产量肯定低，昌乐百姓来年麦收以后怎么渡过夏荒呢？王永成一班人想，昌乐的南瓜产量高、熟的早，可



1964年6月17日,王永成(前排中)调离昌乐县时,县委一班人为他送行

以以瓜代粮渡夏荒。于是,他们就号召群众种南瓜。也真巧,这一年又来了一个南瓜大丰收。最后收了多少南瓜呢,当时人们说平均每人有五六十颗,如果是四口之家一户就有二百多颗大南瓜。那年全县麦子收下来留足种子后,平均每人只有18斤,老百姓生活就靠这些南瓜了,于是老百姓把这些南瓜称为“保命瓜”。

南瓜保了老百姓的命,昌乐的百姓就编出了不少赞颂南瓜的歌谣。有一首歌谣是这样唱的:“背着南瓜上青岛,看了戏,洗了澡,来回路费使不了。”这首歌谣反映了当时昌乐农民不仅自己渡过了饥荒,还给城里人送去了大南瓜,对城市居民渡荒做了贡献。

昌乐在大饥荒年代,通过红薯、南瓜大丰收,闯过了最为艰难的第一年,保住了百姓的生命。到1960年秋后,昌乐的灾情有了缓解,农业生产逐步恢复了正常。

三

然而,一年没有饿死人,这仅仅是开始,是救灾渡荒的第一仗。如何闯过这场大饥荒,增产粮食才是根本的出路,这一直是王永成心中的一个大问题。经过深入思考后,王永成决心以“相信农民,依靠农民”作为一切工作的起始点,增产粮食救灾渡荒。他认为:第一,农民应该是自己的主人,

我们是为农民服务的,尊重农民的意愿是理所当然的;第二,农民能够认识自身利益,也能够为实现自身利益而努力;第三,农民最懂得应该怎样种地,有能力种好自家的土地。

于是,王永成在增产粮食、保证多收的目标下,采取了一系列尊重农民意愿的作法:

首先把落实政策当成增加粮食生产的基本要领,当成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前提条件。在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年代里,大搞“一平、二调、三共产”,农民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劳动所得,被一哄而变成了“公产”,农民用血汗换来的

财产被别人平调了,哪里还有什么生产积极性呢。因此,王永成首先一步是落实政策,坚决、彻底地搞退赔,认真把大跃进、共产风中平调农民的财产退赔给农民。

第二是划少小队的户数。当时在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下,他们尽量把小队划小。上边要求每个小队最少20户的情况下,他们做到了全县平均每个小队20户。

第三是扩大家庭自种土地的面积。上边规定自留地按土地面积的5%至7%的比例进行安排,他们就按7%这个上限留足,而且多是些好地;在房前屋后、沟边、路沿、山脚等处可以由农民种些农作物,鼓励农民种好管好“十边地”,以补充口粮的不足。

第四是尊重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当农民希望并提出由农户负担更多的生产管理承包责任的时候,王永成采取了支持的态度。由于上边反对“包产到户”的作法,他们就采取默认的态度,既支持了农民发展生产,又保护农民免受政治的冲击;既对下边百姓负责任,又与上边政策不发生抵触。

第五是爱惜民力,从来不搞劳民伤财的“大呼隆”。春节期间,有的地方提出“大干干到二十九,吃了饺子就下手”的口号。昌乐县没有那样做,而是让农民好好休息几天,主张百姓有劳有

逸,休养生息,给农民一些自由的余地。

第六是鼓励工作上的积极创新和技术上的发明创造,王永成还身先士卒带头探索,在农业生产技术创新上投入不少精力。1961年天旱,为了保证种麦质量,王永成在找干部商议后发明出了一个“水耩”,既节省了水,又保住了墒情,效果很不错;为了提高植树绿化的效果,他还搞了个“绿畦”,改变原来栽柳树的传统作法,先把柳树条养在畦里边,等它生根成活以后再栽到山坡或路旁,成活率高且不损坏原有的柳树。

昌乐县在这场三年大饥荒当中,不仅全县没有饿死人,粮食还获得了丰收,除了完成统购统销向国家卖粮的任务外,昌潍地委还多次向昌乐提出加购任务,昌乐县先后五次向地区增加统购粮。

1962年冬,山东省召开各县粮食局长会,在会上安排统销粮食指标时,全省只有昌乐一个县不要国家统销粮,昌乐的吃粮问题已经在全县的每一个小队、每一户家庭都得到了安排和落实,这在全省是唯一的。

王永成除了领导农业生产外,还关心农村的物资交流和集市贸易。在那大跃进、刮共产风和“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集市贸易受到了冲击,有不少地方被强行解散了。王永成他们却尊重民意,顶着压力,恢复了农村的集市贸易,允许社员到集市买卖交易。这样一来,就形成了相邻各县的鲜明对照:一边是昌乐县的有买有卖人气十足高高兴兴,另一边是相邻县的物资贫乏互不交往冷冷清清,于是人们反映说:“一个地区,两种景象”。

四

1964年,王永成被陈少敏选中,以全国总工会组织部副部长的名义调来北京。陈少敏就是胡耀邦总书记在位时多次在大小会上提起的深受人们敬佩的那位刚正不阿的大姐,就是“文革”中在开除刘少奇党籍的中共中央全会上不举手、不同意开除刘少奇党籍、不认可“文革”倒行逆施行径的那位中央委员。

王永成来京后,不久带队去参加“四清”运动,很快“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在文革中,他到五七干校参加过劳动,之后被调到北京大学设在陕西南部大山地区的汉中分校。在汉中分校他仍

然是关心群众、保护百姓,他以党委副书记的身份一次次保护教职工和学生免受四人帮的种种迫害,支持学校各种教学科研活动,调出陈佳洱等有作为的知识分子走上教学科研领导岗位。

1978年冬,全国总工会恢复工作时王永成调回全总,担任全总机关党委书记和全总书记处候补书记等职。当时党委工作中最突出的一项就是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处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各种问题。全总那几年平反的各种案件(人)约1000余起,其中仅改正错定的“右派”就有91人,数量之多、难度之大、受害同志的安置工作之繁重是可想而知的。

王永成是一位诗人和书法家,更是一位朴实无华心里装着平民百姓的实在人,离休后还是有求必应,常常忙着给人们题诗写字,忙着他那部名为《绿化之计》的组诗。2006年春节后不久,王永成因病入院住在一个单人间。不久医院收了一位九十高龄的老人,需要一个单人间护理,但这时缺少单人间。王永成听说后主动提出给老人家让出单人间,经病房管理部门研究同意了请求。让房的美谈传出后,更增加了人们对王永成这位已逾八十高龄老人的敬佩之情。

三年大饥荒至今快有半个世纪了,昌乐百姓心里始终想念着当年同他们一起渡荒救灾的县委书记王永成。

附王永成诗作两首

种南瓜

设计度荒风,以瓜代谷粮。
明前先育种,入夏现花黄。
秋禾方齐藤,早瓜已硕长。
甘醇适口感,堪好充饥肠。
南社销青市,北区卖远乡。
虽云有所获,细论犹惶惶。

昌乐县六一年生产救灾记事

受命营陵负重任,救灾生产克时艰。
寒冰未解理瓜畦,飞雪护秧保大田。
作业推行责任制,自谋建设小家园。
购销不失民为本,天道酬勤喜过关。

(责任编辑 李 晨)

傅斯年为梁思成兄弟写信求助

耿法

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中颇有一些“怪人”。其实这样的“怪人”无非是有着与众不同的独特个性的学者、教授和其他知识分子，构成了民国知识分子色彩斑斓的群像。傅斯年就是其中一位，是20世纪中国社会舞台上一个颇有影响的学者。

傅斯年字孟真，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他是北京大学学生，积极投入到学生爱国运动中，凭着出色的才干，成为北大游行队伍的总指挥，高举大旗冲在学生游行队伍最前列，堪称五四运动的先锋和中坚。后来他到英国留学，回国后应蔡元培先生聘请，以非凡的胸怀和魄力筹建创立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并担任所长，工作极为勤勉而出色。因为他秉公直言，敢在太岁头上动土，被人称为“傅大炮”。抗战期间他是国民参政员，1944年9月7日在国民参政会上他抓住沸沸扬扬的“黄金公债案”，以咨询形式将孔祥熙的贪污罪行公之于世，震动朝野，舆论哗然，最终迫使孔祥熙下台。抗战胜利后，傅斯年又集中火力炮轰宋子文，他写下战斗檄文《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再次震动朝野，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宋子文不得不辞去行政院长职务。傅斯年的性格十分刚烈暴躁，然而他对其下属和优秀人才又那样体贴入微，细心至极，既真诚给他们帮助，又不让本人事先知晓而感受难堪，他深深懂得维护知识分子自尊的重要。傅斯年从不轻易求人，但抗战期间为了危难中的梁思成、梁思永兄弟，他却给当时的教育部长朱家骅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求助信，留下一段现代史上知识分子真诚友谊的佳话。

抗战期间，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央博物院和中国营造学社等五个单位都搬迁到四川偏僻的李村，梁启超的长子梁思成和次子梁思永均困在李村，过着贫病交加的生活。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创办的中国营造学社是个民间学术团体，没有正式编制，所以没有经费来源，好不容易向政府要到一点钱，也只够维持很短时间的开支，后经教育部和中央研究院等单位协商，将学社主要成员分别纳入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和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编制内。这时，协助梁思成工作的主要助手、他的妻子林徽因身患严重的肺结核，常年辗转于病榻，缺医少药，又无任何营养，一方面要协助梁思成编写巨著《中国建筑史》，工作十分辛劳，一方面又要照料两个孩子，为维持一家老小的日常生计而操劳，处境十分艰难。著名考古学家梁思永在中央史语所工作，此时也身患重病（由气管炎突转为来势凶险的肺病），虽然战胜了死神，度过了危险期，但由于工作劳累，营养不足，病体十分虚弱，每天连到山上史语所去上班都支撑不住。所长傅斯年在山上研究所院内腾出三间房，用担架将梁思永抬上山去居住，使他在床上可以晒到太阳，这在抗战艰难时期的内地可算是“天堂”了。

目睹梁氏兄弟的艰难状况，傅斯年忧心如焚，为了替国家保护人才，他于1942年4月18日提笔给当时的教育部长朱家骅写了一封信，信中专门谈及梁思成、梁思永兄弟的身体状况和生活状况，谈到他们的家世和学问人品，忧虑尚无外边帮助，梁氏兄弟将要出事，



傅斯年

请求朱家骅代表政府为梁家兄弟拨款给予资助。全信如下：

骞先吾兄左右：

兹有一事与兄商之。梁思成、思永兄弟皆困在李庄。思成之困，是因其夫人林徽因女士生了T.B，卧床二年矣。思永是闹了三年胃病，甚重之胃病，近忽患气管炎，一查，肺病甚重。梁任公家道清寒，兄必知之，他们二人万里跋涉，到湘、到桂、到滇、到川，已弄得吃尽当光，又逢此等病，其势不可终日，弟在此看着，实在难过，兄必有同感也。弟之看法，政府对于他们，似当给些补助，其理由如下：

一、梁任公虽曾为国民党之敌人，然其人于中国新教育及青年之爱国思想上大有影响启明之作用，在清末大有可观，其人一生未尝有心做坏事，仍是读书人，护国之役，立功甚大，此亦可谓功在民国者也。其长子、次子，皆爱国向学之士，与其他之家风不同。国民党此时应该表示宽大。即如去年蒋先生赙蔡松坡夫人之丧，弟以为甚得事体之正也。

二、思成之研究中国建筑，并世无匹，营造学

社，即彼一人耳（在君语）。营造学社历年之成绩为日本人嫉妒不置，此亦发扬中国文物之一大科目也。其夫人，今之女学士，才学至少在谢冰心辈之上。

三、思永为人，在敝所同事中最有公道心，安阳发掘，后来完全靠他，今日写报告亦靠他。忠于其任职，虽在此穷困中，一切先公后私。

总之，二人皆今日难得之贤士，亦皆国际知名之中国学人。今日在此困难中，论其家世，论其个人，政府似皆宜有所体恤也。未知吾兄可否与陈布雷先生一商此事，便中向介公一言，说明梁任公之后嗣，人品学问，皆中国之第一流人物，国际知名，而病困至此，似乎可赠以二、三万元（此数虽大，然此等病症，所费当不止此也）。国家虽不能承认梁任公在政治上有何贡献，然其在文化上之贡献有不可没者，而名人之后，如梁氏兄弟者，亦复甚少！二人所作皆发扬中国历史上之文物，亦此时介公所提倡者也。此事弟觉得在体统上不失为正。弟平日向不赞成此等事，今日国家如此，个人如此，为人谋应稍从权。此事看来，弟全是多事，弟于任公，本不佩服，然知其在文运上之贡献有不可没者，今日徘徊思永、思成二人之处境，恐无外边帮助要出事，而此帮助似亦有其理由也。此事请兄及时千万勿说明是弟起意为感。如何？乞示及，至荷。专此 敬颂

道安

弟斯年谨上 四月十八日

弟写此信，未告二梁，彼等不知。

因兄在病中，此写了同样信给泳霓，泳霓与任公有故也。弟为人谋，故标准看得松。如何？

弟年又白

从信中可知，素不求人的傅斯年为梁氏兄弟还同时给时任重庆国民政府经济部长兼资源委员会主任翁文灏（字泳霓）写了信求助。信中有“恐无外边帮助要出事”一句下还专门加画了波浪线，以示情况重要而紧急。梁思成、梁思永兄弟对傅斯年为他们改善处境竭尽全力求助直陈最高当局之事毫不知情，如果事先得知一点风声，梁氏兄弟肯定要极力劝阻并谢绝的。

傅斯年的求助信起到了作用，时隔不久，他收到了朱家骅寄来的给梁氏兄弟的款项，代为写了收条，并将款项如数送到梁氏兄弟手中，这对梁氏

兄弟无疑是雪中送炭。梁思成后来写信给费正清说：“我们的家境已经大大改善，大概你们都无法相信。每天的生活十分正常，我按时上班从不间断，徽因操持家务也不感吃力……当然秘密就在于我们的经济情况改善了，而最让人高兴的是，徽因的体重在过去2个月中增加了8磅半。”此信所说的“经济情况改善”，当和傅斯年的求助信起了作用直接有关。傅斯年在收到朱家骅寄来的款项后，为了使梁氏兄弟不致因事情突然而不知所措，特地将他致朱家骅的信的抄件寄给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告知事情缘由。梁思成当时不在家，由林徽因收阅并回了信。此信原件现存台湾傅斯年的档案文件中，娟秀流畅的字迹写在中国营造学社的信笺上，全文如下：

孟真先生：

接到要件一束，大吃一惊，开函拜读，则感与惭并，半天作奇异感！空言不能陈万一，雅不欲循

俗进谢，但得书不报，意又未安。踌躇了许久仍是临书木讷，话不知从何说起！

今日里巷之士穷愁疾病，屯蹶颠沛者甚多。固为抗战生活之一部，独思成兄弟年来蒙你老兄种种帮忙，营救护理无所不至，一切医药未曾欠缺，在你方面固然是存天下之义，而无有所私，但在我们方面虽感到 lucky 终增愧悚，深觉抗战中未有贡献，自身先成朋友及社会上的累赘的可耻。

现在你又以成永兄弟危苦之情上闻介公，丛细之事累及泳霓先生，为拟长文说明工作之优异，侈誉过实，必使动听，深知老兄苦心，但读后惭汗满背矣！

尤其是关于我的地方，一言之誉可使我疚心疾首，夙夜愁痛。日念平白吃了三十多年饭，始终是一张空头支票难得兑现。好容易盼到孩子稍大，可以全力工作几年，偏偏碰上大战，转入井臼柴米的阵地，五年大好光阴又失之交臂。近来更胶着于疾病处残之阶段，体衰智困，学问工作恐已无份，将来终负今日教勉之意，太为难情了。

素来厚惠可以言图报，惟受同情，则感奋之余反而缄默，此情想老兄伉俪皆能体谅，匆匆这几行，自然书不尽意。

思永已知此事否？思成平日谦谦怕见人，得电必苦不知所措。希望泳霓先生会将经过略告之，俾引见访谢时不至于茫然，此问

双安

此信影印件因没有复印上最后的落款，无法知道林徽因写信的具体日期，但从信中所述内容看是收到傅斯年信后不久即回复的，信中充满感激之情，而又不失知识分子的自尊人格和谦虚风貌。从中更反映出傅斯年为梁氏兄弟的处境大声疾呼完全是出于公心，是为国家、民族保存精英，珍惜人才，因此他虽然“平日向不赞成此事”，但为了使梁氏兄弟能及时得到救助，渡过难关，他才一反常态，分别向朱家骅和翁文灏两位政府要员写信求助，并在信中提出转请陈布雷先生向最高当局报告此事，以求得最迅速的答复和资助。回想傅斯年后来对权势炙手的孔祥熙、宋子文两人



梁思成、林徽因在天坛

的无情揭露和炮轰,再看看他对无权无势的梁氏兄弟的体贴和照顾,他的大爱和大憎是何等强烈而鲜明!如果说梁思永是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研究骨干,是他的下属,给予帮助和照顾尚属他的分内之事的的话,那么梁思成和中国营造社并非他属下的人员和机构,梁思成的妻子林徽因则关系更远更边缘化,他完全可以不闻不问,但他却满怀深情为他们写信求救,信中表达的全是他的肺腑之言。

世上固然有所谓“文人相轻”的恶习,但更有知识分子之间惺惺相惜、患难与共的真诚友谊,这是中国优秀传统道德的体

现,这种真挚的友情自古就留下许多佳话。傅斯年身上正集中体现了这一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美德,但他的境界又远高于历史上传统的知识分子的私人友谊(尽管这种私人友谊也是很美好的)。他个人和梁氏兄弟的父亲梁启超并无任何私人渊源关系,甚至如他信中所言“弟于任公,本不佩服”,他和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也无很深的个人交往与友情,思成、徽因夫妇也非他主管的下属,但他的信中既能公允地评价梁启超在中国文化上的贡献和护国之役的功劳,又对并非他下属的梁思成及营造学社在中国建筑研究上的杰出功绩给予很高的评价,对林徽因的才华也十分推崇。他在信中强调“营造学社历年之成绩为日本人羡慕不置,此亦发扬中国文物之一大科目也”,在艰苦的抗日战争期间特别强调这点,更透着民族的自豪,傅斯年是把梁思成、梁思永的学术成就视作中华民族的成就和骄傲,如他在信中另一处再次强调的“二人所作皆发扬中国历史上之文物”。为此,他虽自认为全是他“多事”,但为国家计,为民族计,必须对处于困境中的梁氏兄弟伸出援手,否则梁氏兄弟“要出事”,这才是国家和民族的大不幸。可以设想,当时若无傅斯年的这封信,就不可能有外边雪中送炭的帮助,梁氏兄弟两家很难从困境中挣扎出来,尤其梁思永和林徽因当时都重病在身,极有可能真的“出事”,会在贫病交加中



梁思永

英年早逝,这样的惨剧在艰苦卓绝的抗战期间屡有所闻。倘若真发生这样的惨剧,梁思成也肯定无法独自完成巨著《中国建筑史》,简直无法想像这一切。傅斯年的信堪称及时雨,实在善莫大焉,功莫大焉!

傅斯年的信中突出的是梁氏兄弟的人品学问,“皆中国之第一流人物”。从“梁任公家道清寒”,说到“其长子、次子,皆爱国向学之士,与其他之家风不同”;从“思成之研究中国建筑,并世无匹,营造学社,即彼一人耳”,说到“思永为人,在敝所同事中最有公道心,安阳发掘,后来完全靠他,今日写报

告亦靠他。忠于其任职,虽在此穷困中,一切先公后私”;最后得出结论:“总之,二人皆今日难得之贤士,亦皆国际知名之中国学人。今日在此困难中,论其家世,论其个人,政府似皆宜有所体恤也。”没有一点是出自私人的好恶和关系。他在信中还特别叮嘱朱家骅“此事请兄谈及时千万勿说明是弟起意为感”,正表明了他的无私和高尚的情操,决非用这种事来讨好学者,维持私人关系,拉小圈子,结朋党。

傅斯年最终究竟为梁思成、梁思永兄弟要到多少钱,由于当事人都已谢世,无法得知,只能期待日后相关档案全部开放才能真相大白。但金钱的数目不是主要的,关键是在苦难深重的抗战期间,中国的知识分子中有这样一段真诚无私、相濡以沫的情谊实在可贵,值得人们再三回味。无论作为知识分子自身,还是作为相关的领导和官员,都能从中借鉴到有益的精神财富,以使中国传统的优秀道德得以发扬光大。

(责任编辑 李晨)

说明

本刊2004年第11期刊登的《在胡耀邦领导下工作》一文中胡耀邦在延安时期照片的作者为吴印咸同志。

刘半农在“三一八惨案”前后

刘育辉

1925年6月下旬，刘半农结束了长达五年之久的艰苦卓绝的留学生涯，在国人中首获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后，冒着酷暑，自巴黎启程，经迢迢万里海路的颠簸，历时月余，终于抵达祖国的上海。

一上岸，刘半农即把在国外穿了多年的西服换成了中装，归心似箭地先返回故乡江苏江阴县省亲。见到刘家的老宅与庭院中的一草一木，不禁令人眷念不已。但这时已是秋风送爽，桂子飘香的季节，新学年也开学在即，在家中他没有久留，遂又择日登程，匆匆赶回他久别的北大校园。

在赴欧洲初期，他在伦敦创作的一首怀念祖国与故园的抒情诗《教我如何不想她》，经赵元任先生谱曲后，词曲珠联璧合，不胫而走；这时恰好已在北大等院校中传唱开来。在这一片美妙的歌声中，人们充满了遐想与憧憬，但美好的期盼往往与严酷的现实相背离。这期间正是北大自创立以来最艰苦的时日，北洋军阀掌权，政治腐败，社会黑暗，民不聊生。连北大教授也常被欠薪，甚至维持学校的经费亦无所出。水源断绝，冬无炉火，人们都冻得瑟瑟发抖。但半农先生不以为苦，他将在国外所学到的新兴的实验语音学知识，加上自己的创新与所发明的多种语音学仪器悉数贡献出来，因陋就简地在北大创立了我国第一个语音乐律实验室，并开设了相关的课程，填补了我国在这方面的空白。

在艰苦的条件下，人们总会默默地忍受。因为在他们内心深处，还盼望着将来会有“美好而晴朗的一天”。谁知这正是火山巨大喷发前的死寂，一场腥风血雨的灾难即将降临！1926年3月12日，冯玉祥所部国民军与奉系军阀发生战事。亲日的奉军依仗其主子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由日舰护航驶入天津大沽口，并炮击国民军，遭到

守军迎头痛击。为此，日本帝国主义者竟恼羞成怒，勾结英美等八国于3月16日向当时的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府提出撤除大沽口军事设施的无理要求，即所谓“八国通牒”。3月18日上午，北京爱国青年学生与群众5000余人，在共产党人李大钊等领导下，在天安门广场集会，抗议示威。会后游行请愿，坚决要求拒绝丧权辱国的“八国通牒”。当游行队伍行至执政府广场前，段祺瑞竟冒天下之大不韪，丧心病狂地下令卫队向手无寸铁的爱国学生与群众开枪射击。顿时枪声大作，众人惊呼声、怒吼声、哭喊声响成一片，47名学生惨死在枪口之下。

事件发生那天，半农先生9岁的长女小蕙正在孔德学校上学，家里放心不下，连午饭都没敢让她回家吃。直到傍晚放学时半农先生才急冲冲去领回了自己的女儿。而这时社会上已是乱成一团，耸人听闻的谣言正在满天飞！人们街谈巷议都是围绕着段祺瑞执政府军警如何残杀群众的血腥事实。言者既惊恐万状，又都义愤填膺，无不对死难烈士充满着恻隐之心。半农先生心中更是难以平静，思绪万千，怒火中烧，不断地在书房中踱来踱去。掌灯时分，半农先生在书桌上摊开稿纸，他长歌当哭，边写边吟边击拍，挥泪写下那首战斗诗篇《呜呼三月一十八》：

呜呼三月一十八

——敬献于死于是日者之灵

呜呼三月一十八，	北京杀人如乱麻！
民贼大试毒辣手，	半天黄尘翻血花！
晚来城郭啼寒鸦，	悲风带血吹颼颼！
地流赤血成血洼！	
死者血中躺，	伤者血中爬！
呜呼三月一十八，	北京杀人如乱麻！

呜呼三月一十八，北京杀人如乱麻！
 养官本是为卫国！谁知化作豺与蛇！
 高标廉价卖中华！甘拜异种作爹妈！
 愿泉其首藉其家！

死者今已矣，生者肯放他？！

呜呼三月一十八，北京杀人如乱麻！

这首诗以“范奴东女士”的笔名，很快于3月22日在《语丝》月刊上披露，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诗人面对着杀头的危险，公开对死难烈士与受害群众表示深切的同情，就足以说明他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先生当时年过而立，已成为一位在语言学等诸多领域中卓有建树而持重的学者，但诗中仍不失其早年在文坛上叱咤风云的新文化战士“活泼、勇敢”的锋芒。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军阀当局又连下通缉令，准备逮捕这次爱国行动的有关带头人与发动者。首当其冲的当然是李大钊，而刘半农与其

挚友《世界日报》的进步记者成舍我亦在通缉之列。他俩只好东躲西藏，一时有家也归不得。将近三年以后，刘半农还没忘记这件事（而这期间先生教学、研究与社会活动，均成果累累，繁忙异常），遂又请语言学家兼作曲家赵元任先生将该诗谱了曲，于1928年冬发表在其二弟、国乐大师刘天华先生主编的《音乐杂志》一卷五号上。

今年3月18日是“三一八惨案”81周年祭，而刘半农永远地离开了他为之奋斗而献身的北大校园，静静地长眠在北京西郊香山之巅也有73个年头了，时光永是流逝！君不见那连绵起伏的香山满坡遍野似血的红叶，每逢秋风萧瑟之时依然灿若一片朝霞！这是何等美妙与永恒的境界！虽世间早已时过境迁，但人们是不会忘却过去的！犹记先生生前曾愤愤地说：“愿这空前的浩劫今后不再发生！”故笔者不揣浅陋，写此小文，以回顾历史，缅怀先烈，感念诗人。

（责任编辑 杨继绳）

（上接42页）著名中医张汉翔，应邀进京为毛泽东会诊，毛泽东曾饶有兴趣地对范明说：“从今以后，你用一半脑子搞政治、军事，用另一半脑子好好地研究一下中医学。”并说：“老医家们墨守成规，老框框很多。你则不然，你是从学习马列主义和古典哲学旁及中医的，再加上治医如治国的政治经验，完成这个任务是有希望的。给你10年时间，争取把癌症攻下来。”毛泽东还指示当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买了数百本医学书籍，装了一吉普车，赠给了范明，要他刻苦钻研，并指示卫生部要帮助支持他的工作。同时，还推荐范明向当时中医界四大名家之一的施今墨请教。受到主席的勉励和鼓舞，加之自己锲而不舍的勤奋努力，范明的医术有了突飞猛进的提高。

进军西藏以后，范明在学习藏语藏文的同时，又接触了一些藏医方面的知识，还通读了文成公主出嫁时带到西藏，如今珍藏在布士仁达拉宫药王山的《皇内经》等著名医学经典。并利用工作之便，攀登到海拔4500米以上的雪山高地，采集和考察雪莲等名贵的中草药材。

从被强制劳动改造和关押监狱，直到1980年平反的22年间，范明所有的东西都被没收了，唯独当年毛泽东赠送给他的那车医书没人敢收，

所以，在长年的囚禁生涯中，他总是与这数百本书相依相伴。他除了像别的犯人一样被看押劳作外，剩余的时间便全部用在了对中医药的研究上。他不仅熟读了毛泽东送的那些医学经典著作，翻破了厚厚的两本中国医学辞典，还在自己身上摸索了指诊（用指头代针）疗法和穴位按摩法。在农场劳改中，他获得了上山采药、行医看病的特权，不仅医治了近万人千奇百怪的疾病，还把中药学方面的知识用于小麦、棉花的增产，以及对牲畜的疾病医治上，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当我们问到范明几十年来共为多少人看过病时，他爽朗而豁达地一笑说：“多了，难以记清了。”可范老看病从来是分文不取，只要谁的病好后给他报个信就很欣慰。

采访归来，每当回想起范明那坎坷而充满传奇的一生，就不由想起了老将军客厅墙上挂的那首《观范老义诊有感》的诗来：

银丝两鬓一老翁，伏案斗室济世穷。
 忆昔神弓杀九日，喜今妙笔救众生。
 平生偏遭史迁祸，晚年深谙华佗功。
 事虽无奇人却奇，谁信郎中是将军。

（责任编辑 李晨）

重庆武斗与文革墓群

庞国义

重庆沙坪坝有一座闻名遐迩的烈士墓，埋葬着三百多名在渣滓洞、白公馆牺牲的革命先烈。每年，特别是“11·27”纪念日这一天，有成千上万的人前来祭奠英烈，召唤忠魂。

离此不到3公里的沙坪公园，在文革中也形成了一个有名的墓群，集中掩埋着文革中因武斗而丧生的五百多名八一五派人员。文革早已灰飞烟灭，那场喧嚣的政治闹剧似乎已逐渐淡化，但伤痕不能抹去，记忆没有尘封，在这里静眠了近40载的冤魂时刻向我们昭示历史不能忘记。

山城重庆是武斗重灾区，1966年12月4日，全国第一次大规模武斗发生在大田湾体育场。当时这里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会议刚开始，“八一五造反派”和外地学生强行冲进会场，与保守组织“工人纠察队”搅成一团，双方数万人在会场上发生混战，用旗杆、标语牌、砖头作武器，撕打冲撞，双方伤者不计其数，谣传死亡多人。此后，保守组织迅速瓦解。

1967年“一月夺权”后，围绕“革联会”的合法性问题，造反派内部急剧分化，形成得到驻军支持的保派（原“八一五”派）和得到首都红卫兵支持的砸派（后称“反到底”派），双方从口头辩论发展到互相涂盖撕毁大字报，从互砸广播站到烧毁宣传车。5月23日两派在石油学校发生武斗，武斗开始升级为以钢钎、铁棒、大刀为武器。年仅19岁的重庆石油学校学生邹茂林倒在钢钎下，成为武斗以来第一个殉难者，“八一五”派抬尸游行，在小报上发表“12·4”事件后创作的一首《亲爱的战友你在哪里》的歌曲以示怀念。

6月5日-8日，西南师范学院两派群众组织发生武斗，全市两大派先后派出数千武斗人员前往支援，揭开了重庆市大规模武斗的序幕。前

去制止武斗的解放军横遭毒打。

6月23日，两派在重医附小展开武斗，重医附小被烧毁，武斗中死4人，伤百余人，财产损失3万余元。

7月1日，两派在重医附一院武斗，使用钢钎、刺刀、自制燃烧瓶等，死2人，伤数十人。附一院门诊部医生护士全部逃离，全天被迫停诊。在互相冲杀中，在“火线采访”的重医66级毕业生、《东方欲晓》报号称“才子主编”的于可在撤退时落后，被追赶上的“暴徒”用钢钎刺死，成为第一名“以身殉职”的“战地记者”。

7月7日早晨，浓雾里的嘉陵江桥头有几声朦胧的小口径步枪声响，新六中陈乐洲等2人身亡。“七七”枪声被认为是重庆武斗再次升级的信号。果然，第二天两派就在远郊的红岩机器厂真刀实枪地摆开阵势大打出手，使用自动步枪和冲锋枪，打死黄习琨等9人，抓走近200人。

17天后化龙桥工业学校的“7·25事件”中，重庆大学采矿系张全兴、机械系唐世轩被小口径步枪击中额头死亡，该事件开创了枪战中大学生死亡的先河，此后，仅重大一校，就有25名大学生死于武斗，几乎都埋在本校松林坡。

两江汇合的重庆，路险山高，气候火辣，“巴人尚武”。进入8月后，山城武斗频繁，规模宏大，史称“八月战争”。由于抗战“陪都”的特殊背景，兵工厂特多，几乎所有常规武器都能生产制造。武斗双方各自突袭兵工厂，有的一次抢出1万多支半自动步枪，有的一次抢出100多万发子弹。因为有了武器支撑，武斗空前惨烈。双方普遍使用半自动步枪、冲锋枪、四联高机、三七炮、野炮等武器，出动了装甲战车、水陆两栖坦克、舰艇等设备，消耗子弹不计其数。

兵工厂在武斗中首当其冲，国营建设机床厂

清水池争夺战死亡 22 人；国营嘉陵机器厂武斗中，双方直接参战人员五六百人，死亡数十人；国营空压厂被两派反复争夺占领，厂房设备大部被毁，该厂“八一五”派死亡人员埋在沙坪公园的就有 31 人；国营望江机器厂“长江舰队”沿江炮击东风船厂、红港大楼、国营长江电工厂及沿江船只，打死 24 人，打伤 129 人，打沉船只 3 艘，打坏 12 艘；潘家坪地区武斗双方死亡上百人，高干招待所遭严重破坏；南岸上新街武斗打死 22 人，伤数十人；北碚歇马场 424 部队驻地 3000 人参加武斗，双方死亡 40 人；杨家坪地区武斗参战人数上千人，激战一周，双方死亡上百人，昔日繁华街道房屋被毁过半。

“八月战争”中，重庆大学连遭嘉陵江北岸的国营江陵机器厂炮击，当时的制高点 6 教学楼被打得千疮百孔，幸喜此批炮弹未安装引信而不能爆炸，否则后果难以设想。后来学生们写了毛泽东词挂在墙上：“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更“喜剧”的是 8 月 18 日夜，一枚飞弹击中了该校电机系主任江教授的厨房，戳出一个 37 厘米的窟窿，江教授惊魂之余，无可奈何，也步主席词原韵，写了一首幽默诗贴在弹洞边：“通宵炮声急，弹洞灶房壁；可惜好钢铁，不分友和敌。”

1967 年 9 月 1 日，周恩来总理听到国营空压厂武斗期间一夜打了 1 万发高射炮弹时，气愤地说：“在越南（指‘援越抗美’）1 万余发炮弹能打下多少架飞机！这是国家财产，我想了是很痛心的。”1968 年 3 月 15 日周恩来总理在北京接见四川省革筹和重庆驻军的领导成员时再一次怒斥重庆武斗的“败家子”行为，而“文革旗手”江青当时则大唱反调，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小青年玩玩枪……”康生阴阳怪气地接着说“可以改

进技术”，无疑是火上浇油，使武斗非但未能平息，反而从重庆市向周边专县扩散，形成大规模的“剿匪”运动，直到 1968 年 10 月后才逐渐停息。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双方大小交战数百次，武斗直接死人上千，伤者上万，各大兵工厂及多个地区的厂房民房校舍毁坏殆尽。援越物资被抢，损失惨重。解放军正团职以下官兵数十名为制止武斗英勇牺牲。

“八一五”派选择沙坪公园埋葬死者，使之形成“文革墓群”，有着其特殊的历史背景。

其一，文革墓群所占地皮，解放前是爱国人士饶国模的地产，1939 年，因八路军驻渝办事处搞组织工作的黄文杰病故急需安葬，饶急办事处之所急，便把这块地皮让给办事处做墓地。后来，这里陆续埋葬过邓颖超的母亲、周恩来的父亲以及李少石等 13 名因公因病殉职的办事处干部、职员、战士、新华日报社记者以及 3 名南方局工作人员的小孩，因此，附近的人们尊称该处为“八路军办事处公墓”。解放后，国务院将上述人员遗骨火化后移葬红岩村内的红岩公墓。后来有几位部队干部葬在这里，大部分地皮便空了出来，成为文革中“八一五派”埋葬武斗死亡人员的首选佳地。



文革墓群，碑上可见残缺不全的“八一五烈士纪念碑”字样



文革墓群

其二，沙坪坝是重庆市著名的文化区，学府林立，是“八一五派”的诞生地和大本营。而当时处于荒郊的沙坪公园后门周围是一片片农田，只有一条狭窄的机耕道可抵达墓地附近，地势相对僻静。加之文革期间公园无人管理，围墙倒塌、林木凋零、人迹稀少，便于挖坑修墓。笔者依稀记得39年前“燎原兵团”为阵亡的朱某某下葬时的情景：几名背着“牛鬼蛇神”头衔的街道清洁工，早在两小时前就被武装押来，用锄头挖好了一个大坑，待棺材从车上抬下置于坑中，垒成土堡，武斗人员一齐举起手中武器朝天鸣枪，两百多颗弹壳瞬间坠落在坟堡四周。

墓群究竟埋葬多少人？据公园公布的数据，有墓碑114座，埋有500余人。由于有的有坟无碑，有的坟被削平遭荒草掩埋，故此处究竟有多少坟埋多少人成为一个谜。而据民间热心人士曾钟先生详细考证，坟墓应不少于120座。

现存墓碑以死者单位当初实力差异而大小不一，有的墓仅1人，墓碑高大；有的10多人，占地宽却墓碑小，建设厂和空压厂的两个墓内各埋有30多人。林林总总、高低错落的水泥墓碑上，清一色的塑有由“815”三个阿拉伯数字变形为炬柄的火炬，同时刻有“八一五”派特有的口号：“头可断，血可留，毛泽东思想不可丢；可挨打，可挨斗，誓死不低革命头。”基座四周刻有“为有

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飚为我从天落”等毛主席诗词语录，或“挥泪继承烈士志，誓将遗愿化宏图”、“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等警句对联。由于时间流逝，大多数已经风化，辨认困难。

死者大多数是武斗阵亡，也有少数被误伤死亡的人员，但必须是“八一五观点”的。有人称这是全国唯一的红卫兵墓群。这不准确，因为里面埋葬的人员超过半数

是工人，如八一兵团、机械兵团、财贸815战斗团等工人组织成员，沙坪公园将其称之为“文革墓群”是比较贴切的。

需要说明的是，“八一五”派有不少武斗死亡人员是分散埋在各地的。埋葬死者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本派力量在单位或当地占绝对优势，另一派不敢动粗；二是本单位有空地可用。比如重庆大学松林坡、北碚东阳镇、朝天门街心花园、体育馆花坛、一中操场边、长安厂内、南山、汪山等几十处地方就分别集中或分散埋葬过武斗死亡人员。而最终完整保存下来形成墓群的只有沙坪公园一处。沙坪公园墓群在自然岁月和人为损坏中，在毁与留的争论中，被保存了下来，修筑了围墙，单独开门，形成园中园，成为独具特色的一景，也成为见证文革历史最直接的实物遗址。近40年来一直荒草丛生，人迹罕至。不知是谁在网上发帖，误传此处要开发拆迁，导致全国各地甚至海外人士络绎不绝前来踏访寻址，为“文革博物馆”摄像立传。

特别意味深长的是上世纪80年代初，墙外修建了一座天主教堂，弥撒曲每周悠扬回荡；墙内有一鸽岛，无数象征和平的鸽子安详自由地飞翔。碧湖边杨柳依依，桃林环抱，湖上小船悠悠，情侣对对，尽情享受自由和安康，与40年前血腥恐怖的“内战”硝烟形成了强烈而鲜明的对比。

(责任编辑 李晨)

此篇文章政审要求删除。

一个小学生眼中的“文化革命”

秦维宪

1966年6月下旬的一天，我正在家里和父亲、弟弟一起擦锅子，猛然听见外面马路上锣鼓喧天，喊声大振。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立即拿着锅子跑出去看，只见马路上“雄赳赳、气昂昂”地走着一长串游行队伍，游行者是中大中学生，他们臂缠红袖章，高擎“交大反到底”、“红三司”、“红革会”之类的大旗，狂呼滥喊着所谓的“革命”口号。

我当时年仅12岁，被这一幕造反情景惊得目瞪口呆。听路人说，这是什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于是，随着游行队伍的汹涌澎湃，随着那些疯狂的学生往空中散发传单的吆喝声，我居然兴奋得拣起一根树枝敲打锅子，像海燕那样呼唤“革命”风暴的降临。40年弹指一挥间，当年的一幕仍历历在目。

“文革”对社会的大破坏，率先发端于教育领域。

1966年5月29日，北京清华附中一群学生慷慨激昂地宣誓：要用生命和热血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遂成立了红卫兵组织。从此，这股祸水蔓延全国。6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同日，清华附中红卫兵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宣称：我们是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毛主席、党中央是我们的靠山，解放全人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6月24日，他们又贴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认为“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由此，全国各地的大中学校与北京遥相呼应，纷纷成立红卫兵组织，毛泽东又连续8次在天安门城楼接见1200万红卫兵，更是将“革命”的情绪推向极致。

我们这一代人就在那股无法无天的强风暴中，被无情地剥夺了读书的权利。

我当时在上海市北京西路第五小学念四年

级。“文革”伊始，从校长、教导主任到教师，人人脸呈恐惧、焦灼之色。一天上午，一支红卫兵队伍来学校点燃“革命”烈火后，一批高年级学生中的“红五类”子弟便成立了红小兵，他们顿时将学校弄得一片红色恐怖。红小兵们戴着红袖章、胸挂宝像（毛泽东像章）、手挥木棍和电线鞭子，将校园里所有的窗玻璃砸碎，大部分课桌椅被拆毁，然后红小兵们搞“集团冲锋”和“车轮大战”，对许校长、王教导主任以及众多老师进行残酷批斗，他们高呼“狠批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狠批师道尊严”、“打倒反动的学术权威”等口号，将师长们往死里整。很快，许校长被整瘫痪，因参加过三青团的封老师被活活斗死……

学校经过一番天翻地覆的“革命”，课堂秩序已不复存在，学生们基本上处于“放羊”状况，我们随心所欲地去上学，不想去就在家玩儿，或跟着红卫兵后面，看他们抄家、“破四旧”、打群架……

在一个少年的眼里，“文革”的重灾区似乎在中学。我家对面是上海市长江中学，“文革”烈火烧进该校时，几乎一夜之间，所有教室的玻璃窗、课桌椅、甚至厕所里的抽水马桶全部被捣毁。该校红卫兵和“上体司”（造反派组织）将几间教室打通，蒙上厚厚的幕布，作为他们练习摔跤、打拳击，关押、折磨“黑六类”的暗室。

我清晰地记得，从1966年6月底到1967年“一月风暴”期间，是上海市长江中学闹得最厉害的日子。该校红卫兵几乎天天揪斗老师，或者从外面抓进“黑六类”肆意摧残。他们将高帽子里灌满浆糊，套在翁世宝校长头上，不断地让他坐“喷气式”游斗，不出一个月，翁校长便被斗疯。入夜，他们将右派分子李庚生老师当作练习拳击的靶子，在暗室里打得他死去活来，发出一阵阵毛骨悚然的惨叫；李老师被打昏后，他们便用冷水将他浇醒，再继续打；有一天晚上，竟打断他4根肋骨。李



文革中红卫兵大破“四旧”，砸毁美术作品

老师因不堪凌辱，在一个炎炎夏日逃到郊外，投河自尽……

几十年后，我在深更半夜，耳畔会突然响起李老师的惨叫声（我家的窗子正对着关押他的暗室），可见“文革”对孩子们心灵的摧残之深。这仅仅是全国大中小学校教学秩序遭到大破坏的一个缩影。

在全国学生不要读书，社会一片混乱之际，我于1969年春天，糊里糊涂地进了上海市培明中学，成了一名中学生。

谁料，进入中学正逢上全国批判苏联凯洛夫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校园里贴满了大字报，仍然是教师无法教，学生不愿学的局面。更糟糕的是，由于社会风气恶劣，许多青少年都沾染了流氓习气。我校就有十几帮男女流氓阿飞，成天在校园里游荡；老师讲课只要脸转向黑板，背后马上会飞来一口浓痰。至于校园里打群架、赌博、抽烟、酗酒、偷窃、乱搞男女关系简直司空见惯。

我作为被耽误的一代，从小学四年级起几乎没有学到什么知识，以致1977年12月恢复高考后，我第一次参加考试，竟然连有理数四则运算都做不出，更遑论考古文考英语了。以后，经过近两年的日夜拼搏，又连考两次，总算考入华东师大历

史系。我在同龄人中算是一个幸运儿。

不过，“文革”对教育的大破坏，也曾引起高层的恐慌，期间有过3次企图扭转知识荒芜局势的措施：一次是针对全国学校瘫痪、红卫兵搞大串联，高层在周恩来的指示下，提出“复课闹革命”，这样才不至于让祸水无止境地蔓延。一次是毛泽东看到“文革”中断了大学的招生和教学，便提出“走七·二一工人大学”道路的所谓教学革命，搞了几年“工农兵上大学”，至少为后来恢复

高考留下了一个参照系。第三次是1975年邓小平以“整顿”为名，希冀中断“文革”混乱局面的努力，他在1975年9月26日听取科学院工作汇报时说：“科技事业要后继有人，中心是办好教育。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随后，教育秩序似乎有一些好转，但不久便被“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所中断。

上述所见，“文革”对教育的大破坏是史无前例的，它不仅扭曲了一代人的灵魂，而且留下了难以修复的后遗症。其对当时的社会，对今后的历史所造成的巨大创伤，至少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十年动乱耽误了整整一代人，造就了一支庞大的缺少文化的“蛮荒”大军。“文革”10年，除了“老三届”（指66、67、68届高、初中生）尚读到一些书外，这以后的历届中学生几乎没认真上过一堂课，从而产生了千百万文盲、半文盲。当时的中学生的文化程度之低，现在听来像“天方夜谭”。例如，我大学毕业后执教过的上海市七一中学，在1971年春季的期中考试，语文老师出了一道作文题目《我的一天》。结果，大部分初三学生都写得乱糟糟，有一名女生竟通篇写满了“早上吃饱，中午又吃饱，晚上再吃饱，然后睡觉”这几句话，令人震惊。

“文革”使青年一代文化大面积滑坡，甚至连“四人帮”都感到震惊。1975年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在一次会议上，传达了一则知识青年的笑话。这是一封上山下乡知青写给母亲的信：“……我被县文化馆借用了3个月，最近听说要给我专政，今后还有可能上吊……”其母看罢信，当场昏倒。原来儿子把“转正”错写成“专政”，把“上调”错写成“上吊”。至于知青出身的干部追查李逵、李时珍在哪里工作、是什么成分的笑话不胜枚举。概言之，“文革”使社会成了一口不要文化、没有文化的“酱缸”。

其二，全国教学秩序被打乱后，教育这一诞生人才的摇篮几乎被人遗忘，整个社会弥漫着“读书无用论”的氛围。由此造成的恶果，便是人才的匮乏和断裂、国家科技落后、生产力停顿、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乃至发展到国民经济崩溃的边缘。

其三，中断了优秀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几千年积淀下来的伦理道德与“荣辱观”。“文革”中伦理道德被破坏殆尽，在残酷的阶级斗争中，儿子斗老子，甚至杀死老子的事不绝于耳。“文革”初期仅是从行动上摧毁优秀的伦理道德传统，至后期掀起的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运动，则从理论上彻底否定传统文化。试想，一个没有受到良好教育，不知道“人之初，性本善”，不知孔子为何方圣人的青年，怎么会懂得长幼有序？怎么会以仁爱之心待人？因此，当时社会的兽性横行便不足为怪了。

其四，破坏了中国社会艰难建立起来的人文精神和价值关怀。“文革”中的红卫兵、造反派参与打砸抢，毁掉了难以计数的名胜古迹。这与他们缺少历史教育、缺少人文教育有关。正因为一代人不知道人文精神为何物，乃至对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脉无知到了极点，甚至影响到现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文革”中长大有“不破不立”情结的地方官员，在汹涌的城市化浪潮中作决策时，根本不考虑历史文脉，以至毁掉了大量历史文物遗存，造成了中华民族无法挽回的损失。

其五，“文革”对教育破坏所造成的危害，至少要影响三代人。如前所述，“文革”中长大的一代人首当其冲。他们因为没有受到

良好的教育，所以在改革开放、知识重新吃香的年代，率先尝到了苦果。当下，在产业结构调整与现代化推进的过程中，下岗的许许多多职工，号称“40、50”人员，正是“文革”中没读过书的人。更因为他们缺少知识，所以他们的子女也难以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在起跑线上就输给了优秀者的子女。如此循环，他们子女的子女在几十年内都难以跳出“文革”的阴影。而且，这些弱势群体在艰难的生活中，心态肯定不平衡，遂容易产生对社会不满的因子；这种因子经过长期积累，也许会存淀在几代人的心灵中，我们不可等闲视之。

(责任编辑 李晨)

书屋 2007年第2期目录

书屋讲坛	我研究美国史的经历 寻找另一个中美关系：华人在美国文化边缘的行走 ——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	刘绪贻 任东来 胡美
学界新论	被贬低的思想 康有为与作为“国教”的孔教 从“飞行器”谈起的“科学”	景凯旋 伍国 冯鸽
流年碎影	感谢命运 ——《寻找家园》代序 从《大学生》到《滨河街公寓》 一本旧书里的精神 当代文学为什么遭到精英群体的遗弃 谈废名的一封信	高尔泰 蓝英年 王西德 摩罗 陈建军
茶余饭后	“奇迹”：小猪和蜘蛛的故事 谈相声艺术	孙康宜 方成
灯下随笔	米脂的婆姨与罗马的男人 古代的爱情信物 公文并非都无趣 《庄周梦蝶》及其他 哈姆雷特之困	秦燕春 伍魏 眭达明 毛翰 曹瑞涛
史海钩沉	龚自珍与魏源：告别“衰世”第一篇 杂说匈奴西迁 民生公司职员六十年前的日记（二）	傅国涌 林子明 冉云飞
裁书刀下	当教授成为主编 ——我看陈思和主编《上海文学》 关于“劣币驱逐良币” ——与周其仁先生商榷 舒芜先生《“国学”质疑》之质疑	汪成法 陈心想 邵建
前言后语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译序	张云江
邮发代号：42-150 月刊 每月6日出版 定价：5.00元 地址：长沙市韶山北路443号《书屋》杂志 邮编：410007 电话：0731-5791300 5486812 传真：0731-5790197 邮箱：nlh5314@263.net		

父亲汪锋的“半个”长征

王又凯

红军长征胜利 70 周年时有许多纪念文章和活动，其中有一篇文章说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中只有“惟一”一位参加过长征。我清楚报纸上所指的人就是我父亲汪锋的老战友贾拓夫伯伯，他跟随红一方面军走完了全部长征。但“惟一”两字我不敢苟同，据我所知，在西北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中最起码还有两个人参加过长征：一位是张德生伯伯，他随红四方面军进行了长征。另一位就是我的父亲——汪锋，他随红二十五军进行了长征。但他的长征只有“半个”，并且是一个非同寻常的革命者的长征，一个鲜为人知的悲壮故事。

小学时有篇长征的课文，说的是红军战士爬雪山、过草地、吃树根、啃皮带，在艰苦的环境下，为了理想，为了穷人求解放，以大无畏的革命意志和自我牺牲的革命精神去不断地争取胜利。上课的过程中老师问我，你爸爸是否参加过长征，同学们也都非常想知道，但我对此却一无所知。

我的父亲汪锋当时担任中国共产党甘肃省委第一书记，他总是开会或下乡蹲点，平时很少在家。一次我趁他正好在家时间起这个问题。爸爸沉思了一会，一声不响地离开了。我想他一定没有参加过长征。可是，同学们不同意，坚持说老革命都是老红军，老红军就一定都参加过长征。两天后我又向爸爸提出了这个问题。爸爸微笑了一下，还是没有回答我。这时妈妈接过话茬说，你爸爸参加过半个长征。“半个”？爸爸肯定地点了点头。直到文化大革命时，在我父亲的检讨材料中，我才搞明白了“半个”长征对我父亲的意义。

1933 年 5 月，红二十六军南下途中，在陕西兰田县张家坪被敌人包围，军代理政委汪锋与刘志丹、王世泰率领部队分头突围。在战斗中他腿部受了枪伤，潜到西安边疗伤边继续革命。恰在此时，陕西地下省委遭到严重破坏，书记叛变，贾拓夫伯伯侥幸脱险后，又冒着生命危险找到我父亲，通知他马上转移。随后

贾拓夫去了江西瑞金，而我父亲辗转陕南领导当地的武装斗争和兵运工作，后因腿伤加重，又去了上海，在中央临时分局军委工作。

1934 年各主力红军都先后离开苏区，进行长征，而当时红二十五军离开鄂豫皖苏区，进入陕西境内。1935 年中央军委派我父亲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去联系红二十五军，恢复联络和协调该军与陕西地方杨虎城部队的关系。

红二十五军是在主力离开根据地后，由留守部队和



汪锋（1936 年）

赤卫队重新组建的。由于敌人的清剿政策，广大指战员无不亲眼目睹了自己的亲人被杀害，家园被焚毁，因此都有强烈的阶级意识和对敌人的仇恨。这是一支在长征中唯一没有减员的红军队伍，是英勇善战的军队。而我父亲受命所要协调的杨虎城部是警三旅，该旅旅长张汉民是1925年参加革命的中共党员，该旅有着我党多年的兵运工作基础，有许多秘密党员，是一支倾向革命的队伍。我父亲曾担任过中共陕西地下省委军委书记，在该部队做过兵运工作。跟张汉民、阎揆要（中共党员，黄埔一期生）等有组织关系。此次受命，他应该是最合适的人选。如果两支队伍能联合行动，必将开创革命的新局面。

1935年4月，当我父亲乔装打扮、星夜兼程地赶到陕西柞水九间房该旅阎揆要团团部时，团部里一片混乱。仅在几个小时前红军设伏歼灭了该旅的大部，旅长被俘。父亲听了阎揆要讲的事件经过，当即向阎保证，他会向红军解释，并将张汉民同志要回来。在阎的催促下，我父亲连饭都没吃就上了路，赶往红军驻地葛牌镇，在那里他见到了红军的所有领导人。

父亲急切地一再解释，证明张汉民是共产党员，是自己人，是同志，要求马上放人。随后又向红军传达了中央文件，当然文件是记在脑子里、凭嘴说出来的。文件的内容，特别是对革命对象的政策，与红军离开根据地和中央失去联系之前的内容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比如，从杀地主到要给地主生活出路等等，这话听起来好像是叛革命的言论。我父亲只管滔滔不绝地讲，并没有顾及到气氛的变化，没有注意有人拍桌离席而去，直到几个红军战士提着枪冲进来，对他怒吼“反动派”并要揍死他时，他知道自己已经无法完成任务了，内心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

我猜想杀不杀我父亲在红军的领导里一定有一场非常激烈的争论，当时没有杀他确实是一个奇迹，真是万分之一的侥幸。但奇怪的是事后又为什么没有杀？就此在“文革”后我多次问过我父亲，归纳起来有四点原因。第一，他的身份高，是中央特派员，有写在蚕丝纸缝在袍子内的介绍信，因此在一时搞不清楚的情况下红军不好杀他。第二，在看押的过程中有空他就教战士文化和一些陕甘苏区的红军歌曲，因此逐渐地获得一些人缘。第三，有次夜里部队转移，而看押他的战士却睡着了，他完全可以逃走，但他却返转身叫醒战士一起追上了部队。事后有位领导问他能跑为什么不跑？他回答说如果自己从红军的队伍中逃跑，以后无法证明自己。第

四，也是最后的，河南信阳是该部的老根据地，地下党正好也派人来联络，受该军的委托在上海证实了我父亲的身份。因此我父亲才能和红二十五军一起长征到陕北。

1947年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张汉民同志被中央追认为革命烈士，他被误杀是我党一大损失，而我父亲是这一过程的历史见证人。我曾多次询问过我父亲，他说当时被看押时是五花大绑的，头上套着只留眼洞的布袋，身上背着东西像个驮夫，透过眼洞他看到了张汉民和张明远（旅参谋长，中共党员）与他一样，被绳子牵着行军，大约一个月过后，先是张明远不见了，他问战士说是放了。后是张汉民又不见了，他知道大事不好，大声抗议，坚持不走了，直到见到军领导，并当面说他们是错误的。而张汉民被俘的过程也十分痛心。张部本来可以以逸待劳的截击红军，而他却尾随红军，实际上是想起到掩护作用。他还多次派人与红军联络，并按红军要求向对方提供了援助。因此，他错误地认为自己已经与红军达成了谅解，认为不会发生战斗，丧失了警惕。而阎揆要发现红军有异动，派出的联络员都未返回，情况有些异常，曾提醒张汉民，而后者却不以为然，结果阎团由前锋变后卫得以保全。由于警三旅尾随红二十五军太近，因此发生误会就成了迟早的事情。而我父亲汪锋未能起到作用，未能将历史改写，这肯定是他终身的痛苦。我想这也是他不愿意提及自己参加过长征的原因吧。他的长征确实和其他红军战士不一样，没有轰轰烈烈的战斗，没有面对敌人枪口的牺牲，没有跌宕起伏、波澜壮阔史诗般的英雄壮举。当他高一脚低一脚地在坑洼不平、崎岖嶙峋的陕南山区艰苦地跋涉时，他是作为“反动派”，天天面对死亡和内心痛苦的煎熬，被自己人押着走的。但就是这样，他一天也没有放弃信仰或失去信心，即使是死也不会离开革命的队伍。

从1935年3月九间房事件他到红二十五军时算起，到9月红二十五军胜利到达陕北，期间共6个多月，这就是父亲汪锋的长征时间。我母亲生前多次告诉我，红军要去陕北，你爸爸是个向导。这句话的含意深远，我知道它的分量。我认为我父亲的长征时间虽短，又是另类的，但它同样是伟大的。这个长征从另一方面也说明了革命是伟大的，但道路是曲折的，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因此我更加缅怀那些为革命而勇于献身的先驱，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秘密战线上的老一辈革命者，他们无私无畏的革命勇气、理想高于生命的品德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灵魂。

（责任编辑 李 晨）

李 庄 的 境 界

余焕椿

五次近距离接触

回顾 2006 年,最令人哀伤的事,莫过于 3 月 3 日李庄同志逝世。当时,很想写篇怀念他的文章,一想到他是人民日报前总编辑,新闻界头面人物:能上天安门、进怀仁堂、出入勤政殿采访的首席记者;第一批抗美援朝战地记者,并且是中、法、英三国记者组成的记者组组长;1954 年日内瓦会议中国记者团副团长;1957 年去莫斯科帮助苏联创办《苏中友好》杂志的顾问、专家组组长……这么多显赫经历,真的不知从何下笔。

我虽在李庄领导下工作 27 年,但受其面命耳提机会并不多,屈指算来不过五次,这五次却给我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第一次是刚到人民日报。按报社规定,新来大学生必须到活版车间和夜班工作一段日子。有一次给李庄送大样,他笑眯眯问我,“新来的”?我说“是,现在排字房劳动”。他说“很必要,记者、编辑要尊重排字工人劳动,看看他们是怎么工作的,亲身体会一下有好处”。短短几句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让我一生受益。后来我写稿、编稿都记住他的话。写稿字迹工整,编稿线条清晰,不出“花脸”,不“放风筝”,这样工人工作起来既快又省眼力。

第二次是“文革”期间,他已靠边站了。一天,我们在王府井百货大楼前相遇。那时人际关系有诸多忌讳,一时竟不知说什么好。我一脸正经,拣了句当时时尚的话:“老李,保重!”岂料他微笑如初,轻轻拍了一下我肚子,“当心,凸出来了”。我不好意思朝他一笑。逆境中,他依然腰板挺拔,神

清气爽。我一高兴,进了大楼竟然不知去干什么!

第三次是我们相处最长的一段日子,大约一周,地点在大庆。奇怪的是,这回反而没一点印象。前几天翻书,书中夹着一张黑白照片,正是我们在大庆铁人事迹陈列馆前的留影,终于想起了一些。那是 1975 年冬,我们都在记者部,老李是“走资派”,我是“保皇派”,都是被派到“阶级斗争第一线”经受考验的。那时,许多迹象表明,“四人帮”垮台已经不远。我们既无心工作,更不愿意接受什么考验,只盼早日返京。与我们同行的还有三位年轻人,两位女生是外地派到报社来培训的通讯员,他(她)们有他(她)们的任务,彼此都存有戒心,平时很少说话,怕祸从口出。我和老李起得早,每天早晨洗漱便是我们交流信息时间。人生地不熟,有何信息可言?所谓信息,不过是听新闻广播,分析时局动向。一连几日,一无所获,都感到非常失望。

第四次是我有些事情想不清楚,到他办公室求教。详情容后再述。

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1999 年下半年,我受一家出版社之约,匆匆赶写了一本书,以示告别 20 世纪。书名为《人民日报风云录——中国新闻内幕》。2000 年 8 月的一天,我上门送书,请李庄同志批评指教。多年不见,老李真的老了。早听说他腿脚不好,没想到竟到如此地步:拄着拐棍,缓慢移动,脚几乎不能离地。一阵悲哀涌上心头,我赶紧上前扶他坐到身边椅子上。他还是那样和善微笑,神色也不错,同刚才乍一见面时相比,我心情顿感好了一些。我将书递过去,他看着书的封面,笑容顿失,半天不吭声。我知道坏了,一贯讲求语言朴实、表述准确、实事求是的老编辑老领导,

怎能容忍“中国新闻内幕”这样哗众取宠的标题？我赶紧解释，这个副题是出版商加的，根本没有征得我同意。他表示理解，但还是摇摇头。很快他又恢复了平静，同我聊了些近况。我对他充满了尊敬和感激，他的认真、他的严谨、他的求实，一点没变。临别时我还是那句“时尚”语，“多保重”，但内涵同前次完全不同！

一桩旧案有了结果

月初，人民日报好友 W 从国外回来，说他在一家华文网上注册了自己的博客，上面有我关心的内容，有空上去看看。他是位有心人，善于积累资料，博客内容丰富，时事、历史、文化、音乐、美食，无所不有。有一段写人民日报“文革”，其中涉及到李庄（恕我用了真名——作者）：

一次揭批会的重点对象是老李，A 青年说，李在手心上写个“江”字，神秘地说犯错误了。群众质问说了没有？老李一口咬定：没说、没写。B 青年作证，老李写时我在场。老李有点急了，但还是那四个字：没说、没写。会议没有结果。粉碎四人帮后，老李

解放了，我们谈起当年事，又问他到底写没写、说没说，他笑着回答仍是四个字：没说、没写。我不死心，又去问 A 青年，他说老李确实说了、写了。其实我当时就明白，双方做得

都合乎运动特点。小青年卷进“邪气”，想摆脱；老李如承认，不但罪大，还要追查他从哪来的消息，牵连更多人，死不承认太重要了。离休后老李写回忆录，什么都写，唯我关心的旧案没写。

W 博客说的这件事发生在人民日报“批邓”运动中。“批邓”是“四人帮”全面夺取人民日报领导权最后的猖狂一跳。由于有一两个老干部参与其中，出谋划策，搞得人人自危，一片白色恐怖，故有上述事情发生。W 本想回国后继续追问这宗旧案，不幸老李走了，成为悬案，有些遗憾。我对此事也有兴趣，所以再读李庄有关回忆录，有了新发现。我对 W 说，李庄回忆录写了这件事，对当时发生的事表示理解和宽容。李庄是这样写的：

报社批邓追查俱乐部成员罪行时，有人揭发我说江青、骂江青。给我造成很大压力，我也埋怨过几位揭发的同志不够“仗义”。事后想想，在那雷霆万钧重压之下，人家“交代”一下也是不得已的，何况确实骂过，并非构陷，至少我这当事人不应该责备人家。过了一段时间，对这几位同志友好如初。（《李庄文集》回忆录上编 341 页）

W 听了又惊又喜，陈年老账，终于有了结果，



李庄（中）、余焕椿（右一）等在大庆铁人纪念馆前留影

表示要立即修改自己的博客。

李庄同志可以原谅宽容年轻人，但绝不原谅宽容为虎作倀、晚节不保的老干部。“文革”前夕，人民日报处境十分困难，中央精神听不到，许多事情把人民日报撇在一边。在这种情况下，报社上上下下办事倍加小心，李庄管编辑业务，天天出报，更是小心翼翼。即便如此，也难逃脱厄运。震惊京城的删节《解放军报》社论事件，就是突出一例。这个当时被认为是“空前严重错误”，给李庄造成的压力，也可借用“空前”二字来概括。

1966年5月4日，《解放军报》发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社论。本来兄弟报纸社论可转载也可不转载，军队报纸的社论更是如此。考虑到军报这篇社论反映了毛泽东即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言论，非常重要，人民日报决定5月5日转载。李庄安排好版面，全文刊登。主持日常工作的另一位副总编辑一觉醒来，看到大样，提出要大加删节，并作新闻处理。李庄据理力争，坚持以不删为好。这位平时飞扬跋扈的人，哪里听得进去，坚持要依他说的做。老李劝阻无效，不再固执己见。交别人删节不放心，怕删出事，决定自己动手，同一版主编同时处理。结果删去两小段，一段略嫌重复，一段纯粹是对军队说的话，加起来不足500字。应该说这样做已够慎重了，删去的也不伤全文，根本谈不上是“空前严重错误”。

5月6日，康生主持会议，严厉指责，大加鞫伐，声称人民日报犯这种错误绝非偶然。李庄无奈，只好承担责任，作自我批评，写检讨。李庄写检讨在人民日报是出了名的，以往一次就能通过。这回不同，写了一遍又一遍，怎么也过不了关。个人检讨不要紧，要人民日报在报上公开检讨，令他痛苦不已。一个把集体荣辱看得比个人荣辱重千斤的人，内心痛苦不言而喻。李庄不是没有怨言，有怨言，有时甚至怒不可遏。那位坚持要删军报社论的人，事后装聋作哑，若无其事，李庄大发感慨：“我们国家怎么竟有这等人物！”

“这等人物”生活中并不少见，前面提到那位删节社论的主编，也是例子。毛泽东说人民日报公开检查影响太大，可以免了。事情本已过去，一次批斗李庄的会上，那位参与删社论的主编旧事重提，无中生有，要李庄交待“删社论究竟有什么阴谋”？李庄非常恼怒，要表现自己，也不能堕落到

这种程度。还是看他在回忆录里是怎样说的：“他问得急了，我也豁出去了，就说，删社论，你我同时动手，你删的比我多得多，有几处还是我恢复了的，底稿现在校对组，可以查看。我不知道有什么阴谋，你要知道有阴谋，请当场揭发。好了，就像皮球被扎了一针，这个积极分子马上泄了气，再不那样张牙舞爪。”（《难得清醒》354页）一向宽厚，从不与人计较的老李，到了忍无可忍地步，也会愤然而起，狠狠予以一击。追问者被这突如其来的威慑力量镇住了，狼狈不堪。俗话说，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那种尴尬莫过如此。

苦涩的经验之谈

人民日报年长一点的同志都知道，在报社领导层中，李庄是作自我批评、写检讨最多的一个，他甚至在报上作过署名检讨。李庄长期做夜班，是报纸最后总把关者。只要报纸上出问题，首当其冲的就是他。他勇于承担责任，从不诿过于人。当然，有时是替人受过，有时是违心检讨，心悦诚服的时候也有，相对而言比较少。

1980年8月，中央撤销人民日报党的核心小组，恢复编辑委员会领导体制。与此相适应，新设立了一个编委办公室，作为编委会的办事机构。我作为办公室负责人，写检讨的事部分落到了我身上。“文革”结束后最初几年，《人民日报》大胆改革，进行了一系列拨乱反正的宣传报道：1978年3月26日开始的真理标准讨论；1980年7月22日开始的“渤海2号”事件报道；1980年10月中旬对一位部长特殊化的批评，以及后来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开展舆论监督等等，都是当时最有影响的宣传报道。这个时期，《人民日报》声誉很高，深受读者信任与欢迎，胡乔木也承认这是“人民日报历史上办得最好时期”。但是，人民日报的日子并不好过，批评与责难之声不绝于耳，老总们口头的、书面的检查一次又一次、一篇又一篇，弄得焦头烂额。每到年终，给中央的总结报告大部分是检讨，我参与此项工作，也很苦恼，尤其是写那些替人受过、违心检讨的检查。

为此，我曾经请教过李庄，说用“听话”“不听话”判断是非，总难令人信服。老李听了有点兴奋，说：“不听话犯错误，听话也犯错误。人民日报

的事就是这样。”这可不是随随便便说的,我想这一定是积压在老李内心深处的一种痛苦,一种经验。我突然觉得这很可能也是人民日报一些领导人的共识。李庄离开他的办公桌,坐到我旁边沙发上,对刚才的话作了解释:1951年5月间,突然发动了一场批判电影《武训传》运动。这场批判对事情的性质判断失误,上纲上线,言辞粗暴,弄得好多人从此不愿说话了。批《武训传》完全是奉命做文章。李庄说,我看过一份“我们犯过哪些重大错误”的材料,不知为什么不提批判电影《武训传》?批《武训传》开创了一个以阶级斗争囊括一切搞运动的模式,后患无穷!接着他给我列举一连串事实,无一不是说明“听话也犯错误”。

李庄说的那份材料,是评论部的同志写的,内容同老李列举的事实几乎一样。老李和材料上说的都是些什么问题呢?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农业合作化后期的急躁冒进;批判“反冒进”;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关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的斗争;关于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完全错误的十年“文化大革命”。前后20多年,在这些问题上,犯的都是“左”的错误。这种“左”的错误,除了合作化后期、人民公社化、大跃进等问题上,表现为急躁冒进,超越了客观现实可能性之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主要表现为阶级斗争扩大化,严重地混淆了两类矛盾,伤害了大量的革命干部和群众,造成了严重政治后果。这一切,人民日报都在宣传上起过推波助澜作用。李庄说,我同你说这些,并非强调客观,主观上人民日报也确实犯过很多错误,比如,宣传生产建设成就方面的浮夸风,推广先进经验方面的瞎指挥风,政策宣传和理论宣传方面的片面性,都非常严重,给实际工作造成不应有的损失。刘少奇同志曾批评说,“这几年很多事情,是中央领导一半,人民日报领导一半”,指的就是大跃进时期人民日报的宣传。当我要离开时,李庄言犹未尽,问我听过“宁犯政治错误,不犯组织错误”的话吗?我说听过,还说这好像是报社前辈们的经典语言。我问他如何解释,他说,犯政治错误是认识问题,个人容易脱身,违反上级决定,就是犯组织错误,反而会成为政治问题,难免要受处分。

这是一次苦涩的经验之谈,现在想起来仍不

是滋味。

“建议”吐肺腑之言

1980年发生了波兰事件。9月,乔木同志提出中国也有发生波兰事件的危险,应当采取对策,特别提到要注意宣传工作。陈云同志在此时也发出“翻船”警告,说有两种可能出波兰事件,一是经济工作搞不好,会出乱子,一是宣传工作搞不好,也会出乱子。

两位领导人发警告都提到宣传问题,这就不能不引起宣传部门的高度重视。人民日报对此并不积极,因为明知说真话不仅不会采纳,反而有可能要冒风险。但是,这是一种责任,人民日报就要认真对待。几位主要领导认真分析了波兰事件发生的原因,结合多年报纸宣传经验,给中央写了一份《从波兰罢工事件中吸取教训改进报纸宣传工作的建议》。

这个建议所作的分析,既不同于胡乔木,也有别于陈云。它实际是总结了人民日报多年的经验,尤其是“文革”教训,发出的肺腑之言。李庄同志长期值夜班,积累了大量材料,他讲究策略,文字精炼,语言朴实,起草建议书义不容辞。它虽是集体智慧的产物,但其中有李庄的境界。

建议书首先分析波兰罢工风潮爆发的原因,是人民群众长期积累对现实的不满。这种不满既包括由于波兰当局实行错误政策而造成经济状况的日益恶化,人民生活疾苦得不到妥善解决;也包括社会政治生活的许多弊端,如官僚主义、官员搞特权和贪污腐化、缺乏民主、工会不能代表工人群众利益等。并说波兰领导人卡尼亚等也承认,波兰党和政府“最严重的错误是党逐渐脱离人民的需要,不让公布这个国家的实际情况以及人民对党和报刊缺乏信任”,宣传机构“报喜和吹捧的宣传”是不对的,强调“必须推倒我们自己在社会与党之间建立起来的这座不信任之墙”。

建议之精髓在于这段分析。下面是三点具体建议:

一、党要加强对报刊的领导,使之更好地反映人民的呼声,把报刊作为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一个重要工具。党一方面可以通过报刊广泛地了解民意,在决策时更好地考虑到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

求；另一方面利用报刊实事求是地宣传我们的政策和工作中的成就，并开展批评自我批评，监督改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以及干部的不正之风，以减少群众同党和政府之间的隔阂，增强群众对党的信任。同时，还要利用报刊加强对外国资产阶级的反动理论、腐朽思想的批判，令人信服地宣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以防范和抵御外来的反动、腐朽思想感情对人民群众的腐蚀。

二、为了进一步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可以考虑让政协或民主党派出版报纸，或者恢复《光明日报》作为民主党派的机关报，它的言路可以比人民日报更宽一些，在坚持四项原则的前提下，让群众发表各种不同意见，包括错误的意见，通过讨论和争鸣以达到明辨是非的目的。

三、尽快制定体现社会主义民主的新闻法和出版法，使各种报刊和出版物有法可依，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充分发挥作为舆论工具的作用。

三点建议并无惊人之举，只是“改进”而非“改革”，但它表明的基本认识是：要防止波兰事件，根本的对策是进行改革和端正党风。如果在改革问题上摇摇摆摆，甚至设置障碍，党风又不好，出了乱子，怪宣传工作是无济于事的。

为老胡仗义执言

1984年7月9日，人民日报编委会向中央书记处汇报报社整党情况，会上，胡乔木提到胡绩伟在“文革”中领导过报社一派群众组织，意思是说胡绩伟是造反派。在书记处会议上作这种毫无事实根据的指控，令人民日报编委们惊愕。二胡之间的嫌隙已不是什么秘密，“文革”后人民日报独立思考精神比“文革”前强多了，尤其老胡。他虽尊重胡乔木，但不再是驯服工具，不像以前那么听话了，因之招来许多麻烦，进而丢掉乌纱帽。报社内部不满胡绩伟的人利用二胡之间的嫌隙，不时往乔木那里送小报告。老胡早已感到工作不好做，多次提出辞职，直至1983年10月，获中央批准。没有想到，人已下台，还要把这种不实之事提到中央高层会议上，显然是要在整党中进一步肃清所谓老胡的影响。

人民日报两位主要领导人非常重视这件事，秦川（社长）和李庄（总编辑）决定为老胡洗刷污

水。秦川是“文革”后调来报社的，对此事不知就里。最有发言权的是李庄。李对二胡之间的关系十分清楚，问题的复杂性也看得明白，处理起来有一定难度。但实事求是、仗义执言是他做人的原则。于是，李庄起草与秦川联名，给胡乔木送一封信，郑重其事说明胡绩伟在“文革”中的情况。

信开头说，“您一直认为胡绩伟同志是一个好同志，对他有过多次正确的评价。7月9日，您在书记处会议上提到绩伟同志‘文革’中领导过报社一派群众组织‘井冈山’的问题，为此，我们慎重地进行了调查了解，现将实际情况向您作一报告”。接着，详细介绍胡绩伟在“文革”中的遭遇，最后作结论：“胡绩伟同志在‘文革’中的情况是清楚的：他并没有起来造反，也没有介入群众组织的活动和派性斗争，更未领导过什么群众组织。”

信的最后，特地对一句涉嫌老胡是造反派的话作了解释性说明：“粉碎‘四人帮’后，报社根据‘九·一三事件’以后特别是1974年‘批林批孔’和1976年‘批邓反右’中的表现，根据德、才等条件，提拔了一批中层干部，其中有12名曾经参加过‘井冈山’的同志，约占现任中层以上干部总数的五分之一。为此，报社有人说：现在是‘清凉山的头，太行山的身子，井冈山的手脚’，意思是说，社一级的领导是延安时期的老干部，中层干部是太行山来的居多，中下层干部有一批是‘文革’中参加过‘井冈山’的人。胡绩伟同志曾几次在会上批评过这说法，他并没有说‘今天参加会的全是井冈山的人’等话。”这事就这样不了了之，再无人提起。

1991年，当我离开人民日报到四川去工作，在电话中向李庄辞行时，我说，李庄同志，我要走了，我是带着许多遗憾走的，其中之一就是我还许多问题，有些事来不及向您当面求教了。他安慰我，教我如何在新环境下工作和生活。没有想到，我回北京了，他却病了、走了，让我永远失去了机会。好在他送了一本新书《难得清醒》给我，我的那些问题和事，书中都有答案。2006年3月15日上午，我去为他送行，看着他安详地躺着，心想上帝太不公平，许多头脑糊涂人不召走，偏偏召走这么一位头脑清醒者？！

（责任编辑 李 晨）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举行 2007 年新春联谊会

名誉会长任继愈等 300 余人到会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2007 年新春联谊会于 1 月 28 日上午在北京万寿路中办老干部活动中心举行。出席联谊会的有名誉会长任继愈及在京的顾问万绍芬、王国忠、刘精松、冯理达、庄炎林、宋涛、李中权、李伦、杜子端、贾若瑜、黄玉章、裴周玉、魏国运等，常务顾问冯征、杜导正，第一副会长张文彬，常务副会长曲润海、王俊义、何承阳、王才，副会长鲁諄、洪深生，理事、名誉理事、会员和老将军、老同志、企业家代表共 300 余人。

联谊会由洪深生主持。张文彬代表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向到会的顾问、理事、会员、专家学者拜年。祝大家猪年大吉，合家幸福，新年快乐，万事如意。法人代表曲润海向到会的同志们汇报了研究会 2006 年的主要工作情况及 2007 年的工作意见；王俊义着重汇报了 2006 年主要学术活动情况，介绍了去年在台湾成功举办“中华文化与当代价值”国际学术研讨会的筹备过程、主要学术收获及对促进海峡两岸文化交流的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资深学者任继愈、老红军王定烈先后讲话，对我会今后工作提出宝贵建议。大家对研究会 2006 年的工作及开展的各项文化活动表示满意，报以热烈掌声。

联谊会由我会公共关系部承办。会上，在理事李文平主持下，由北京武警部队文工团的艺术家们演出了精彩的歌舞节目。92 岁高龄的老红军李中权还满怀豪情地即兴演唱革命歌曲，受到大家热烈欢迎。联谊会始终充满喜庆、欢乐的气氛。

SIEMENS 西门子助听器

解决听不见 听不清
耳聋 耳鸣的烦恼

服务中心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甲16号
电话：010-64074641 传真：010-64055026
邮编：100009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外大街46号天恒大厦508B
电话：010-84608847 84608848
邮编：100027
网址：<http://www.sw-tl.com>

《共和国三次哲学大论战》序言

李 锐

《共和国三次哲学大论战》的作者，杨献珍的秘书萧岛泉，为此书出版邀我作序，虽然我于哲学是外行，又未能细读全书，仍勉强答应，是深感作者为当年这种论战详加记述，为历史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大好事，值得向国人尤其从事理论研究的学人推介。

杨献珍是我们“一二·九”这一代人的前辈，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他在草岚子监狱中，就曾翻译过多部马克思著作，长期在狱中作红色教员。我同老人有过一面之缘，大概是1979年我回京复职之后，或许是1980年，在中央党校工作的老熟人张震寰来找我，说老人很想找我谈谈。原因就在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由于他对大跃进运动和三面红旗持不同看法，在党校讲坛上讲过许多“反对派”的话，如“大跃进提出要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干，但在好多地方却变成了胡想、胡说、胡干。”“钢铁粮食都是硬东西，说假话是办不到的。钢铁是一吨一吨炼出来的，粮食是一粒一粒长出来的”等等。于是在康生指使下，他被批斗了九个多月，降职罢官。在下放陕西、新疆经过实地调查后，他更是意志不摧，锐气未减，坚持自己的哲学观点：“要好好学习唯物主义，客观规律不是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在哲学上是意识自由论。”随后在恢复讲课后，老人继续批判“三面红旗”造成的恶果。同时公开宣传中国应当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管理经验，批评那种害怕资本主义而反对农民求富的欲望和行为。那次长谈，我才知道，文革时老人也遭受牢狱之灾，长达八年。

今年是杨献珍诞辰110周年，为了追思老人对国家和历史做出的贡献，作者在《一代哲人杨献珍》出版之后，作为姊妹篇，详尽地记述了三次哲学大论战的始末，即当事人杨献珍同另一方

论战时双方的主要立场和观点。上世纪50年代后发生的历次政治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都是在极左的思想统治下发生的。在意识形态方面，“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以及“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哲学论战，作者对我说：尤其令人惊心动魄，生死交恶。当年我在工业系统工作，1959年我已成为贱民，这三场论战全然不知。

第一次论战发生在上世纪50年代，主题是：关于中国过渡时期“单一经济基础论与综合经济基础论”。以杨献珍为代表的一方提出了综合经济基础的理论，认为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由五种经济成分组成，即国有经济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合作社经济的半社会主义所有制，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个体农民所有制和国家资本主义所有制。而另一方则提出了单一经济基础的理论，认为过渡时期经济基础只能是唯一的全民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由于当年有违领导权威急于建设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综合经济基础论当然受到围攻和讨伐。其后果到文革十年经济陷于崩溃的边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是大家知道的，已经做了历史的决议。

第二次论战发生在五六十年代，即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这一哲学命题，究竟是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是黑格尔的语言，还是恩格斯的语言。以杨献珍为代表的一方认为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命题是唯心主义，是黑格尔的语言，不是恩格斯的语言；而另一方则认为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命题是唯物主义，是恩格斯的语言，而不是黑格尔的语言。由于这场论战正处于大跃进极度狂热的岁月，当局需要哲学界为之提供理论支持，因此，另一方就理所当然地为当局赏识和青睐，从而成为主流意识形态；而杨献珍的一方，

由于坚决反对大跃进中种种唯心主义的行为，而受到当局和主流意识形态的批判、打击和高压。从而导致在相当长的时间中行而上学空前猖獗，唯心主义空前盛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受到严重破坏。

第三次“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论战，发生在1964年至文化大革命的前夜。一翼以康生、陈伯达等一些哲学骗子、理论奴才为首；另一翼为杨献珍作代表的理论学术界的人士。引起这场“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论争，是因为杨老在中央党校授课时讲到了“合二而一”这一哲学命题。由于国家领导人当时正以“一分为二”作为阶级斗争的理论根据，认为“一分为二”是辩证法，是普遍规律；并多次强调：“有阶级斗争才有哲学，不搞阶级斗争，搞什么哲学；搞哲学的人以为第一是哲学，不对，第一是阶级斗争；搞阶级斗争，才搞哲学。”“杨献珍提出合二而一，说综合就是两种东西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世界上没有什么不可分割的联系，有联系，但总要分割，没有不可分割的事物。”

杨献珍是真正做学问的哲学家，他从老子“合有无谓之元”的思想受到启发，又从方以智的《东西均》一书中发现“合二而一”的提法，于是认为盖天地之万物，既是“一分为二”的，同时也是“合二而一”的。对立面的统一是辩证法的核心，任何事物都是由对立面或矛盾构成的，不是铁板一块的。“一分为二”、“合二而一”、“二本于一”，辩证法不应当只讲“一分为二”，不讲“合二而一”；辩证法只提“一分为二”，不提“合二而一”是只要斗争性，不要同一性。只讲斗争，不讲团结，是阉割了辩证法，是打人的理论。还谈到列宁在论述辩证法时，不仅讲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而且同时也强调对立面的统一是辩证法的核心。而斯大林只讲对立面的斗争，不讲对立面的统一，所以在20年代搞肃反扩大化，给苏联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现在我们有些同志不了解，还是形而上学，只讲对立面的斗争，不讲对立面的统一。

由于杨献珍的这一哲学观点和当年国家领导人的哲学思想存在着严重分歧，因此论战的结果当然以杨献珍失败而告终，不仅被撤销了中央党校校长、党委委员的职务，而且被赶出党校，分

配到中国科学院哲学所当一个挂名的副所长。与此相反，康生、陈伯达等人则因整治杨献珍有功，而更加受到赏识和垂青，及至文化大革命，康生、陈伯达分别担任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组长、顾问。人们经过十年浩劫后方才大悟，原来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发动这场惊天动地的批判“合二而一”的运动，并非仅仅是针对杨献珍，而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前夜意识形态的一次预演、一次练兵。

萧岛泉给我的信中写道：“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人类智慧的结晶，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人民自己的产物，是人民最精致、最珍贵的、看不见的精髓。”这是古今中外哲学家的共识。不幸的是，我们的国家长期以来却常常与此相悖。一些所谓哲学家们总是喜好迎合政治时局的需要，从哲学的角度去图解、印证当政者发出的政策和指令，而不顾这些政策和指令是否符合客观实际和历史的发展规律。某些当政者则更是愉悦这些丧失理性、良知的所谓哲学家成为他们的奴婢，让他们从哲学的角度为之鼓吹和呼应，以致使党和国家蒙受无可挽回的损失，广大人民群众遭受不尽的痛苦和劫难。应当指出，哲学同政治二者是分属两个不同领域的事物，它们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其独立性，哲学家决不可成为政治人物手中的工具，成为御用哲学家。历史的教训是，必须确认哲学家和从事学术研究的人的独立地位，决不能因为他们的观点和言论“不合己意”，就以行政手段进行压制、打击，无所不用其极。三次哲学大论战血的教训，证明当政者如何正确处理好政治和学术的关系，是一门值得很好研究的大工程、大学问。

作者长期担任杨老的秘书，1992年杨老去世后，又受聘杨献珍思想研究所顾问、研究员，几十年来，一直致力于调查杨献珍的生平事迹，探讨研究其哲学思想，从而为其独立的人格力量、旺盛的治学精神、罕见的理论勇气所感动，终于又抱病完成了这部书稿。作者的这种情怀和毅力，是值得大家学习的。希望这本书的问世能帮助我们反思当代历史的教训，促进中国哲学思想领域的争鸣和发展。

2006年11月20日
(责任编辑 赵友慈)

读《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

邢同义 供稿

编者按：2004年，甘肃作者邢同义的《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一书出版，和此前出版的《夹边沟记事》（杨显惠著）一同揭示了一个人间惨剧，引起轰动。2006年6月31日，《上海文学》杂志社举行该书座谈会，上海市作协副主席、著名作家赵丽宏主持了座谈会。现将座谈会纪要摘要整理发表，以使读者对此书有进一步了解。

邢同义（甘肃省委第二巡视组组长）

夹边沟是甘肃省酒泉县（肃州区）三墩乡的一个非常普通的村子，为什么叫夹边沟呢？因为当地老百姓把长城叫边墙，在汉长城的旁边有一个沟，村子在沟和边墙中间，因此叫夹边沟。1954年开始在这里筹建了一个劳改农场，劳改的是一些刑事犯罪分子和历史反革命之类的人，后来变成就业农场。1957年甘肃省大量的右派被送到夹边沟去劳教，从1958年5月开始，该农场又改成劳教农场。我手头带来的资料有这本书在兰州举行首发式时各媒体的一些报道，包括《上海文学》发的一篇通讯，著名作家邵燕祥先生给我的一封信的复印件，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杨利民先生给我写的信，以及李虎林给我写的序言等等。这本书在出版过程中前后有5家出版社开始很愿意出，后来他们顾虑很多，没出成。最后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因为兰州大学党委宣传部写了一个批准出版的鉴定意见，讲到该书稿是记述反右时期的著作，详细反映了在夹边沟农场劳动改造的右派们的生活，追忆了那个时代发生的历史事实，该书稿观点正确，客观公正，具有强烈的正义感，是一部好的警世教育教材，所以今天才得以和大家见面。中科院院士、中科院副院长、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白春礼先生为我的书题

了辞，对我作品的发表表示祝贺。

我出生于甘肃省天水市。1957年我10岁时，这个小城发生的战栗让我终生难忘。这年，我家的世交、老邻居郭伯伯被打成右派分子，次年被送往夹边沟农场劳教，1960年底饿死在那里，永远离开了这座小城和他日夜思念的妻子儿女，夹边沟从此成为我的一个挥之不去的梦。后来，我在天水市一中读书时，有一位教数学的老师李景沆，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以仁慈的心对待每一位学生，循循善诱，有问必答，枯燥的数学让他讲得趣味无穷。李老师是个摘帽右派，他曾被发配到夹边沟劳教，他在那里曾经饿得皮包骨，还浮肿过。但这个虔诚的基督徒坚信上帝一定会拯救他。果然他活过来了，晚年还写了一部自传，今年他已85岁。这是个一辈子安分守己的敬业者、桃李满天下的人类灵魂工程师，夹边沟差点要了他的命。1968年我高中毕业两年后，被分配当采煤工。在工人伙伴当中有一位人称“老右”的人叫尚世洁，是解放战争时期从国民党部队起义到解放军中的上尉军医，1957年反右中被划为右派分子，后被送到夹边沟去劳教过。当时，他与我们这些普通工人已没有任何差别，一样地背着电瓶，戴着安全帽，一年四季穿着破棉衣，用不堪入耳的肮脏语言交流思想，用恶作剧的方式打发休息时间。这是夹边沟的

劳教给他带来的灵魂深处的变化。8年后,我调到兰州,在甘肃人民广播电台从事了20多年的新闻工作。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几年当中,编辑部陆续接收了几名曾在夹边沟和其它农场劳教过的得到改正的右派分子。这些人都是1957年前甘肃人民广播电台的业务骨干,但他们20多年不拿笔,20多年挨整挨批,没完没了的超负荷的体力劳动,低头认罪,他们的灵魂已被重新塑造,他们说话、工作、处事已与现实社会格格不入。1996年,我被调到酒泉即夹边沟所在地工作。

夹边沟是个幽灵徘徊在我身边,从天水到兰州,从兰州到酒泉,我身不由己,从走近夹边沟到走进夹边沟,我开始了8年的寻觅。一个个人间悲剧震撼着我的心,对死者和少数幸存者的深入了解,使我越来越深切地感到那墓穴中埋葬的不光是一具具尸体,那里还埋葬着理智、科学、忠诚、技术、执着、追求、诚实、思念、亲情、正义、坦诚。一座坟墓就是一桩冤案,埋葬理智剩下狂热,埋葬追求剩下苟且,埋葬忠诚剩下奸佞,埋葬信誉剩下欺骗,埋葬坦诚剩下阴险,埋葬亲情剩下无尽的思念,于是我记下了这一段历史,并起名《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我参考的史料中有国营夹边沟农场的《计划任务书》,《甘肃日报》1957年5月开始到年底所有反右的报道。此外我找到了30多位夹边沟劳教农场的幸存者或他们的子女,找到了当时投入劳教的2000多名右派当中以抗拒劳教罪被酒泉县检察院起诉的40多名劳教者的有关资料。现在还有很多曾在夹边沟劳教的人员及亲属继续给我提供宝贵的史料,比如死亡通知书、死难者的日记等。我们无力改变历史上发生的任何一桩悲剧,但我们不应该重蹈历史覆辙。

赵长天:(《萌芽》主编,上海市作协副主席)

我国近现代史、当代史都是一部不完整的历史,是语焉不详,不具体的历史。这本书把历史具体化了,这样才是有意义的,有价值的。

书中有句话给我印象很深:“在夹边沟饿死的人基本上都是比较自尊的人。在那个条件下,自尊是死亡的加速剂。”自尊实际上是知识分子最基本的东西,没有自尊就不是人呀!但我们的历史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们:人不能

有自尊,人有自尊你就倒霉,没有自尊的人就活得很好!《恍若隔世》这本书告诉我们历史是怎样的,我们曾经历过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怎么会走到今天。我们曾经的那些很害怕见人的事情首先要承认它,才可能今后不再重复。

蔡翔:(上海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多年主持《上海文学》工作)

读完邢同义先生这本书,有点像回到当年杨显惠的作品所描述的那种意境里,又重新被感动和震动。

这几年知识界开始重新讨论中国社会主义阶段的经验或教训。一方面我们要总结社会主义成功的经验,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存在一些黑暗的东西,暴力的、充满血腥的东西,包括摧毁人的自尊。对知识界来说,有邢同义先生这样的著作出版,补充了我们对那一历史时期的更加完整的了解,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那段历史作出更准确的判断。

吴亮:(著名文艺评论家,《上海文化》副主编,专业作家)



我看这本书时总是会想起我家里的人。我四舅解放前在大学读书，日本人打过来后到重庆去读书，1945年光复后回到上海，在闸北区一个警察局工作。他管的是经济犯罪。1948年学生运动很多，于是他就参与逮捕学生、老师，因此也成为他的历史问题，镇压学生运动，被判了三年徒刑，三年后释放。因为算一个知识分子就在上海自然博物馆做管理员。他是个知识分子，很傲慢，得罪了一个支部书记，就打成了右派，去了青海。摘了帽子以后他也是留场人员，不能回上海。我记得70年代初他与我母亲常常通信，我看了信的内容。当时大赦了国民党最后一批人员，国民党人员到营级的全部释放了，就是因为这个身份，他比其他右派人员幸运一点，回来了。他一直单身，那时他也曾给我说起过他在青海的一些事，但我不是太懂事。八年前他去世了，我想他肯定有许多故事，我觉得有点遗憾。我们都知道文革，网上我看到重庆有个红卫兵墓地，这种墓地全国不知道有多少，无名的有名的很多。巴老一直说要成立一个文革博物馆，我觉得还可以建一个“反右”博物馆。

王鸿生：(上海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文艺评论家)

从不断披露的材料来看，当年中央苏区的清查AB团找托派分子到后来延安整风，到反右，到文革，再到文革后的清查三种人，我感觉有一条共同的逻辑，按照东欧的一个思想家奇志科的一个说法，“20世纪是一个伟大的解放计划和一个连绵不绝的灾难”。这就有一个复杂性在里面，我们的民族一百年走过这条道路，包括1949年以来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间，无论取得成就的方面还是大量存在问题的方面纠合在一起，我们今天重新认识重新看的时候都非常复杂。

有些悲剧的根源是天灾、是人祸还是政治、是人性、是文化？各种因素都是纠合在一起的，例如邢同义先生这本书，他调查了许多史料，没有太多的修饰和评价性的东西。这些史料都可以提供我们进一步的研究和思考，这样的反思和对历史记忆的恢复可能需要很多人一代一代去做，是个很漫长的过程。我特别关心的是在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和邢同义先生的作品中间都可能忽略了一个方面，我特别想知道当年那些管教人员，那些

整人的人，他们是怎么想的，他们当时是怎么回事？这一部分也是当时历史的真实，但这个挖掘起来就比较困难了。我认为这些人也构成了历史的真实图像，当中的残酷性在于当时没有患难与共，只有同类相残。

毛时安：(上海市文广局艺术创作中心主任，文学评论家)

中国有各种各样的历史，史官总是在政权下面工作，政权始终要对史官的秉笔直书进行干预。我看完这本书第一个印象是“良史”的传统得到了文学的再现。第二个我觉得其中很真实，没有回避生活中最严酷的东西。第三让我想到了人性恶的问题。书中写到农场里的犯人们彼此的揭发，已经沦为囚犯了还在相互斗争。本来自己想写一些文化大革命的回亿文章，在60年代像鲜花一样的“红领巾”、共青团员在某一夜变得那样残酷，抄家时那么横行霸道，斗老师那样凶残，只要有一种条件，人性是会变恶的。第四，人心为什么这么恶？其实人心是很复杂的。有一句话：“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我一直在反省这句话。一个人如果彻底的话，的确无所畏惧。但无所畏惧，这个人就变得非常可怕。这种无所畏惧在今天还在各种各样的场合表现出来。所以我觉得那么多年没有找到一个治国的哲学，光用哲学上的斗争概念、矛盾概念去治国，与天斗，与地斗，还有与人斗，在党内也要斗，人民内部也要斗。

作品中还有一个感人的地方，一个基督教徒的右派生涯，跟他一起去的有6个人，其中5个人都先后离开了这个世界，只有这个基督徒按主的要求、鼓励，按照主的精神活到了今天。这并非说我是个宗教信仰者，但我觉得一个人应该有信仰，即使在这样严酷的环境中一个有信仰的人还能保持内心的良知和平衡，让他活到了今天。这个世界上有几种人，好人有好的信仰，坏人有坏的信仰，还有一种人什么信仰也没有，哪一派得势就倒向哪一派。今天的社会就要重新建立一种精神和信仰，人心不能再恶下去。我们要对民族、国家、体制方面的弊病进行反省，对人类自身的很多弊病进行反省。

吴俊：(文学评论家，上海师大教授，博士生导师)

通过读杨显惠先生的《夹边沟记事》和邢同

义先生的《恍若隔世》这两本书,夹边沟这个概念就有了特殊的意义了。十年前,我问过我的学生,是华东师大中文系的学生,你们知道林彪、江青吗?他们说“四人帮”听说过,林彪不知道。五六年前,当代一些小说家有个说法,关于文革的一切描述都是现在中老年人集体的虚构。你听,断裂了,没法获得共识了,没有共同的价值判断了。在这种情况下,这两部书以档案和实录的形式在当代出版物里能出现,历史价值要远高于文学价值。以前看过的带有实录性的书,都是一些写高级知识分子的书,这本书是我看到的较集中写中低层人士受迫害的书。

戴舫:(旅美作家,美国的大学教授)

反右运动结束以后,有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右派恢复了工作,有的还被放到领导岗位上。我曾经听到过一个人这么极端的评价,他说:右派没有一个好东西。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因为把原先这些右派放在领导岗位上以后,这些人对其他知识分子的打压,比我们这些干部还厉害。

右派恢复了身份对其他知识分子进行同样厉害的打压,这我是相信的。这说明,无论什么人,右派也好,左派也好,在某种情况下你有权力的时候,而这个权力不受到制约的时候,你个人利益可能受到损害的时候,你对其他人的残酷性就会暴露出来。所以我觉得,最大的恶恐怕是赋予普通人能够为恶的能力。邢同义先生的这本书就可以让我们看到这种情况。反右造成了一种极端的局面,再加上当时的3年困难时期,产生了这样一种特殊的社会情形,使人性中恶的东西得到体现,两千多名右派分子在夹边沟受到了非常非常恶的待遇。

讲到“记忆”的问题,我们并不是失忆,我们是被迫不记忆,这是一个更加糟糕的情形。我们知道记忆都是有选择的记忆,在选择时都有个原则,原则是意识形态的一种构件。因为任何意识形态都会带来某种局限性和压力,超脱这个局限性是很难做到的,不仅是要反抗压迫你不记忆或迫使你以某一种方式记忆的压力,同时还要抗拒我们自己所服膺的那一套意识形态带给我们的自觉或不自觉的压力。司马迁是伟大的历史学家。为什么说他伟大?我们把他和班固比一比。班固在写汉书的时候,把司马迁所写的好多东西给漏掉了,

因为他认为司马迁写的这些东西不符合写历史的原则,司马迁在写的时候,超出了原则,记下了很多按这个原则来说是不需要记的东西。正因为如此,司马迁反而记录了很多有价值的东西。邢同义老师这本书好在什么地方呢,其中一点我觉得他在选择这些人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他认识的人,他的选择就是有某种随机性,这种随机性当中就避免了他通过某种意识形态来选择人而带来的局限性。他把好多东西用非常真实的方法记录下来,包括那些他认为非常糟糕的被改造者的情形,这些细节具有非常大的意义。

徐俊西:(《上海文化》主编,上海市作协原党组书记,上海市委宣传部原副部长,文学评论家)

这本书是一本历史真实的记录,很震撼人心,很感动人。书中描述的右派的苦难、迫害,比我们平时了解的更残酷,更深刻。迫害最深的就是对人性、人的尊严的践踏。书里写到的右派都是知识分子,都是很有正义感,很讲人格,很讲尊严的。但是弄到后来,把人的一切宝贵的东西、人格的东西都践踏光了。现在我们的道德,人与人之间的诚信,那种正义的东西越来越少。这可能与我们的民族的遭遇,过去的历次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留下来的这样一种包袱有关。这个问题可能要付出相当的代价才能够解决。

另外我想,大家对此类现象这么关注,对这一类作品评价这么高,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一般的知识分子中有一个情结,就是希望社会能做到以史为鉴。现在有一个很不好的现象就是掩盖事实,掩盖历史,有很多禁区。我觉得对历史上的有些事情完全可以用更正确的态度来对待。反右也好,文化大革命也好,都是亿万人经历过的事情,是瞒不住的。任何一次大的革命或运动,它不可能都是对的,其中肯定有很多错误,造成很多灾难,这些问题你只要正确对待,认识它、总结它、改正它,就能提高执政能力。

我最近到俄罗斯旅游过一次,我碰到的人讲得最多的问题就是改制。改制之前怎么样?改制之后怎么样?解体之前怎么样?解体之后怎么样?该肯定的就肯定,该否定的就否定。解体之前斯大林怎么样?我们现在怎么看的,怎么做的。社会有发展、有改进,大家都有信心。我们有我们的改革

开放的方针和步骤,而且是很成功的,没有必要对过去的包袱背得太重。这一点应该理直气壮、旗帜鲜明。夹边沟的书上有幅照片,讲那个地方现在搞移民。移民立了个碑,而对死掉的上千名右派则没有立碑。假如哪一天在夹边沟立一个纪念右派的碑,我们的社会就大大地跨前一步了。

褚水敖:(上海市作协原党组副书记兼秘书长,文学评论家)

邢同义先生写出这么好的一本有意义的书,引起我很多思考。我在想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社会每次动荡的时候,最可怜的是处于底层的老百姓。老百姓当了右派,他的生活就不是差一些的问题,那就是连命都保不住了。

邢同义先生这本书的文学性相当强,我特别注意它的细节。比如说里面写到右派饿死以后,就草草地把他原来的衣服穿上,又把原来的铺盖铺好,把尸体一裹,一卷,然后用原来捆行李的绳子一捆就草草地埋掉了。平常我们所说的草菅人命的问题,抽象的说,不会感人至深的,这个绳子却给我很大的震撼。又比如说写到一个人到农场去时带有10块钱,这10块钱没有完全用掉,不舍得用,然后把没有用掉的5块钱,在他还没有死去的时候寄回家,因为他特别喜欢自己的小儿子,他叮嘱妻子给小儿子买点东西。这一点我特别震撼。还有一个,他写的多才多艺的右派这个人物形象我特别喜欢。那个右派是广播电台的编辑,他自己在1957年反右初期非常积极,年轻人嘛,觉得投身于运动,自己要有创造性,于是就挖空心思创作了揭发领导的所谓《西江月》,但在他沾沾自喜的时候被打成了右派,后来遭遇很惨。但这个人往往以很欢乐的形式出现,以喜剧方式写悲剧,我看了以后就很有感触。

朱鸿召:(文学评论家,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

我拿到这个书之前,实际上早就关注夹边沟了,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发的时候我就很关注。当今社会从一些具体的事例看,人与人之间的诚信都没了。从什么时间没有的?从什么时间断掉的?我觉得是一次一次的政治运动,真是叫做“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埋葬的是正义,留下的是什么;埋葬的是科学,留下的是什么,把很多好的东西都舍弃了。所以我说这些题材的描写要人去

做,我觉得这是一个知识分子或者一个党政干部的良知,是真正的对现实、对未来负责的体现,这是我讲的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说这类题材从AB团,到延安整风,到“反右”,到文化大革命,把这些题材放到一起,怎么理解这些个事呢?

整个二十世纪人类社会历史里面有一个社会动员的问题,或者是国家动员的问题,纳粹、苏联、日本各是一种社会动员的方式。中国在这方面有自己独特的社会动员方式,这个方式里面有一个经典的论断,就是毛泽东讲的要改造人、塑造人。这个改造我理解是从延安整风开始的。延安整风和当年苏区搞AB团不一样。搞AB团的时候是肉体上消灭,延安整风毛泽东说是统一思想,改造人,但是不搞死人,所以王实味打成了反革命以后不是要把他搞死,把他养着,让他干什么?让他做反面教材,另外希望他在劳动改造中改造自己。

以后历次运动中的这个改造人我把它梳理为三大块:第一块是对进入革命队伍里的同志的改造;再一块是对敌对分子的改造,主要是对有知识分子背景的敌对分子的改造;第三块是改造右派。这个右派的主体是一个知识分子背景,就是1949年以前没有进入革命队伍,1949年以后进入到新社会,带有旧社会知识文化背景的知识分子。对这些右派的改造实际上是过去对革命队伍内部人员改造的继续,理想的改造结果就是把所有人的精神思想都改成一样的东西,一种声音,一种体型,一种行为,这样的群体一定是没有创造力的。

孙甘露:(专业作家,先锋文学的代表人物)

歌德有一句话,可以反过来说,“理论之树常青,而生命是灰色的”。这是我看这本书的感觉。我觉得这是一部感情之书,是一部良心之书,是系于“人”这个东西写出来的。我看到一些我觉得是很感动的东西,尤其是最后一篇,讲述的是上海支边建设者高尚斌先生的苦难经历。高先生临死前说,我们的不幸也是我们国家的不幸。因为中国人一直有这样的传统,所谓位卑未敢忘忧国,虽然自己很惨,但不管处在一个什么处境,总是要跟国家联系起来。但到后来所有这些东西渐渐又都被湮没,被某种力量变成被遗忘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写作是有价值、有意义的,哪怕它被湮没,因为有一种虔诚的力量在里面。

刘绪元:(作家,《文汇报》笔会主编,文学评论家)

前几天刚开过一本德国小说《朗读者》的小型研讨会,蛮有趣味。我觉得这个小说并不是完全反纳粹的,但他们德国的几个人的注意力就在这一方面。德国对纳粹的认识和立法是非常明确的,纳粹在德国被认为是绝对的罪行。如果说纳粹跟日本军国主义相比,我们说日本军国主义比纳粹还要坏,这个话在德国也是不能说的,说了也是犯法的,因为他们以为纳粹是最坏的,是绝对坏的,是绝对的一种罪行。在德国这样一种对纳粹的反省,通过法律、通过制度的方式来把纳粹压到宝塔下面去的态度是非常完全彻底的。我们的态度就不一样了,我们现在报纸上不说文革,也不说反右。这会造成一种什么后果?这是非常值得忧虑的情况。

王纪仁:(上海市作协副主席,上海师大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评论家)

刚才大家在发言中觉得邢同义先生很令人佩服,认为领导同志写了这样一本书,言下之意,领导同志是没良知的。恐怕也不能这样说,我看很有良知,很有责任感。本来,世人不知道中国地图上有夹边沟这样一个地名,现在我知道有五部书是写夹边沟的,因为它揭开了冰山的一角,因为我们过去只讲光辉的、伟大的,现在它揭示了一个苦难史,虽然仅仅是冰山一角。如果我们往前推,推到反胡风,肃反,反右,一直推到文革,这段历史中有不少冤假错案。但是现在只用一个很抽象的政治结论就把这个事情封存了,这可能吗?

第二我觉得“夹边沟”成为了一个现象,不是一个地理学的概念,而是一个地缘政治的概念,这样一批右派被押解到一个山村,又遭遇了饥荒,最起码的生存权被剥夺,人性受到扭曲,这的确是触目惊心的。前几年已经有一些“反右”题材的作品,大多写的都是一些高层的大右派。实事求是地讲,这些大右派的命运非常悲惨。但大右派的事情应该写,小右派的事情也应该写。现在我觉得这个夹边沟的文学现象是不是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的开始,我把它称之为文学的解密时代的开始,我们需要用文学的手法把那个帷幕拉开一点,这个真相就逐步出来了。

高凯:(甘肃文学院常务副院长)

邢同义同志的《恍若隔世》是新时期甘肃本土一部最具作者血性和文学精神的优秀报告文学。夹边沟从地理概念上来看是一个非常小的地方,在中国地图上找不到,在甘肃地图上也找不到,只有在酒泉市的地图上才能发现它。尘埃一样渺茫的影子尽管至今提起来仍然有一些人闪烁其词,讳莫如深,但它毕竟在甘肃地图上。在中国地图上企图将它遮掩或抹掉,都是绝对不可能的。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说,夹边沟应该是个非常巨大的存在,它永远标在中国历史的地图上,曾经是一个离现实很近的人造的人间地狱。

作家杨惠是一位文化英雄,记者出身的邢同义更加令人敬佩,因为邢同义在采写这部报告文学时,已是一个在位的地方领导同志。公开运用报告文学这一纪实的文体,揭示一处巨大的伤痛,没有足够的胆识,没有一个共产党员和一个作家起码的良知和责任是绝对做不到的。邢同义同志对夹边沟苦难历史的真实记录,使我们更加珍惜今天,更加在乎明天,我们应该记住的一串关键词是回眸、凭吊、反思、警惕和进步。

(邢同义系甘肃省酒泉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

(责任编辑 李晨)

敬告作者

根据国家税务机关的有关规定,刊物所登文章(包括读者来信)支付稿酬时,需全员全额申报个人所得税。为此,向我刊投稿的作者,请在稿件上注明您的身份证号码,以备稿件采用后支付稿酬时使用。

我刊今后刊登的文章,作者如未收到稿费,请将您的身份证号码告知我社财务室,电话:010-68525374,联系人:肖林。

请各位作者给予支持。

《炎黄春秋》编辑室

中国古代清官的拒贿诗

蒋益文

我国历史上出现过许多清官廉吏，言为心声，他们的拒腐诗文也充满正气，流芳百世。

北宋包拯，庐州人，他为官清廉，不畏权贵，民间都称他为包公。在他 70 岁寿辰时，吩咐家人，一概不收寿礼。但第一个送来寿礼的竟是皇帝。皇宫送礼来的太监在礼品上面写道：

德高望重一品卿，日夜操劳似魏征。
今日皇上把礼送，拒礼门外理不通。

包拯看后，立即挥毫题诗：

铁面无私丹心忠，做官最忌念叨功。
操劳本是分内事，拒礼为开廉洁风。

他这样辞去了皇帝的赠送礼品，有礼有节，言辞恳切，实在巧妙。

明朝于谦，官至监察御史，他为官清廉，为官一生家无余财，针对当时许多官员乘巡视之机搜刮钱财，回京后向上司送礼物的风气，写了一首《入京诗》予以讽谏：

绢帕麻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
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

搜刮的危害，清廉的必要，舆论的反应，劝谏的苦心，尽在诗中。

明代况钟，于宣德五年，曾外放苏州知府，他到任后严惩贪官污吏，平反冤狱，兴修学府，关心民间疾苦，被苏州人称为“况青天”。正统五年，他任满赴京考绩，写下了一首诗：

检点行囊一担轻，京华望去几多轻。
停鞭静忆为官日，事事堪持天日盟。

简易轻便的行囊，清正廉洁的思想，超然物外的思绪，大义凛然的正气，跃然纸上，过目难忘。

明代永乐年间，吴讷任监察御史，人品刚直公正，从政廉洁自持，颇有美誉。有一次，他巡视贵州，返京时地方土司赠送黄金百两，吴讷愤然拒纳，当场在礼盒上题诗回绝：

萧萧行李向东还，要过前途最险滩。

若有赃私并土物，任教沉在碧波间。

这首诗是自警，是自律，也是对行贿人奉劝，行贿受贿，天理难容。

明代信阳知州胡守安，任满离职时曾写了《任满谒城隍》诗：

一官来此几经春，不愧苍天不负民。
神道有灵应识我，去时还似来时贫。

向城隍表达衷心，向民众表明心迹，坦荡为官，来去轻松。

明朝有位主考官叫李汰，他在福建主持科举考试时，一天夜里，有人想以黄金 50 两行贿，以达到“金榜题名”的目的。他非常气愤，当即写了一首拒贿诗：

义利源头识颇真，黄金难换腐儒贫。
莫言暮夜无知者，怕塞乾坤有鬼神。

主考官虽然贫穷，但正气不能丢失，暗室亏空，神目如电，人神共知。

清朝张伯行，被誉为“天下第一清官”，从来不受属下分文赠礼，备受康熙皇帝的称赞，因而晋升为福建巡抚。到任后，为杜绝送礼者，张伯行便写了一首《禁止馈送檄》，张贴在巡抚署衙门外：

一丝一料，我之名节；
一厘一毫，民之膏脂。
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
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
谁云交际之常，廉耻实伤，
倘非不义之财，此物何来？

那些送礼者见此檄文，不敢自讨没趣，均悄然离去。禁止馈送檄自古有之，值得借鉴。

中国古代清官的拒贿诗，语言精巧，简洁明了，充满正气，至今读起来余味悠长，发人深思。

(责任编辑 李 晨)

炎黄春秋杂志社举行作者新春联谊会

2月7日上午，本刊举行了今年作者新春联谊会，到会者近80人。

徐孔副社长主持会议，杜导正社长讲话并向大家拜年。

在会上发言的同志有：杜润生 李锐 刘导生 朱厚泽 高尚全
冯征 张文彬 谢韬 何方 资中筠 钟沛璋 章诒和 吴明瑜
张鸣 秦晖

出席会议的同志（按姓氏笔划排列）：马仲廉 尹骐 王才
王俊义 王强华 冯征 冯健 刘导生 刘志琴 曲润海 朱良
朱厚泽 齐明昌 何方 何燕凌 余世存 余焕椿 吴明瑜 宋木文
张鸣 张天来 张文彬 张宏遵 张思之 张培森 张惠卿 李乔
李锐 李普 李亚平 李昌平 李耐因 杜润生 杨天石
杨克现 苏双碧 邵燕祥 陈大斌 金凤 金燕 姚力文 施亮
赵淮青 钟沛璋 胡冀燕 姜玲 秦晖 袁鹰 资中筠 高放
高尚全 崔卫平 章立凡 章诒和 谢韬 彭迪 浦志强 詹小洪
雷颐 薛德震 戴煌 魏久明

本社工作人员参加了会议：杜导正 徐孔 杨继绳 吴思
李晨 徐庆全 赵友慈 胡竞成 杜明明 王海印 孔屏 谷世章
赵凡响 肖林



杜润生



李锐



刘导生



朱厚泽



高尚全



冯征



张文彬



谢韬



何方



资中筠



钟沛璋



章诒和



吴明瑜



张鸣



秦晖

摄影 徐庆全

感谢巴金 敬仰巴金

没有民主就没有共产党

废除《六法全书》的缘由及影响

大饥荒中的县委书记王永成

重庆武斗与文革墓群

中国古代清官的拒贿诗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定价: 5.80元